無錫文博

主办单位：无锡博物院
无锡市文物交流中心

封面题字：冯其庸

《无锡文博》编辑委员会

主　任：黄浩然

副主任：蔡卫东　杨建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军　王　莹　王刚毅　刘宝山
邢　娟　邹忆军　杨启明　陈建忠
陈建强　陆建新　陈　宇　陈　蓉
贡振亚　周小东　周小萍　金石声
林　琰　荣骏炎　赵建高　徐　韡
陶　冶　郭会文　黄兴南　盛诗澜
梁溪清　阎智海　韩　锋

主　　编：盛诗澜

执行主编：阎智海

编　　审：蔡卫东

编　　辑：薛鸣法　何　桦

装帧设计：杨琪蕙

目录 contents

● 关注

留住历史根脉　传承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纪实 …… 03

● 专题

“泰伯奔吴”诸说辩正 …… 金其桢 07
泰伯奔吴建都梅里考因 …… 程勉中 23
勾吴国青铜兵器探秘 …… 陈振康 32
南国利器——吴钩和吴戈 …… 王新民 36

● 历史

倪瓒年谱（二十一） …… 谈福兴 38
康熙第二次南巡幸寄畅园时间考 …… 秦志豪 46

● 遗产

“宜兴窑系”
——中国陶瓷史上杰出的文化类型 …… 周小东 52

● 博物馆

博物馆文物普查工作之我见 …… 朱轩林 57
浅谈新形势下博物馆的宣传推广工作
——以南通城市博物馆为例 …… 汤 建 59

● 品鉴

停云馆帖考（十六） …… 周道振 61
香珠雅趣 …… 高振威 66
无锡博物院藏四神博局镜铭文初探 …… 任宝龙 68

● 艺术

旧方书屋墨犹香
——秦古柳先生和他的书画艺术 …… 陈荣杓 70
丹青余事画名传 春风化雨遍桃李
——记一代宗师胡振先生 …… 章志坚 73

● 资讯

无锡博物院举办《丹青为伍——吴青霞艺术院藏画展》 …… 22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博物馆条例》 …… 56
无锡全面部署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 …… 72
《宫中月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官窑瓷盘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
…… 74
《无锡文博》2014 年总目录 …… 75
2014 年度无锡文博大事记 …… 78
梅兰竹菊“四君子”书画作品暨历代文玩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展出
…… 82
无锡博物院获杨氏家族捐赠书画 151 件 …… 单 红 83

《无锡文博》编辑部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广场南侧
钟书路 100 号无锡博物院 503 室
邮 编：214023
电 话：(0510)85727606
电子邮箱：wuxiwenbo@163.com
印 刷：无锡市锡沪胶印厂
准印证号：锡新编(K)字第 208 号
出版日期：2015 年 3 月

封面：张书旂、徐悲鸿合作 岁朝清供
(吴青霞艺术院藏)
封底：明代 紫砂扁鼓形四系罐
(无锡博物院藏)

留住历史根脉 传承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纪实

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饱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加强历史文物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所关注、所思考。

福建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河北正定古城、黑龙江哈尔滨731遗址群、首都城市规划……无论是对有关报告的批示，还是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并身体力行推动保护和抢救文物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提升文物保护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指引下，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伟大民族精神。

保护文物使命神圣：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它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然而，经过70余年的风雨侵蚀、冻融破坏等，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731遗址群部分旧址破损严重，甚至被挪为他用。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反映该遗址群破损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应加强修护工作”。

731遗址群修复工作立刻被提上日程：731遗址群核心区改造工作开始实施，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本部大楼修缮及展览提升工程正式启动，陈列馆新馆开工建设，史料搜集和文物征集逐步开展……

文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始终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文物保护，也始终牵动着总书记的心。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针对一些文物保护措施不力，习近平就严肃批评有关负责同志：“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关心福建三明市万寿岩遗址的抢救和保护，更是至今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

当地86岁的王月明老人告诉记者：“当年的事情仍历历在目。习总书记对文物价值的深刻认识，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让我们特别感动，也特别受鼓舞。”

曾经，福建发现最早的有人类活动的地点是三明市清流狐狸洞，距今8000至1万年。然而，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一经发现，就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8.5万年前。

但15年前，万寿岩遗址却一度面临挖掘机和炸药包的威胁。

王月明等一些当地老人先后写了呼吁书、紧急报告向有关部门报送。

2000年1月1日，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对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我省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也是国内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

习近平在批示中强调，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批示深刻具体，感情溢于言表。

如今，该遗址正在变身成为集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文化知识传播、闽台文化渊源研究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作的一系列批示准确鲜明地点出了文物的价值所在。”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物是民族历史的不可替代的象征与见证，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一旦被毁就不可追回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深厚感情，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巨大动力。

这是摸清家底的重大举措。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2013年4月起在全国展开，普查登记工作将于2016年底基本结束。届时，各类藏品将以名称、保存状态、年代、来源等14项信息入库。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大幅递增，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年增幅40%以上，资金支持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对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及贫困地区给予了更有力的支持。

这是抢救重要文物的刻不容缓。如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延安西北局旧址等工程进展顺利，取得显著成效，黄田村和呈坎村古建筑群一期维修工程、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和残损构件加固工程等全面启动。

这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执法力度。2014年，国家文物局督办文物违法案件64起，重点督办和严肃查处徐州市韩桥煤矿旧址损毁案、阿尔山市阿尔山车站损毁案等法人违法案件等。

“保护文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绝不能让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受到损毁。”——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深刻体会，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合理利用文物资源：让文物活起来，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国家确立的抗战纪念设施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应当受到严格保护。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迅速落实对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的维修改善工作，尽早恢复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负起主管部门责任，对国家确立的抗战纪念设施进行一次排查，有类似阜新情况的，务必抓紧进行维修，切实做好保护、利用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

2014年9月，一份反映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遭破坏的报告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案头。总书记对此写下上述大段批示。

文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也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同时更好发挥文物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有着深入的思考——

2014年2月，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在其他场合，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文物活起来”激活了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各地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坚持科学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

——充分发挥抗战文物作用，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如相关地方和部门迅速制定《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立即对186处国保抗战文物遗址进行逐一排查，启动46个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项目，新增29个国保抗战文物开放点，新建9个纪念馆陈列馆，24处抗战文保单位增加开放面积，55处抗战文物点实现展陈提升。

——盘活馆藏文物资源，用主题展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展览日趋活跃，展藏比例不断提高，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关注度得到空前提高。目前，我国博物馆总数达4000多家，每年举办2.2万个展览，年接待观众6亿多人次。

——积极推动文物保护成果创造性转化，让文物蕴含的价值融入人们生活。如开展文物和展览精品的数字产品试点和智慧博物馆试点，让公众足不出户轻松游历主要博物馆；观众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或电脑分享精美艺术与文物，分享参观体验；观众可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看”到复原的遗址等。

……

2014年10月22日，“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在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为展览题写序言指出，这次展览展出来自中国27家博物馆的450多件精美文物，从多个侧面展示中国汉代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传递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从这份中国文化珍贵遗产中，法国和欧洲观众能够更为形象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

“让文物活起来”还意味着用文物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

丝绸之路文物展、中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展、神秘的三星堆文物展等一系列文物展，正作为“外交使者”“国家名片”，日益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活起来”的文物，正走近百姓、走向世界。

树立正确保护理念：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书写城镇化与历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这句话，激发无数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同时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的软肋。

古城风貌千篇一律、文物保护方式过于简单化、盲目恢复历史遗迹……在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加快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事业面临着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双重任务和挑战。

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深切的关注、更深入的思考——

2002年4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他在序中写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在《〈福州古厝〉序》中特别提出：“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个性。”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就对一些地方将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对立起来的行为提出警示：“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情况下的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

2013年8月，在一份关于河北正定古城情况的报告上，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正定古城保护工作。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

史文化价值。”

2013年11月，总书记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报告作出批示强调，“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

2014年2月，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14年9月，在一份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缺失的相关材料上，总书记批示指出，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让我们的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

这是对文物保护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对文物保护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也成为我国开展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遵循。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明确提出“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相协调”。

2014年4月，中央有关部委联合出台指导意见，提出用3年时间，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防灾安全保障、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在北京、在河南、在山东、在重庆、在山西……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不断细化出台各项政策举措，在遵守文物保护基本原则和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探索着各具特色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发展新模式。

——2014年6月，湖南省召开全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工作会议，宣布全面启动重点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工作。

——2014年12月，《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审议通过。规划全面梳理市域范围内各类历史文化资源，提出真实性、整体性、活态保护、地域特色、适度利用等保护原则，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

——山东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众，如大运河申遗工程直接间接受益民众超过500万人，泰山、岱庙、颜庙等3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保护，成为重要的旅游观光目的地等。

——福州市近年来先后投入40多亿元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梳理老城的历史记忆、古城符号和福州元素，彰显古城风貌。时至今日，经过多年持续接力保护，福州古城“三山两塔一条街”总体格局，及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等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较为完整。

……

真实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发展中保护，一幅城镇化与历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我国文物事业必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独特作用。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隋笑飞、吴晶晶、周玮，参与采写记者徐扬、白林、王建、刘旸)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0日第1版)

(编辑：阎智海)

“泰伯奔吴”诸说辩正

金其桢

泰伯三让天下奔吴创建勾吴国，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我国历史上，包括《穆天子传》、《左传》、《国语》、《论语》、《史记》、《汉书》、《吴越春秋》、《论衡》、《韩诗外传》等先秦两汉重要古籍在内的历代数以百种计的各种文献典籍上，都有泰伯奔吴或吴与周王室为嫡亲、吴始祖泰伯是开国周王“伯父”的记载。

《穆天子传》据考成书于西周早期周穆王时代，在《穆天子传》卷二中有“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的记载。

《左传》相传是西周时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是先秦最重要的史部著作，其史料价值极高，在史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梁启超称之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据查考，《左传》闵公元年，僖公五年，襄公十二年，昭公十三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七年、十三年，共有八处记载着有关泰伯奔吴或吴与周王室为至亲关系的事实。如：《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国太子（晋申生）不得立”，大夫士蔿劝慰他说：“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左传》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鲁、吴会于鄫，吴太宰伯嚭召鲁季康子，季康子命孔子弟子子贡往辞，子贡曾向吴大臣讲吴先世太伯、仲雍始创吴国的情形，说道：“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羸（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记载黄池会盟时，晋、吴两国相互争先歃血，争为盟主，几乎发生战斗的情况。“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所谓：“于周室，我为长”，是指吴国的始祖泰伯是周室开创人太王的长子，他在周室宗庙的列祖列宗座次排列中，紧随着太王之后而在其他诸座之前。由于吴人所说的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晋人无法直接反驳，只好让吴人先歃血。这一记载表明，泰伯乃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王季之长兄。

《国语》成书于战国初年，与《左传》为姊妹篇，互相表里，也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所载史实为大多学者所信从。在《国语·吴语》中，有周敬王称吴王夫差为“伯父”的记载，这表明周王承认吴为同姓，吴的先祖泰伯为周朝开国始祖周武王父亲文王的“伯父”。

战国末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其名作《天问》中也说到了泰伯、仲雍奔吴。他在《天问》中说：“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其夫斯，得两男子。”意思是说：立国于南方的吴，竟能获得长期存在，有谁预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应归功于两个男子。他所说的“两男子”，指的就是“奔吴”的泰伯和仲雍。

《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记孔子言论学说的重要著作。全书有“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等三处提到泰伯奔吴或吴国为周之后裔，理应受到重视。

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记泰伯奔吴事最为翔实。《史记·周本记》云：“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太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太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更是明确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

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

东汉王充的《论衡·谴告篇》记载:“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论衡·四讳篇》记载:“昔太伯见季历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

东汉早期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记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东汉韩婴所著《韩诗外传》卷十第五章记载:“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位,‘位’‘立’古为一字)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

上述诸种与“泰伯三让天下奔荆蛮创建勾吴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离得最近的我国先秦两汉历史古籍的一系列明确记载,无疑十分有力地说明,泰伯实有其人,“泰伯奔吴”实有其事,是确实可信、无容置疑的。

但是,由于《左传》、《国语》、《论语》、《史记》、《汉书》、《论衡》、《穆天子传》、《韩诗外传》等先秦两汉重要古籍的记载,都对泰伯奔吴创建勾吴国的“吴”到底在何处语焉不详,只笼统地说了“荆蛮”,对勾吴国所在的具体地点未作明确说明,因而后来人们就对“泰伯奔荆蛮创建勾吴国”的“吴”到底是哪里,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吴文化研究、开发热的兴起,及由此而引起的“吴文化发源地之争”的日益激烈,史学界众多专家及民间吴文化研究者,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泰伯奔吴创建勾吴国究竟是“奔”在哪里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形成了“西吴说”、“北吴说”、“宁镇说”、“赣鄱说”、“两吴说”、“东吴说”等多种不同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泰伯奔吴创建勾吴国的“吴”到底在何处?“泰伯奔吴”的落脚地到底在哪里?这些关于“泰伯奔吴”的不同说法,究竟哪种说法为是呢?

一.“西吴说”、“北吴说”考辩

主张“西吴说”的人认为,“泰伯奔吴”是“奔”在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具体而言是:西吴吴山位于陕西西部,在离周国所在岐山下周原西100多公里的地方,这里一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泰伯、仲雍以父病采药为名逃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酋长,建立起氏族国家,号称“勾吴”。从而,形成了太伯的吴政权与岐山周原古公亶父、弟季历的周政权的相互呼应。正因为如此,所以《诗经·皇矣》言“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最早提出“西吴说”的是近代学者卫聚贤先生,他在《太伯之封在西吴》一文中,以《诗经·皇矣》的诗句“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为主要依据,提出:“作邦”是被封而非出奔,泰伯之吴并不是他自己“奔”出去的,而是周王季历分封出去的;“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是说“王季友

其兄泰伯之国,是泰伯之国当距王季之国不远,故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其意是说自岐山周原而向西看是泰伯所宅之地。因此,“泰伯奔吴”是“奔”在“西吴”。

主张“北吴说”的人认为,“泰伯奔吴”是“奔”在今山西平陆吴城。具体而言,地处晋南的虞国历史悠久,有人考证出,周人在迁往岐山前是居于晋南的,后来该地是西周虞仲的封地。即武王灭商后,寻找到继任泰伯君位的仲雍的传人时,周章已继承父位,周武王便正式封周章为勾吴国君,又将周章之弟仲封于周原的北夏墟。仲以国得姓,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在周之北,故称北吴或吴虞。

我们认为,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考证分析,“西吴说”、“北吴说”均不能成立,其理由如下:

1.“西吴”、“北吴”的地理方位与“泰伯奔吴”于“荆蛮”的地理方位不符。

《史记》、《汉书》、《吴越春秋》均言泰伯、虞仲所奔之处为“荆蛮”,也就是说“泰伯奔吴”的“吴”所在地是在“荆蛮”。所谓“荆蛮”,并非对一般荒蛮之地的随意泛称,而是中国古代一个特定地域的称呼。具体而言,是上古时中原周人鄙视、敌视楚国的称呼,如《国语·晋语八》就有这样的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因越灭吴,楚又灭越,原吴、越之地皆为楚地,故“荆蛮”实际上也是古代中原人对江南楚吴越地的总体泛称。而成于唐玄宗开元廿四年(736年)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解释,曰:“太伯奔吴,所居在苏州北五十里无锡县界梅李村,其城及墓见在。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称蛮也。”

然而,“西吴说”所说的西吴“吴山”,位于今陕西西部陇县,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史记》、《汉书》、《吴越春秋》所说的泰伯所奔的被称为“荆蛮”的江南楚吴越地相距数千里之遥;而“北吴说”所说的北吴“吴城”,位于今山西南部平陆县,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史记》、《汉书》、《吴越春秋》所说的泰伯所奔的被称为“荆蛮”的江南楚吴越地,也相距数千里之遥。很显然,这两个地方与“荆蛮”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决不可能是“泰伯奔吴”的“吴”的所在地。

同时,根据史籍的记载,“泰伯奔吴”后建立的“句吴”国,其地理位置在岐山周原周王朝的东南方,这从吴王馀祭四年(即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代表吴国出使上国所行走的路线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左传》对吴季札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型外交活动是这样记载的:“(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季札这次出使过程的记载大略如下:“(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去鲁,遂使齐”;“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去郑,适卫”;“自卫如晋”,“适晋”;“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季札出使上国的基本路线是:从吴出发,先北上徐国,然后到鲁国,至鲁都曲阜,再自鲁使齐至齐都临淄,再自齐都临淄至郑都(今新郑县),离开郑都后到卫国,最后自卫经戚邑到晋国,再由晋国经过徐国返回到吴国。这一路线图清楚地表明,“句吴”国的位置在鲁国、齐国(今山东省)的南面,在晋国(今山西省)的东面,就总体方位而言,是在陕西岐山周原周王朝的东南方。而“西吴说”所说的西吴“吴山”,古称西镇,现属陕西宝鸡市管辖,其地理位置在岐山周原的西方,根本不是历史上“句吴”国所在的地理方位,因此也就不可能是“泰伯奔吴”建立“句吴”国的地方。至于“北吴说”所说的北吴山西平陆吴城,其地理位置在岐山周原的东偏北方,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也根本

不是历史上“句吴”国所在的地理方位,因此也就不可能是“泰伯奔吴”建立“句吴”国的地方。

2. “西吴”、“北吴”无“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习俗,这一习俗表明,“泰伯奔吴”建立“句吴”国的地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西吴”、“北吴”所在的中原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

《左传》哀公七年明确记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赢(裸)以为饰。”《史记·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论衡·四讳篇》记载:“昔泰伯见季历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记载:“太伯、仲雍望风知指……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表明,在“泰伯奔吴”的落脚地、建立“句吴”国的“荆蛮”之地,当地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他们之所以要“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是因为荆蛮之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使然。“断发”和裸身是因南方卑湿酷热之故,直到汉代在长沙以西仍有裸国,《史记·南越传》记载:“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文身”是为了躲避蛟龙之害,而蛟龙是生活在水中的,实际上就是蛇和鳄鱼之类的代称和神化。南方部族以蛇纹图案作为文身之饰的目的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是“以避蛟龙之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中说得更具体明了:“当时吴、越人之所以断发文身,乃是起于保护生命的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等。”

很显然,“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习俗是生活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部族所特有的。“泰伯奔吴”所建立的“句吴”国,位于荆蛮之地,正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处于水乡泽国,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因常在水中劳作,故往往袒裸其身。《论衡·书虚》就有明确记载:“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也记载云:“裸国,今吴郡是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当地土著居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纹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另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说明夏禹到吴地时,亦曾经随俗裸身。《史记·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说明“泰伯奔吴”之地,确为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部族所居住的地区。而“西吴”陕西陇县吴山则地处关中陕西省中部西南、秦岭以北方向,既非水乡泽国,其气候也与中原各地一样,“北吴”晋南地区山西平陆吴城亦大体如此,这两个地方,都既无卑湿酷热之苦,也不会有“蛟龙”伤人之害,因而当地居民根本不必“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自然也就没有“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这样的习俗。既然“西吴”、“北吴”没有“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习俗,那么如果真如有些人所说的“泰伯奔吴”是奔到“西吴”、“北吴”那里去了,他和仲雍也就不必如《论衡·四讳篇》所记载的那样“断发文身,以随吴俗”了。很显然,正是因为“泰伯奔吴”并未奔到“西吴”、“北吴”去,而是奔到了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水乡泽国被称为“荆蛮”的“东吴”,所以泰伯和仲雍才不得不“断发文身,以随吴俗”了。

3. “西吴说”将《诗经·皇矣》的诗句作为“泰伯奔吴”是“奔”在“西吴”的主要依据,有的属望文生义,有的则是误读,不足为凭。

如,认为《诗经·皇矣》的“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是说“王季友其兄泰伯之国,是太伯之国当距王季之国不远,故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这是牵强附会之说,因为国之间距离的远近与友好或敌对并无必然的联系,并非离得近就“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而往往是国之间距离近发生磨擦多,不一定能友好相处,而相距远的国家之间倒反而能相安无事。因此,决不能因为王季友其兄泰伯之国,就断定吴国离周国不远,就在离岐山周原仅100多公里的“西

吴”。

又如,认为“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其意是说自岐山周原而向西看是泰伯所宅之地,这是对《诗经·皇矣》的误读。《诗经·皇矣》第一章的原文是这样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中“二国”之“二”,《毛诗传笺通释》考证说:“古文‘上’作‘二’,与一二之二相似,‘二国’当为‘上国’之误”,“上国”即指殷王朝。诗的大意是说:伟大的上帝观察四方,欲求民生安定,洞悉殷王朝政治腐败并憎恨殷王的奸虐,而由殷都西顾,看到太王古公亶父治下的周邦当兴,故决心保佑周王。诗中“乃眷西顾,此维与宅”,是说上帝由殷都向西看,看到太王古公亶父治下当兴的周邦,并非是“西吴说”主张者所说的自周原向西看到泰伯所宅之地,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

很显然,“西吴说”以对《诗经·皇矣》这样的解读来作为“泰伯奔吴”是“奔”在“西吴”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4. 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的记载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西伯卒,太子发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太王,追封太伯于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北吴”原是周原的北夏墟,是周武王灭商后,在追封泰伯及后世继承者仲雍曾孙周章勾吴君位的同时,又另外赐封给周章之弟(仲雍的另一个曾孙)仲作为虞国封地的。据《史记索隐》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墟。”仲以国得姓,称为虞仲,因虞在周之北,故称北吴或吴虞。而史籍记载,仲雍亦号虞仲,祖孙二人相隔四代但却同号。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祖孙二人同号,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将两个“虞仲”混为一谈,将仲雍曾孙仲的封地,误作为即是昔日仲雍、泰伯奔吴的出奔地。仲雍曾孙仲的封地北吴(或吴虞),与当年泰伯、仲雍奔吴的出奔地勾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这一点,我们只要仔细读一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史记·吴太伯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很显然,仲雍曾孙仲的封地“北吴”,即是太史公所说的“其一虞,在中国”的“中国之虞”,而泰伯、仲雍所出奔的是“其一吴,在夷蛮”的“夷蛮之吴”。两者不是同一个国家,而是不同的两个国家,两者之间,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太史公所作的这样的强调,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切不要混淆仲雍曾孙仲的封地“中国之虞”(“北吴”)与当年泰伯、仲雍奔吴的“荆蛮句吴”(“东吴”)。而司马迁之所以知道“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是因为“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从司马迁所说的话中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时期,对仲雍曾孙仲的封地“中国之虞”也即如今“北吴说”所说的北吴,与当年泰伯、仲雍奔吴的“荆蛮句吴”即如今“东吴说”所说的东吴,人们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了两者的由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尽管太史公没有具体讲他究竟读了哪些“春秋古文”,但是这也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仲雍曾孙仲的封地“中国之虞”——“北吴”,不是当年泰伯、仲雍奔吴的出奔地——“荆蛮句吴”(即“东吴”)的明确记载。因此如果时至今日,讨论关于“泰伯奔吴”奔在何处的问题,再将“北吴”——仲雍曾孙仲的封地“中国之虞”拿出来做文章,实在是一件很可笑很无聊的事情。

二.“宁镇说”、“赣鄱说”考辩

主张“宁镇说”的人认为,泰伯、仲雍奔吴是“奔”在今江苏南京、镇江及皖南地区。“宁镇说”

是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发现了一些文物，尤其是“宜侯矢簋”这件珍贵的青铜器后提出来的。

“宜侯矢簋”1954年6月出土于江苏省镇江丹徒大港镇烟墩山。出土时，被一个想看看是否是金器的农民用锄头打碎，严重损坏，现存的“宜侯矢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铭文缺少了一些关键性的字，可辨认者有118个字。一些考古专家经过考证研究，认为这段簋铭记载了周武王、周成王伐商后周康王改封并迁虞侯矢为宜侯(矢原为虞侯)，并赐予矢土地、弓矢、奴隶若干的事情。宜侯矢为感激和纪念周王的封赐，特地铸造了这件宝器。据郭沫若先生考释，“宜侯矢簋”铭文的具体内容为：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位于宜宗社南鄉(向)。王令虞侯矢曰：“繇，侯于宜。锡□鬯一卣，商鬲(瓚)一枚，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甽)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卌。锡在宜王人□又七姓。锡奠七伯，厥盵□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宜侯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由于郭沫若先生和唐兰先生认为簋铭中有“虞”字，而“虞”就是“吴”，作器者乃是吴君，给早期吴史提供了证据。于是乎，一些人就据此加以引申发挥，进而提出了“宁镇说”，提出：宜侯矢是仲雍四世孙周章(也有人认为“矢”是周章的弟弟——虞仲)，成王时封为虞侯，康王时又封他为宜侯。宜侯矢簋铭文中“虞”和“宜”字，都与“吴”字相通，“宜和吴是一声之转，因江南方言缘故”，宜的地望就在丹徒附近，为宜侯矢的封国都邑所在。宜地是西周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吴的早期国都地望是在后期吴都的北方，当即今宁镇地区”，“吴国的发祥地当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分布区域宁镇及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今江宁县一带系吴国始建和发轫之地。既然宁镇地区是“吴国的发祥地”、“吴文化的发祥地”，那毫无疑问，当初泰伯、仲雍自陕西岐山南奔，理所当然就是“奔”在宁镇地区。

主张“赣鄱说”的人认为，泰伯、仲雍奔吴是“奔”在今皖西南、赣北鄱阳湖流域一带，认为勾吴国长期存在于赣鄱地区，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向东迁移至今无锡、苏州一带。具体而言，该说提出两个理由：一是自清朝以来，在鄱阳湖周围地区，陆续发掘出不少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勾吴国青铜器，尤其是清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府出土者减钟十一枚，上有铭文“隹正月初吉丁亥，工虡王皮𪜈之子者减择其吉金，自作□钟……”顾颉刚先生根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史记索隐》的有关记载考证，认为铭文中的“工虡王皮𪜈”当即勾吴国国君柯转。皮、柯古音同在歌部。𪜈、转古音同在元部；𪜈，古然字。王国维以为颇高，盖读𪜈从焦声，失之。颇高乃柯转之子，颇高之子为句卑，与晋献公同时。是则皮𪜈当在春秋初年。据本器出土地，知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域远在江西。二是在鄱阳湖西南一带，有许多与“吴”有关的历史地名。如今江西樟树市就是吴城商代遗址和新干县大型商墓所在地。在该地历史上有过二个吴城和一个虞城，在今鄱阳湖之西的永修县境内，历史上也有一个吴城。这些遗留下来的古地名，是当年勾吴国存在于今江西鄱阳湖流域地区的有力证据。

“宁镇说”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强烈质疑，纷纷提出否定意见。综合专家的种种质疑和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考证分析，我们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其理由有很多方面，主要有：

1. 一些对宜侯矢簋铭文经过仔细辨识考证的专家并不完全赞同郭沫若、唐兰先生的考释，他们认为，簋铭中并不是“虞侯矢”，而是“虔侯矢”，“虔”字清晰可辨。指出，因此簋出土于镇江丹徒勾吴大墓，由于在古代“吴”“虞”二字相通，于是便硬是将“虔”字识认为“虞”字，以便与“吴”拉上关系，这种做法是牵强附会的，令人难以信服接受。再加上“宜”字、“虔”字而引发出三国、四

国之争,乃至多年来未争出一个头绪,完全是人为地把问题复杂化了。当然，对簋铭中究竟是“虞”字还是“虔”字,还可再作进一步的考释讨论,但至少说明,在这一点上学术界是存有不同意见的,并没有得到一致公认。这种没有得到一致公认的“证据”,显然是缺乏强大说服力的。

2. “宁镇说”为表明其所提出的“宜侯矢是仲雍四世孙周章（也有人认为“矢”是周章的弟弟——虞仲),成王时封为虞侯,康王时又封他为宜侯”这一见解的正确,声称“宜侯矢簋”铭文中“虞”和“宜”字,都与“吴”字相通,“宜和吴是一声之转,因江南方言缘故”。一些专家指出,这一说法在历史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经查考,“宜”字与“吴”字不论古今都无相通的根据,所谓“宜和吴是一声之转,因江南方言缘故”这种理由,只是一些并不真正懂“江南方言”、持“宁镇说”的人自己想当然的推论而已。“宜”字也仅见于“宜侯矢簋”的铭文中,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均阙如。而据史籍记载，虞国是直到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才被晋国灭掉的(《史记索隐》曰:“《春秋经》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在此之前,虞国一直是存在的,没有变动过。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周康王姬钊公元前1020–公元前996年在位,因此,也根本无周康王将虞公改封为虔公或将虞侯改封为宜侯的可能。

3. 一些专家经考证指出，宜侯矢簋产生的背景是:矢世为作册(史官),由商及周。矢为虔公父丁之子,周康王南巡时随行。矢原继父爵为虔侯,虔地在赣南,宜地在赣中西部(袁水西有宜春,后被吴吞并,成为吴邑)。康王至宜,把矢从较贫瘠的虔地改封到较富庶的宜地，改虔侯为宜侯。矢为感激、颂扬王恩,作此簋并作铭文记封赏的盛况。由于此簋于1954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因此有人便以为宜侯即是吴君,宜国即是吴地。众说不一,矛盾多出。其实历史上虔、虞、宜、吴各有其国,各有其地,是不能迁虔为虞,以吴为宜的。也不能因此簋出土于吴而断定其为吴地吴物,更不能断定其墓主即为宜侯。如果宜地确在赣中西部这一带地区，作为宜的国宝的“宜侯矢簋”,在宜地被吞并为吴邑时,当然就成了当时吴君颇高的战利品。矢簋被颇高带回朱方(吴邑,治所在今江苏省丹徒县东南),最后在颇高去世时又成为颇高的殉葬品。所以,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矢簋的勾吴大墓可能并非宜侯之墓，而该是吴国中后期国君颇高的陵墓。

4.《史记·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这些记载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自太伯作吴”到“周武王克殷”封周章、虞仲,吴国一共历经了太伯—仲雍—季间—叔达—周章(虞仲)五世。同时,专家又根据对“宜侯矢簋”铭文可辨别之字的考释,考定这是周康王时的器物。而从周武王到周康王,则周又历经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二世。这也就是说,“自太伯作吴”到出现“宜侯矢簋”的周康王时,中间一共历经了七世吴君、周王。根据测算,这七世吴君、周王的在位时间前后累加至少在百年以上(虽仲雍、季间、叔达、周章在位时间不详,但据《吴地记》等文献记载,仅泰伯就在位49年;又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周武王在位4年、周成王在位22年、周康王在位25年)。因此,如果“宜侯矢簋”确是周康王时的吴君之物,其与泰伯也已相隔七世,距“太伯作吴”至少已有百年之遥。因此“宜侯矢簋”决非泰伯、仲雍奔吴当时的物件,也就是说,不是“吴国始建和发轫”时的物件，根本就不能作为宁镇地区是“吴国的发祥地”、“吴文化的发祥地”的实证依据,决不能作为泰伯、仲雍奔吴的佐证,证明百年前泰伯、仲雍奔吴就“奔”在镇江丹徒这里,勾吴国国都是在镇江丹徒。“宜侯矢簋”等青铜器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至多只能说明镇江丹徒、宁镇地区在吴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曾经具有

较大的繁荣、是受吴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曾经是吴国的一个经济、政治重镇而已。这一点,就连考释“宜侯矢簋”铭文中有“虞”字,而“虞”就是“吴”,宜侯矢是仲雍四世孙周章的郭沫若先生,也是客观地持这样观点的。他在《中国史稿》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周朝在东南方最远的同姓诸侯是吴国(今江苏无锡东南)。传说吴国是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率领一部分周人跑到那里,和当地居民相结合而建立的。太伯和族人接受了当地居民‘断发文身的风俗,同时把周人传统的耕作、筑城等技术传到那里,溶合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文化。”同时,郭沫若先生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吴国是周朝追封的,同周朝的来往不多。附近还有一个宜国,是成王把西部的虞侯改封到那里的。江苏丹徒出土的一批周初青铜器中有一件矢簋,在铭文中详细地记载了虞侯矢被改封为宜侯的事迹。铭文记载着成王授予宜侯土地和人民,还赐予宜侯矢彤弓彤矢等,使其得专征伐。和矢簋一同出土的一对青铜角状器,铸有风格别致的编织纹,跟当地几何印纹陶器的花纹相似。安徽屯溪西周墓中发现的青铜器,也有特殊的编织纹……这些发现证明,周朝的势力和影响已经到达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①]不知那些以郭沫若、唐兰先生对“宜侯矢簋”铭文的考释为依据,竭力鼓吹宁镇地区是“吴国的发祥地”、“吴文化的发祥地”,大肆炒作泰伯、仲雍奔吴“宁镇说”的人,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些论述又作何解释呢?

至于“赣鄱说”,此说出来后在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少共鸣,也未得到什么支持,认同者寥寥,因为大多学者认为,即使减钟上的铭文如顾颉刚先生所考,也至多只能证明减钟是古吴国遗存的器物,说明历史上古吴国的势力范围曾达到过鄱阳湖周围地区,但绝不能以此作为鄱阳湖周围地区是泰伯奔吴落脚地的依据。故而,此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赣鄱说”和“宁镇说”一样,都是以考古实物资料为核心,并结合文献资料构成证据的,应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二“说”所依据的考古实物资料,都属勾吴国早期和中期,而非泰伯奔吴之初、勾吴国始建时期的器物,所以均无法作为泰伯奔吴落脚地在“宁镇”或在“赣鄱”的佐证,均难以成立。同时,这二“说”都无法解释《左传》和《史记》记载的泰伯、仲雍出奔到达定居点后,要“断发文身”这一做法的现象,以及《左传》记载的周王室将吴“弃在海滨”的地理位置(《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意思是说,吴国的始祖是周朝始祖太王的直系后裔,被遗弃在海滨。海滨,就是指今无锡、苏州一带。在三千多年前,长江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喇叭口顶端在今江阴附近,南边江岸线在今常熟、太仓一带,而海岸线在今太仓、外冈迤南至杭州湾北岸柘林附近。长江口水面辽阔如海,今无锡、苏州距离当时的江岸线、海岸线都很近,因此当时称这一带地区为海滨)。因此,不论是“宁镇说”或“赣鄱说”,都无法取代泰伯奔吴落脚地在无锡梅里的“东吴说”,至多只能说明勾吴国的早期和中期,曾经在今宁镇地区和赣鄱地区存在过而已。

三.“两吴说”考辩

所谓“两吴说”即是“西东两吴说”,此说既赞同“西吴说”,同时又加上“东吴说”。认为泰伯是陕西岐山人,其父古公亶父在岐山建立了商政权下的一个小国,泰伯、仲雍兄弟俩为尊重父亲的意愿将王位让给小弟季历,先出奔到岐山西100多公里的吴山,建立了一个氏族小国(即“西吴”)。不久,其父古公亶父病逝,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遵照氏族传统让位给泰伯。季历便到“西吴”去请泰伯、仲雍。泰伯、仲雍回到岐山奔丧,极尽孝义之道。季历依照父亲遗命要将王位让给泰伯,按照氏族传统,作为大儿子的泰伯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8–229页。

应继承王位,但泰伯坚辞不受,坚持把王位让贤于小弟季历,季历不从。泰伯多次辞让不成,为表辞让王位决不反顾之心，便带了弟弟仲雍一起离开“西吴”,一路跋山涉水,辗转迁移,最后到达了“东吴”——长江入海处的江苏无锡一带,即今无锡梅里,建立了“勾吴”小国,开拓江南,使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产生了灿烂的吴文化。

这个所谓的“西东两吴说”,实际上并不能自成其为一“说”,只不过是“东吴说”的细化和补充。因为我们说的“泰伯奔吴”奔在何处,是指“泰伯奔吴”的最终落脚地在何处,“两吴说”所说的泰伯先奔“西吴”,最后又奔到“东吴”,落脚于江苏无锡梅里,只是细化了泰伯奔“东吴”中间的曲折过程,其最终落脚地还是在“东吴”,因此它与“东吴说”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奔”的过程更具体了一些(至于这先奔“西吴”后奔“东吴”的过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可再作进一步研究讨论)。因而说到底,所谓的“西东两吴说”实质上也就是“东吴说”。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今陕西宝鸡、吴山一带,很可能是泰伯的采邑,泰伯即使出奔过吴山,也是在出奔荆蛮之前。出奔采邑地吴山与出奔荆蛮是两码事,两者在时间上一先一后,并不存在矛盾。这只是反映出泰伯出奔荆蛮前很可能是先到达自己的采邑地吴山,然后再从采邑地吴山出发的。

四.“东吴说”考辩

“东吴说”认为,“泰伯奔吴”的出奔地是在“东吴”——即地理方位处于周的所在地陕西岐山周原东南方向的长江下游江南江苏地区,也即《史记》、《汉书》、《吴越春秋》所说的“荆蛮”地区。

“东吴说”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最明确、也最得到普遍认同的意见。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早在成书于西周早期周穆王时代的《穆天子传》卷二中,即有“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的明确记载。

《穆天子传》初名《周王游行》,据《晋书·束晳传》记载,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名叫不准的人在今河南汲县盗发魏襄王墓(一说安釐王冢)时出土的。据说当时从这个古墓中“得竹书数十车”,被称为“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就是“汲冢竹书”中的一种。《穆天子传》出土后,当时博学多问的著名学者荀勖、束晳等就对竹书进行了整理、编订,共五卷,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游、东游之事;后来,西晋建平太守郭璞之子、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在注《穆天子传》时,将原在竹书出土的“杂文十九篇”中关于穆王妃盛姬死事也作为一卷编入其中,共合为六卷。明代文献学家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以为《穆天子传》“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考定其“盖周穆王史官所记”。今学者常征读过洪颐煊氏校注本《穆天子传》后,竟发现书中所记山川村落都可一一考出。又与《水经注》对照,有郦道元据《穆天子传》注释有关山川的明显痕迹。惊讶之余,他深入研究,逐条加以排比训释,终于在1977年完成《穆天子传新注》一书,明确得出结论:“《穆天子传》者,西晋所出汲冢周书也,非晋人伪造,非汉人伪文,亦非战国时人作”,而是“身随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先秦古籍之一”。这也就是说,古今学者都确认《穆天子传》作于周穆王时期。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西周王朝自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周穆王姬满是西周早期的国王,是继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康王姬钊、周昭王姬瑕之后的西周第五位天子,其在位时间55年(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距今已有将近三千年之久。因《穆天子传》“盖周穆王史官所记”,是由“身随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故《穆天子传》成书时间当然距今同样也已有将近三千年。而将近三千年前周穆王史官在作此书时,与“泰伯奔吴”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相距时间是很近的,用历史学观点来加以衡量的话,当属近现代史范畴。因而,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周朝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周朝的史官,对于相隔并不久远的周朝开国时期所发生的“泰伯奔吴”之事,无疑应该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所以,《穆天子传》

书中所作的“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这一记载,显然应该说是符合史实的、可靠的、可信的。近代尊信《穆天子传》并为之考证注释的刘师培、丁谦、顾实、卫聚贤、张公量、小川琢治(日)以及顾颉刚、高夷吾、王贞珉、岑仲勉、王范之、苏尚耀、卫挺生、赵俪生等著名学者,都认为《穆天子传》虽不完全是周穆王的实录,但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小说,而是一部先秦杂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尤其是其地理文献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而《史记》、《汉书》、《吴越春秋》都说“泰伯奔吴”的出奔地在“荆蛮”,这与《穆天子传》所说的周太王古公亶父“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在地理方位上也是相一致的,这也说明,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的泰伯奔吴“东吴说”,在我国历史上是普遍得到认同的。

但是,泰伯奔吴“东吴说”也遭到了有些人的质疑和反对,他们所提出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在当时的道路交通和政治环境条件下,泰伯、仲雍要从周的所在地陕西岐山周原,千里迢迢地长途跋涉到长江下游江南江苏地区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这一理由貌似有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就连近代最早提出并坚决主张“西吴说”的学者卫聚贤先生也不并认同这一意见,他在《太伯之封在西吴》一文中说:“太伯实有其人,由陕西到江苏非过重洋大海,而其故事又无神话杂错其间,是太伯封于东吴,当然可信。”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其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也说:“依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吴的建国是在吴泰伯和弟仲雍的时期。相传,当周古公亶父(即太王)时,他已准备‘翦商’。他预见到他的小儿子季历将生一个大人物(文王昌),因此要把王位(其实当时尚未建国)传给季历。大哥泰伯、二哥仲雍知道了父亲的意图之后,便自动跑到了‘荆蛮’,以便父亲传位给季历。象这样的美德,在古代倒并不奇怪。然而‘荆蛮’终究在哪里呢?要说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区域,就是泰伯、仲雍所建立的吴国(无锡),好像是太远了。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形下,这难免使人怀疑。然而古人迁徙的能力却确是惊人的。依人类学者所说,他们甚至远渡重洋,爬过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今人所认为不可能的,古人反而可以做到。而且夏商周三代既然已进入文明时代,就更没有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定。”《西周史》作者、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太伯、仲雍由渭河流域出来,经过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湖北,其势不难。在湖北立足就未必容易。(商人在湖北自有据点,盘龙城的遗址,俨然是镇守一方的气象。)商人势力,可远到江西吴城。这支远征军也只有远趋长江下游,方可立足。”①

那么,泰伯“奔”到“东吴”(即“荆蛮”)后,具体的落脚地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本来是有据可查,一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江苏无锡梅里。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吴文化研究、开发热的兴起,及由此而引起的“吴文化发源地之争”的日益激烈,一些人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和利益需要出发,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说泰伯奔吴的落脚地是在苏州吴县,有的人说泰伯奔吴的落脚地是在镇江丹徒,还有人说泰伯奔吴的落脚地是在常州武进淹城,等等。而持这些观点的人,又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无锡,说泰伯奔吴奔在无锡梅里,是无锡人为争夺“吴文化发源地”自我宣传用谎言编造出来的,云云。那么,泰伯“奔”到“东吴”后,具体的落脚地到底在哪里呢?泰伯奔吴奔在无锡梅里,真的是无锡人自我宣传编造出来的谎言吗?

真正的权威的历史学家都是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公正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必作无谓的争论和无端的指责,只要看看一致公认的我国权威历史学家是怎么说的就可以一清二楚了: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其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说:“‘荆蛮’终究在哪里

①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7、88页。

呢？要说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区域，就是泰伯、仲雍所建立的吴国(无锡)，好像是太远了。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形下，这难免使人怀疑。然而古人迁徙的能力却确是惊人的。依人类学者所说，他们甚至远渡重洋，爬过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今人所认为不可能的，古人反而可以做到。而且夏商周三代既然已进入文明时代，就更没有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定。”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范文澜先生，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无锡梅里是他写进《中国通史》中唯一的江南古镇，他在《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三章中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太伯逃奔江苏无锡东南梅里，做荆蛮人君长，筑城建都，国号：‘吴’。”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说得更为具体更为清楚：“周朝在东南方最远的同姓诸侯是吴国（今江苏无锡东南）。传说吴国是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率领一部分周人跑到那里，和当地居民相结合而建立的。太伯和族人接受了当地居民‘断发文身’的风俗，同时把周人传统的耕作、筑城等技术传到那里，溶合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文化。”[①]正因为泰伯奔吴在无锡梅里筑城建都建立勾吴国，开创了辉煌的吴文化，因而，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历史地理学鼻祖、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张其昀在巨著《中华五千年史》中说：“东南之文化，不在苏杭，不在京(宁)镇，而在无锡之梅里。”

这四位确认泰伯奔吴“奔”在江苏无锡，并在无锡梅里筑城建都、建立吴国的著名权威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是河南开封人，范文澜先生是浙江绍兴人，郭沫若先生是四川乐山人，张其昀先生是浙江宁波鄞县人。四人都不是无锡人，都与无锡没有任何瓜葛和利害关系，他们根本没有为无锡编造谎言的一丝一毫的必要。他们在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作出来的泰伯奔吴“奔”在江苏无锡，并在无锡梅里筑城建都、建立吴国的论述，尊重的是历史事实，秉持的是历史学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一事实极其雄辩而公正地说明，泰伯奔吴奔在无锡梅里，在梅里筑城建都建立吴国，并不是有些人所指责的是无锡人自己编造出来的，而是权威史学家们一致公认的历史事实。那些指责无锡人为争夺“吴文化发源地”编造泰伯奔吴在无锡梅里谎言的人，不知道对四位权威历史学家写进四部中国通史巨著中的明确论述又作何解释呢？

众所周知，权威的历史学家治学都是极其严谨的，可以确信，他们明确地作出泰伯奔吴“奔”在江苏无锡，并在无锡梅里筑城建都、建立吴国的论述，决非随意为之，而是在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考证的基础上所得出来的客观结论，是具有极其充分的历史依据的！事实正就是如此，在我国历代古籍文献中，确实可以查找到大量关于泰伯奔吴奔在无锡梅里的记载。因为不论古今，任何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都要有居所，死了都要有安葬的地方，尤其是在重视“厚葬”的古代，人死后“归葬故里”更为讲究，泰伯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只要弄清楚了泰伯生前的居所即泰伯城在哪里，死后的安葬地即泰伯墓在哪里，无疑也就找到了泰伯奔吴时的落脚地。

根据查考，最早记载泰伯奔吴落脚地为“梅里”的是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曰：“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元代徐天祜为“太伯城”作注曰：“太伯所都谓之吴，城在梅里平墟，今无锡县境。”为“梅里平墟”作注曰：“即太伯故城之地。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皇览》云：‘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二说不同，此云平墟，当以刘说为正。”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28–229 页。

我们认为,《吴越春秋》这一记载及元代徐天祜所作的注,十分雄辩地说明了无锡“梅里”即是最初泰伯奔吴的落脚地。因为泰伯不仅生前居住的都城在“梅里平墟,今无锡县境”,而且他去世后也“葬于梅里平墟”“无锡县东皇山”。按照我国古代普遍遵循的人去世后要“归葬故里”的社会习俗,泰伯去世后,本是应归葬于故里岐山周原周王室祖茔的,但因泰伯早已“三让天下”,并为避争抢王位之嫌已立下决不反顾之心,且数千里路途遥远,也根本无法将他的灵柩运回岐山周原周王室祖茔安葬。正因为如此,人们只得退而求其次,将他安葬在他的第二故里——他最初奔吴时的落脚地无锡“梅里”。所以,《吴越春秋》记载了泰伯生前的居所和死后的安葬地,实际上也就等于记载了泰伯奔吴时的落脚地。

不过,有些人也许并不认同这一论证意见,会提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并未具体言明是哪一个“梅里”,在江南地区古名为梅里的地方有好几个,无锡有,苏州吴县也有,常熟也有,镇江也有,谁知赵晔所说的“梅里”究竟是哪一处呢?怎么能说就是无锡梅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对其他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遗存再作一番更加深入细致的查考就可以明确了,而且会随着查考的逐步深入,越来越明确。

经专家查考,《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生活于东汉早期,其生平经历大致为:约生于汉光武建武九年(33年),年轻时短暂地做过县里的小官吏,于汉光武建武三十一年(55年)至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之间的某个时间至犍为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开始学习,并一直追随左右,直至汉章帝建初五年(80年)杜抚去世才返回家乡。回乡之后,他没有接受州里希望他做部郡国从事史的任职令,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被察举为有道,在之后的几年间去世。在赵晔去世40多年后,他在《吴越春秋》中没有言明的“梅里”在哪里的这个问题,在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吴郡太守糜豹奉旨修建泰伯墓时所写的《泰伯墓碑记》中得到了明确。糜豹的《泰伯墓碑记》曰:

考古史,周太王生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季历生子昌,有圣瑞,太王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豫知之,偕仲雍托采药而之荆蛮。荆蛮人义而归者千余家,立为君长,号曰句吴。于是筑城郭以为藩卫,穿浍渎以备旱潦,尚端委以治周礼。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则泰伯之德光昭宇宙,犹如日月,固不待祠而显冢而存者。但体魄归藏之处,正吾儒报本追远之地。苟不于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栖在天之灵,致后人如在之诚哉。余幼时读鲁论之暇,每思泰伯之风,彷徨而不可企洎乎。受命南邦,诏建泰伯墓庙于梅里皇山,乃率群僚各属鸠工庀材,四方人士子来如云,不数月而就。其规模弘远,霞骏云蔚,巍然肖皇山之宫焉。凡官师庶长暨宗子里士,南北使轺,四方游旅,骏奔对越,咸肃且訢,瞻庙貌之日新,庆鸿构之不偶,其敦礼让,举蒸尝,登俎豆,陟降周旋,各主鬯乎皇山之墓。升其堂,怳然如有闻;入其室,僾然如有见;望其陵,而孝弟廉让之心戚戚如有动焉。呜呼!至德之感人有如是乎。斯举也,不惟皇上尊崇古圣有关于当世之教化良多,即万代之后其功德宁有尽耶?吾愿后之人时加补葺,永为守御,则至德之墓因圣朝敕建而愈著,即圣朝敕建之功亦与至德而弥光矣。

碑文中十分清楚地写明“诏建泰伯墓庙于梅里皇山”,“升其堂,怳然如有闻;入其室,僾然如有见;望其陵,而孝弟廉让之心戚戚如有动焉”。而在无锡梅里、苏州吴县梅里、常熟梅里和镇江梅里中,唯独无锡梅里有皇山(皇山原名铁山,《吴地志》与《南徐记》载:泰伯死后葬在离梅里东北正九里之遥的铁山尾南麓,从此铁山更名为“古皇山”。后因东汉高士梁鸿葬于山上,又称鸿山),其他三个地方的梅里都没有皇山。因此,显而易见,那泰伯墓无疑是在无锡梅里。而泰伯墓在无锡梅里,那无锡梅里当然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泰伯去世后归葬的“故里”,既然无锡梅里是泰伯归葬的“故里”,那当然也就是最初

泰伯奔吴的落脚地。

本来,根据赵晔《吴越春秋》和糜豹《泰伯墓碑记》的记载,泰伯墓在无锡梅里,泰伯奔吴的落脚地在无锡梅里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吴文化研究、开发热的兴起,及由此而引起的“吴文化发源地之争”的日益激烈,一些人又从三国曹魏文帝时(220–226年)由王象等人奉敕撰集、隋唐后已失传、现仅存清人孙冯翼辑出佚文一卷不及四千字的《皇览》中,抠出了“吴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这样缺头少尾的半截子话为依据,来大做文章,企图藉此否定泰伯墓在无锡梅里,进而否定泰伯奔吴的落脚地在无锡梅里。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片面地把“去城十里”解释为“去吴县城十里”,并据此声称:“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以今天的长度标准来看,“去城十里”的路程不过就是四公里而已,所以泰伯墓应该就在苏州城北不远,理应在苏州境内,这与无锡所称在鸿山南麓是不相符的。有的更是煞有介事地作了一番精心计算,声称:宋代五尺一步,宋一尺合今公制30.72厘米,一步约1.536米。又300步为里。计算得到结果一宋里=460.8米,那么“去城十里”就是离开4608米。这个距离在苏州境内。有的甚至还断言:“太伯冢在吴县北,去城十里”,在灵岩山下立碑,此处才是真正的泰伯之墓。看到这些“高论”,实在令人感到哑然失笑和遗憾至极。因为这些“高论”将“去城十里”解读为“去吴县城十里”,这早在十多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南朝、唐朝的学者所否定和纠正,古代学者早就明确指出,《皇览》中所说的“去城十里”,并非指的“去吴县城十里”,而是指的去泰伯生前居所泰伯城十里。早在1500年前南朝梁武帝时,最早给范晔《后汉书》作注、“世称博悉”、曾做过无锡县令、亲自考察过泰伯墓的刘昭,在其所作《后汉书·注》中,就对《皇览》的这一说法予以了纠正和补充。他在注《后汉书·郡国志》中明确地说:“《皇览》曰:‘吴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勾吴。’臣昭案: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臣昭以为即宅为置庙,不如《皇览》所说也。”这个问题,在1370多年前唐朝的《括地志》中就解释得更为清楚了。《括地志》是中国唐朝时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奏请修撰并主编。全书正文550卷、序略5卷,征引广博,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括地志》中明确记载:“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并对《皇览》所说的“吴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括地志》对《皇览》的这一解释得到了后世历代学者的公认和肯定,其后被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等历代史志沿用。同时,历代以来还有其他许多史志对泰伯墓在无锡梅里(皇山)、泰伯居所在无锡梅里也作有明确的记载。诸如:

南朝的历史地理著作《南徐记》曰:“太伯宅东九里,有皇山,太伯所葬地。皇山即鸿山。”

南朝梁陈时期顾野王的中国地学巨著《舆地志》的“泰伯城”条曰:“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梅里乡。”“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三十余里,在吴西北隅,曰故吴墟。”“梅里”条曰:“吴作城梅里平墟即此地,城内有泰伯宅,堂基及井尚在。”

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注“吴太伯”曰:“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又说:“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府无锡县梅里村,其城及冢现存。”

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泰伯城”条曰:“泰伯城筑于梅里平墟,其地汉为无锡县,地属会稽郡,东汉为无锡侯国,属吴郡。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今日梅里乡、亦曰梅里村,泰伯庙在焉。城东五里曰皇山,一名鸿山,有泰伯墓。”

《吴地记佚文》“梅里”条曰:“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吴地记》,赞同其说,也认为泰伯奔吴到的是无锡梅里。

唐代李吉甫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常州无锡县”条云:“无锡县,望。西北至州九十六里。汉旧县也。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

宋初乐史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无锡县”条曰:“泰伯墓,在县东三十九里。《冢墓记》:‘太伯墓在会稽吴县北梅里聚,去城一十里。’《舆地记》云:‘宅东九里有皇山,太伯葬梅里山是也。’”“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舆地志》云‘吴筑城梅里平墟’,此也。自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公子光刺王僚即此。城内有太伯宅,井及堂基见在”。

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六《封域》曰:“吴自太伯以来,所都谓之吴城,在梅里平墟,乃今无锡县境,即今苏州也。”

宋代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订的《吴郡志》卷三城郭“太伯城”条曰,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四十里梅里乡,“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又曰吴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

宋代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梅里”条曰:“无锡古勾吴地,泰伯旧国,其城在今梅里乡。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周敬王六年,阖闾始城姑苏而迁都焉。”“泰伯城”条曰:“泰伯城在县东南四十里,《吴越春秋》云:‘太伯当商之末,恐中国使至,兵及其境。筑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寰宇记》云:‘城去县四十里,高三丈。’《吴地记》云:‘吴筑城梅里平墟,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或名吴城。’”

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卷三下“古迹三之六”曰:“无锡自太伯作都于前,春申封国于后,而高人名士接武其间,遗踪古迹因人而在,观其树犹可以想其人也。太伯城,《毗陵志》云在州东南四十里;《史记》云太伯奔荆蛮,荆蛮之徒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越春秋》云:太伯当殷之末,恐中国侯王用兵以及荊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墟。自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吴公子光刺王僚即此都也。《寰宇记》曰: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宋史云太伯始所居地,名曰‘句吴城’。《吴地记》云:吴筑城梅李平墟,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猶存,或名‘吴城’。”“周吴太伯墓”条曰:“《寰宇记》云,太伯墓在县东三十九里。《吴地志》云,墓高一丈四尺,周围三十五步。《冢墓记》云,太伯墓在会稽吴地梅里聚,去城十里。按秦汉时,毗陵尝属会稽郡。《南徐记》云,太伯宅东九里有皇山,太伯所葬之地。《史记·吴太伯世家》注《皇览》云,太伯冢在会稽吴地梅李平墟,去城十里。《吴地志》又云,九里有山,太伯葬于梅李山平墟,即此地也,刘昭曰,按县东皇山有太伯冢,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舆地志》云,太伯宅东九里为皇山,卒葬南域。《南徐记》云,晋殷师为晋陵太守,尝表其墓,复一户以为守卫,今州东南梅李乡梅李有东皇山即太伯城也。又按皇山今名鸿山,在延祥乡,到州五十里,山下有太伯庙,太伯坟在其山上。”

明孝宗弘治己未(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文撰写的《泰伯墓碑记》曰:“泰伯遭商周之际,以让德逃之荆蛮,寓无锡之梅里,号勾吴。东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间,古谓之三吴者,皆以沾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自伯渎之阴曰梅村,盖伯居在焉。渎名伯,相传以为由伯而凿是也。伯殁葬鸿山之西岭,去梅村地五里,今乡人所指吴王墩者,即伯墓也。山以鸿名,谓汉隐士梁鸿居于是,而前此不称鸿而称皇,亦以伯故也。”

明熹宗天启癸亥(天启三年,1623年)高攀龙撰写的《泰伯墓碑阴记》曰:“吾邑之鸿山,古所称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记》及圣贤冢墓记,同其为泰伯墓审矣。盖梅里平墟为泰伯端委

之地,皇山为归藏之地,两地并重。”

清同治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泰伯墓”条曰:“案《吴越春秋》泰伯卒,葬梅里平墟。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泰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西梅里村鸿山上,去泰伯所居城十里。案今梅里属金匮县。吴县村镇有梅梁里,无梅里。前志云,今无锡吴县界俱有梅里之名,或因梅梁里而误也。”卷四城池“府城”条曰:“为阖闾故都,自泰伯城梅里平墟,诸樊徙都于此。”

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四城郭“梅里”条曰:“梅里,泰伯旧都,于邑为最古。”卷十二冢墓“泰伯墓”条曰:“泰伯墓,在皇山,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史记》裴骃注《皇览》曰,泰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乾隆志》云,城谓故吴城非吴县城,冢与城皆统于梅里是也。《后汉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 泰伯所葬地皆足证去城十里之说。《咸淳志》引《南徐记》晋殷师为普陵太守表其墓,复一户护守云。明宏治间,邑人杨文建亭表之。国朝康熙十二年,知县吴兴祚重修。雍正四年,金匮知县王乔林立石禁民樵采。乾隆三年,金匮知县王允谦奉帑葺庙宇,更建墓门。二十五年无锡知县吴钺、嘉庆二十三年金匮知县齐彦槐又再修之。”

清道光吴存礼辑《梅里志》卷二祠墓“泰伯墓”条曰:“泰伯墓,在鸿山。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俗名吴王墩。《吴越春秋》:泰伯卒,葬于梅里平墟。《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即今鸿山也。刘昭《后汉书》注:《皇览》言吴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误也。昭案: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蠡湖野史记略》云:泰伯葬地在皇山,后梁鸿卜居其下,因改鸿山。考《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刘昭亦云: 县东皇山有泰伯冢, 则泰伯葬于山下无疑者。王文恪未及细核,乃云板村之内,有丘隆然,即认为泰伯之故封。又云:泰伯之墓不于山,于平地,失其据矣。《锡志》云:《冢墓记》谓泰伯墓在会稽吴县北梅里聚,去城一十里,虽秦汉时吴地本属会稽,而云去吴城十里为不合。梅里平墟是泰伯始基之地,故当以《南徐》所载为是。明弘治中,邑绅杨文谋于郡守连公盛建亭墓前。亭渐圮。天启间,邑诸生蔡璋、华懋悌、浦光腾等募资修葺,邑绅华允诚立石表墓,高忠宪攀龙记其碑阴。国朝康熙甲寅,诸生许廷铨、蔡鹤龄、浦受洙、马弘敷等,呈请知县吴兴祚兼募里中捐资修葺。”卷二城郭“泰伯城”条曰:“在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梅里乡,泰伯始国于此,谓之句吴。《吴越春秋》:太伯当殷之末,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吴西北隅,曰故吴墟。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舆地记》:吴筑城梅里平墟,即太伯城也。《寰宇记》: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吴地记》:太伯筑城于梅里,今曰梅里乡,亦曰梅里村,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亦云吴城。《毗陵志》:无锡古句吴地,泰伯旧国,其城在今梅里乡,自泰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周敬王六年,阖闾始城姑苏,而迁都焉。”

清光绪吴熙辑《泰伯梅里志》卷四陵庙“泰伯墓”条曰:“泰伯墓,在皇山西岭,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即今鸿山。’《皇览》冢墓记:泰伯冢在会稽吴县北梅里聚,去城一十里。晋咸和中,殷师为晋陵太守,表其墓,置守冢一家。明王文恪鏊作庙碑记,未及细核,乃云无锡板村有邱隆然,即认为泰伯之故封,失其据矣。弘治十四年,里人杨文建亭表之。天启三年,里人华允诚重立墓碑。国朝康熙十三年,邑令吴兴祚重修。山广五百亩,多木石,环山之民,蹂伐殆尽。雍正四年,邑令王乔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给帑修葺。邑令王允谦更建享堂、墓门。二十五年,邑令吴钺修之。嘉庆二十二年,邑令齐彦槐、里人华瑞清重建享堂、墓门,筑石围墙,丈得实存墓地十八亩六分六厘, 墓外隙地十亩八分四

厘,旧时墓亦有庙,其兴废无可考。蔡氏志载汉唐时墓庙规制,未知何据。司马氏《德长集》:宋绍兴间承事司马宗召,与同里李正达、杨粹夫倡议建庙,表以丰碑,孙觌观撰文,今亦无考。”

诸如此类的记载可谓不胜枚举,上自东汉下至清代,两千年来连绵不绝。凡此种种史志文献,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有泰伯墓在无锡梅里(皇山)、泰伯居所在无锡梅里的记载。而这些史志的作者中,《吴越春秋》作者东汉赵晔是浙江绍兴人,为《吴越春秋》作注的元代徐天祜也是浙江绍兴人,《后汉书·郡国志》注者南朝梁刘昭是山东高唐县人,《舆地志》作者南朝梁陈时期的顾野王是苏州吴县人,《括地志》主编唐朝李泰是陕西武功人,《史记索隐》的作者唐代司马贞是河南沁阳人,《元和郡县志》的作者唐代李吉甫是河北赵县人,《太平寰宇记》作者宋代乐史是江西宜黄县人,元代《无锡县志》作者王仁辅是陇西(甘肃)巩昌人,《吴郡志》的纂修者宋代范成大是苏州吴县人,《吴郡图经续记》作者宋代朱长文也是苏州吴县人,《咸淳毗陵志》作者宋代史能之是常州知府,《苏州府志》的纂修者清代谭钧培是贵州镇远人、冯桂芬是苏州吴县人,《史记正义》作者唐代张守节和《吴地记》作者唐代陆广微是何处人氏虽无以查考,但肯定不是无锡人。总之,这些史志的作者绝大多数均非无锡人,都与无锡、无锡梅里没有任何瓜葛和利害关系。再说,从汉代到清代也并不存在什么“吴文化发源地之争”。显然,这些历代学者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为无锡梅里造假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只是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

两千年来历代黑字白字留下的诸多历史记载,难道是某些人掐头去尾找出来一、二条所谓的“文献资料”,加上一些主观的臆测、解释和推理,或者偶尔从地下挖出了一、二件与“吴”有关但并非是泰伯、仲雍时的器物,就可以抹煞、否定得了的吗?难道凭藉此类的所谓“证据”,就可以改写泰伯奔吴无锡梅里筑城建都立国的历史了吗?毫无疑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者系江南大学教授、历史学研究员)

(编辑:阎智海)

无锡博物院举办《丹青为伍——吴青霞艺术院藏画展》

2015年1月31日,由无锡博物院和常州吴青霞艺术院联合主办的走进大师系列之《丹青为伍——吴青霞艺术院藏画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展期至3月31日。

吴青霞先生1910年生于常州,精勤治艺80余载。举凡花卉、人物、山水无所不精,尤其是她笔下的鲤鱼形神皆备、栩栩如生,可与悲鸿的马、白石的虾、苦禅的鹰相媲美,为画坛之绝诣,赢得了举世赞誉,被称为“鲤鱼吴”。

此次展览遴选出吴青霞艺术院藏精品40件,包括吴青霞先生创作的绘画精品以及与丈夫吴蕴瑞(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先生共同珍藏并捐赠的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吕凤子等近现代大师名家作品,殊为珍贵,为广大无锡观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欣赏和学习的机会。

泰伯奔吴建都梅里考因

程勉中

一. 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探究——“奔荆蛮”与“号句吴”

泰伯奔吴,虽众说纷纭,但其说应有其实,在《左传》、《论语》、《楚辞》、《穆天子传》、《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均有记载。特别是太史公在《史记·吴太伯世家》更是明确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汉书·地理志下》载吴国溯源:“大伯初奔荆蛮, 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史公和班固二人都认为泰伯、虞仲的出奔地是在句吴。那么句吴到底在何方?太史公也说得很明白, 泰伯所奔之地就是后来春秋时期的吴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太史公在此明白无误地记述他当时读了“春秋古文”后的感受:“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将封在山西南部的虞国称为“中国”,而将长江以南的吴国称为“荆蛮句吴”。

但是近年出现的“西吴说”和“北吴说”却对句吴到底在何方的问题重启了许多纷争和困惑。“西吴说”认为陇县、宝鸡一带即今陕西陇县的吴山才是泰伯之吴之所在; 晋南的虞国历史悠久,而且近来有人考证出,周人在迁往岐山前是居于晋南的,晋南之吴的“北吴说”也受到不少人青睐。但笔者认为“西吴说”和“北吴说”均不成立。

1. “蛮服”、“荒服”在周代版图中的方位否定“西吴说”和“北吴说”

《史记》、《汉书》均言泰伯、虞仲所奔之处为荆蛮。荆蛮是古代一个特定的地域。上古中原人称周边民族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南蛮”即“荆蛮”,“荆蛮”应该是上古中原人对以楚越吴为主体的整个南方稻作民族的称呼。其所在区域可以通过《周礼》的相关记载,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

在西周前期,周公姬旦总结前世经验,创造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管理制度,在中央设立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制度,其中夏官司马是主管军事的职官,《周礼》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周官·大司马》中将国家版图作了具体的划分:“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在夏官司马手下还有分管测绘的职官,他们职责各有不同,并且互相补充。《周礼》记载了他们各自的职责, 职方氏的职责是 “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注:五百家为一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乃辨九服之邦国……”。职方氏的职责包括天下地图测绘,熟悉九州不同的地理状况, 了解九服之邦国即周边邻国的情况。服,服事天子之意。九服即以帝王直辖的千里国土为中心,向外辐射,每扩展五百里为一个地域,《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这一辐射圈,从内朝外分别称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九服包括当时人们的地理视野所及,也许还包括人们道听途说或推测的地域。①从地理方位来看,“蛮服”处于周代国家版图的第六层圈,由此推断“荆蛮句吴”所居的“蛮服”区域距离周的王畿应该至少在3000里以上。西周初,周文王“作邑于丰”②,武王营建镐京,其位置在今陕西西安市西。我们现在从句吴古都梅里所在地的无锡到西安,火车里程是1383公里,自驾汽车的车程是1267公里,考虑到古代的长度单位比现代短,周代一尺约合今23.1厘米,按这一长度单位换算,其当时的实际距离应在3300–3500里左右,无锡梅里及周边太湖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蛮服”区域的距离正好吻合。如按上古另一种政区制度“五服”来分析,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传》:“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句吴处在什么位置呢?《论衡·恢国篇》记载:“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则作为“荒服”的吴地距周代王畿也应在3000里左右。而“西吴说”和“北吴说”所依据的地理方位明显小于上述范围。

2. 春秋战国时代的交通路线证明句吴的地理方位在东南

要证明句吴的地理方位在周王朝的东南方,还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吴国同中原各国间外交和军事活动的交通路线来观察。

《左传》成公八年记载“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当时申公巫臣的路线先是往东,假道于莒国。莒国在今山东日照,东边已临海滨,辗转到达吴国,必然是由此折向南方。

襄公二十九年,吴国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型外交活动,就是季札出使上国。关于季札出使的历史记载很多,其中比较可信的是《左传》和《史记》。当年季札出使的路线为:从吴出发,先至鲁都曲阜,再至临淄;由临淄至郑都(今新郑县),然后北行到卫都帝丘(今濮阳县),再由帝丘经戚邑至晋。

《左传》是这样记载的:“(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

《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季札出使过程的记载大略如下:“(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去鲁,遂使齐。”“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去郑,适卫。”“自卫如晋”,“适晋”。“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可见当时季札出使上国的基本路线是先北上徐国,然后适鲁,自鲁使齐,自齐如郑,去郑后适卫,最后自卫经戚邑使于晋,由晋反国,还是经过徐国,回到吴。

3. “断发文身”的习俗说明荆蛮句吴与中原存在明显的地理气候差异

《左传》作者及太史公都十分强调“断发文身”这个关键词,肯定地认为其出奔之地人民的风俗是“文身断发”、“裸以为饰”。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断发文身”,其核心问题是因为荆蛮之地与中原王朝的蓄发冠笄的风俗差别太大。而这种差别恰恰是地理气候的差异造成的。

①王树连:《周代军事测绘管理》,《测绘工程》2002年4期。
②《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部族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文身断发”，“裸以为饰”确实是南方部族所特有的。“文身”是为了躲避蛟龙之害，而蛟龙所生之地是在水中，“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①]所谓“蛟龙”，实际上就是蛇和鳄鱼之类的代称和神化。南方部族以蛇纹图案作为文身之饰的目的，《汉书·地理志》说是“以避蛟龙之害”。顾颉刚先生说得更具体明了：“当时吴、越人之所以断发文身，乃是起于保护生命的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等。”[②]文身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自我保护，具有自然崇拜的内涵，而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装饰形态。直到近现代，民间尚传说文身有镇邪避恶的作用。

“断发”和裸身则是因南方卑湿酷热之故，直到汉代在长沙以西仍有裸国，《史记·南越传》载：“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对“裸身”的问题也有较为集中的点评，他列举文献，《吕览·贵因篇》：“禹之裸国，裸入衣出”；《淮南子·原道训》：“禹之裸国，解衣而入”；《左氏》谓仲雍“裸以为饰”；则西周以前，吴、越之人，犹有不衣者。春秋以来，盖此俗遂改？然《韩非·说林》谓：“越人跣行”，则犹不履也。[③]可见，泰伯、虞仲所奔之地的习俗确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特色。而陇县吴山则地处关中陕西省中部西南，秦岭以北方向，其气候应与中原各地一样，晋南地区亦如此，既无卑湿酷热之苦，也不会常有蛟龙出现，自然也不必“文身断发，裸以为饰”。况其地与周原仅咫尺之遥，对逃亡让国来讲似无多大意义。[④]

二. 从思想史视角探究——《周易》的“火”与“风”

否定“西吴说”和“北吴说”，确定泰伯兄弟出奔方向朝着地处东南的荆蛮句吴而去，这仅仅认定了泰伯奔吴的大方向、大前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条路线是如何选定的？泰伯最后为何要选定无锡梅里建都？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曾利用前人的观测记录，加之他自己多年的观测，撰《元嘉历》，对历法作了多项的改进，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他认为古人是根据天象制定历法并使历法符合天象，“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⑥]，这里指出了古人的思维方式是“顺天以求合”。现今探寻泰伯奔吴时对出奔目的地选择的原因，由于史料的空缺，我们无法作出实证的叙述。但却可以运用何承天提出的“顺天以求合”的分析方法，使分析思路回到泰伯生活的西周早期那个天命神学的认识论基础上去。

史载殷周之际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周易》。相传文王在被囚羑里时，因困于忧思，“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改朝换代之际，周王朝统治者是自觉地将《周易》作为一种文化更替的基本工具的。《周易》并非仅仅是占卦书，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先民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以揲蓍数目之变，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

①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形势》，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②顾颉刚：《古史辨》第 1 册中编，开明书店 1936 年版。
③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参见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宋书·律历志中》。
⑥《周易·系辞上传》。

位。《周易》所构成的思维方式、认识发展的趋向是周文化的一个基本象征。周人把天命视为一种自觉的力量，是人间社会的立法者和最后的仲裁者。认为人的生死、社会的变迁、朝代的兴亡都是天命一种预示征兆的、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人所认识和把握的，具有理性原则的活动。西周的天命论是由天命和人事两点构成的，它们之间是用各种自然现象、事件加以联系，并用五行、八卦的形式框架表达。其中，天命是主要的，人事是服从于天命的。对天只有崇拜尊敬而决不可有半点怀疑、不敬的亵渎。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昭示了王权天授的周人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西周天命神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周人敬德保民的思想是从天命派生出来的，是服从于天命的。①

泰伯让国出奔维系着他一生的事业，其离开岐周的出奔计划，肯定斟酌再三，深思熟虑。泰伯出奔，并非消极退让，而是敬崇天命、敬德保民之举。出奔是为了积极开拓，另辟蹊径，力图建功立业，施展抱负。要实现鸿鹄大志，就首先要找到与“天命相合”的具有发展基础、富有发展前景、确有发展保障的理想乐土。因此，研究无锡梅里为什么恰恰符合泰伯心仪的理想标准而成为句吴古都之地的问题，应从泰伯那个时代所存在的经典和思想出发，以《周易》为认识论的基本工具，结合相关典籍，诸如《尚书》、《逸周书》中的可靠篇什，《诗经》、《仪礼》等，并综合周人崇拜图腾、西周宗法制度、历法、天象、物候等为考究线索，进行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为言之有理的结论，实现对泰伯奔吴心路历程的“顺天以求合”式的探究，而不仅仅是“为合以验天”。

1.《周易》“离卦”的哲学思想对泰伯出奔的方位选择具有理论意义

“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②，周代“其事则火”③，古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认识，以太阳为准绳而确定阴阳的定位，“火”的属性为“阳”性，故得火德必“崇阳”。周代以“火德”为“天人合一”，南方为“火”，太阳是其代表，象征光明。

《周易》中的“坎卦”和“离卦”，分别代表“五行”中的“水”和“火”，方位上的“北”和“南”。“离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第三十卦，“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离卦”的卦象为“火”。“火”之极谓“太阳”。太阳是圆形，又是光明之源，故《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离卦”就是太阳在《周易》中的代称。“离卦”既象征光明，也包含文明。周代贵族讲究“王用出征”。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④即天子以此天德天理，征伐无道或违背此天道者。泰伯虽已让国，但身为王室嫡长，其“以德让天下”的内心深处深受这一道德思想的浸淫，为人处事，均以天下为公，正大光明，不违天德天理，不带个人的私心杂念。《象辞》认为，“离卦”的卦象为离（火）下离（火）上，为光明接连升起之表象。《离卦》的本象为火，这里代表太阳。太阳东升西落，因而有上下充满光明的形象。“黄离，元吉”，即黄中文明，大吉大利。《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即治理国家的大人，应当连绵不断地用太阳般的光明（德行）照临天下。太阳的光明、公平、无私普照大地，是君子要学的德行。

“离卦”《卦序》认为：“陷必有所丽，故授之以离。离者，丽也。”“离卦”中的深层含意为“附丽”，意为“离”陷入“坎”里肯定会附着在一个地方，所以在“坎卦”后接着是“离卦”。犹如太阳附

①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史记·封禅书》。
③《吕氏春秋·应同》。
④参阅《中国百科年鉴·关于孔子的再评价问题》，1980 年。

着在天上,雅乐、燕乐附着在周礼上一样。“离卦”象征附着的意思与“离”字通常的意义似乎相反,但附着的两物,必然是分离的,所以也有附、偶、合的含意。太阳的光明连续照耀,必须高悬依附在天空才行,所以象征附着。离卦的这一依附原则体现在泰伯出奔前的处境,可以阐发为:面临让国出奔另觅他路的窘迫局面,当在险难中,必然就要攀附,找到依托之地才能安全。而这一选择依附的过程,应把握中正的原则,不可乘人之危,采取胁迫的手段,以免招祸。而应柔顺中庸,时刻警觉,才能化险为夷。

我们今天来推断当年泰伯兄弟南奔时的心情,还有一处细节需要推敲。即他们当时的出奔方向应该还有其它选择。事实上,泰伯当时在选择时也许确实是迟疑很久的,所以孔子“三以天下让”一句,古注争议最多。有人认为他第一次出奔是近在陇县的吴山(“西吴说”即由此萌生),也有人认为是到楚地。而《史记·吴太伯世家》断定,“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荆”也可理解为“荆楚”,泰伯是否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目前仍然存疑。如果确实是先至楚,而他最终选择吴地也必有其深刻动因。另外,为什么不选择“奔齐”?齐地为东方,从周人所崇“火德”来考虑,东为“木德”,明显不符。同时“系辞”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卦为雷,为动、为烈、为猛,有凶厉的一面,又离周太近,如果奔齐,明显会成为西周王位继承者的一个威胁。泰伯的出奔首先是一种道德选择。作为王室嫡长,他应该是十分明白由于周代为“火德”,所以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来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方略时,就以“太阳”之“德”为统治的理论依据,自己所作所为不能违背。而属于南方的“离卦”就是“火”与“太阳”,这一点决定了泰伯出奔的大方向应选择南方。

2.《周易》“巽卦”的哲学思想对泰伯出奔的方位选择具有实践意义

南方为楚地,如果单从上述因素来考虑,泰伯应该奔楚,并且他最初的选择也许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最后又决定移向东南吴地呢?笔者认为,《周易》“巽卦”的哲学思想对泰伯出奔的方位选择应该具有实践意义。

泰伯三让天下,既已离开王位,则不能再以“火德”为天命自许,作为周代曾经的“真命太子”,“火德”只能深藏在自己的心中。并且,泰伯必须用实际行动向周王朝统治者表明今后不会再有复辟的企图。“巽卦”为《周易》之八纯卦之一。《易经》“系辞”说:“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齐也。”“巽卦”位在东南,从卦象认识,巽为“风”;从卦序认识,巽为“长女”。“巽卦”为一阴伏于二阳之下,象征为服顺之意,顺从则易于被接纳。《周易》研究者普遍认为,文王卦序重于义理,卦序与卦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注重和强调的是阴阳矛盾的和谐互动状态。既然“巽卦”所表达的义理为“长女”,则泰伯已近乎屈辱地向西周王室传达了不谋朝纲的信息。《易经》中说:“巽为风,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柔而又柔,因而派生出顺从、谦逊的含义。处巽之道,主于以阴顺阳,以臣顺君。而下顺上、臣顺君的目的,在利于大人之申命施治,上下顺从,正为利见大人之象。即能以柔小逊顺行之则亨。但顺从非盲从,谦逊也不是优柔寡断。同时“巽”为风之卦象,风行无所不入,所以“巽卦”以顺时而为的进入为主旨。若以人事而言,如“巽”之谦卑、逊让者则无所不容。以这种精神和姿态为事为人,无论什么处境都能够适应和发展。这种与人为善的方式,合适为大志向的人利用去干更大的事业。

可见,泰伯之所以选择处于东南方位的句吴作为出奔目的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方面可以远离岐周,另一方面则以“巽卦”之位对周王朝表明了自己以臣顺君的心迹。同时,句吴所处地理靠近南方“离卦”之位,并兼具东方“光明日出”的“震卦”优势,这与泰伯心中的期许是十分默契的。而在地形上,楚、齐两地形成了有利于句吴发展互为犄角的两翼,这一选择也为吴国后来的国富民强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泰伯

所作决策显然是以《易经》为思想依据来选择的，但同时又发挥了其自身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仁"与"德"的境界，孔子始终奉为有周一代的价值取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②]可见，作为至德先贤的泰伯，从道德承继的诠释上依据《周易》这一思想工具来作实践选择，出奔吴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 从文化史视角探究——"尊夏"与"寻根"

1. "周人尊夏"是天命正统的标识

西周早期文献中，每见"周人尊夏"，以夏自居，周族自称"有夏"。《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周书·立政》："乃俾我有夏"。此处"有夏"即指周族，可见周人一贯以夏部族自居，其历史渊源是夏的姒姓与周的姬姓均出自黄帝部落联盟。

夏，姒姓，禹为得姓宗神。据《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世本》、《大戴礼记》等，或记述鲧是颛顼的五世孙。或为颛顼之子。《山海经·海内经》又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居崇山，称为崇伯鲧，分布在以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地区。相传在治水失败以后，被上帝殛死于羽渊，化为黄熊或黄龙。他的后继者，迁到了汾水下游以夏为地名的地方，因治水有功，皇天赐以姒姓。夏人在这个地区兴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姬姓同样出于黄帝集团，《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为神龟，是黄帝部落的图腾。周先祖后稷与唐尧、虞舜、大禹同时，《史记·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周人和夏人关系非同一般，周先人世为虞夏农官，《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历史学家李民认为，周之先民原居于今晋南地区，并与其他氏族（或部落）错处河、汾间，与夏族以及其他氏族结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即黄帝部落联盟。夏王朝建立后不久，出现"夏后氏政衰"，从属于夏政权的周族乘机向西迁徙，《国语·周语》韦昭注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后来周族以蓬尔小邦，猝然夺取"大邦殷"的统治，在西方建立国家，迁都沣、镐，进而渡河灭商，统治了广大的中原地区。[③]因而，从文化史来考察，周人以"夏"自居，就是体现出一种属于黄帝部落的天命正统的思想。

2. 泰伯奔吴："周人尊夏"的传承与华夏文明的寻根

夏人的先祖与构成，无论田野考古学研究与远古传说，又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及部落有渊源关系。

"夏人"祖居之地应是《山海经·大荒东经》在"天吴"条下提到的"夏州之国"，或一般古文献所称的"吴越之地"、"有吴之乡"，即今中国东南沿海的太湖流域，也即中国田野考古学所称的"良渚文化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三皇时代开始，夏族就是中国民族融合的象征，故中国民族可以"夏"作为统称。中国古称

①《论语·为政篇第二》。

②《论语·八佾篇第三》。

③李民：《再论夏、周族之关系》，《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华夏”，中华民族自称“华夏族”，即来源于“夏，中国之人也”这一传统认识。“华”是形容词，《说文》“华：荣也”；《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用于修饰“夏”，即“华夏”为“繁荣昌盛的夏族”之意。大禹的“夏后氏”也被称为“有夏氏”或“夏人”，但该氏族只是古越族的一部分，即“夏后氏”只是“有夏氏”或“夏人”的一部分。“夏后氏”起源于钱塘江南岸地区，是河姆渡文化部落的后裔。河姆渡文化是当时与马家浜文化一起在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平行发展的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此后最终被并入良渚文化部落（即所谓“有夏”）。这一历史变迁虽无法征之于文献，但可清晰地证诸田野考古研究。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这一地区升起的，因此环太湖地区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无锡已故考古专家冯普仁先生认为：“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七千至六千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先民，已经人工栽培水稻，脱离了刀耕火种阶段，而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诸文化时期，已经由耜耕农业进入犁耕农业，在耕作技术上处在同时期我国诸古文化的前列。”[①]当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周时期的中原文化即是从太湖流域的华夏文明发展而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学研究也发现良渚文化部落中的一部分约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跟随中国远古史上的三皇之一“人皇”北迁黄淮流域，在中原繁衍发展，其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而未参加北迁，或迁离后又迁回江南的这一部分人，连同那时从南方其他地区陆续迁到太湖流域的百越族成员，就是我国历史文献所称的“吴越之民”。[②]

泰伯出奔之前，作为王室嫡长，必然耳闻曾为周人远祖的东南夏族先民曾经拥有的辉煌业绩，农作、丝织、制陶、玉器等与中原相比，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先祖的光辉足迹，有着令人神往的传奇故事。虽说由于长期持续洪水为患，而一度使吴地文明倒退，但尧、舜、大禹、后稷曾在这里领导治水，水灾之患已基本平息。再说与同属“夏人”子孙的吴人相处，由于宗族、血缘关系，容易融洽亲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有力的发展保障。因此当年泰伯、仲雍不辞艰辛，穿越江淮大地，横渡滔滔长江，直奔太湖流域的梅里而来，并不只是消极的让位与躲避，而是一种目的性明确的集体行动，既是对“周人尊夏”的传承，又是对作为祖先的古老文化——远古华夏文明的寻根之举。其实早在明代，无锡名人高攀龙就曾经说过：“至德之圣，让天下而逃，不至于名山大川，不至于长林峻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于三江五湖，不之于幽岩绝壑，而之于吾锡之泱莽平虚，岂其无故耶？”[③]

四. 从生态学视角探究——周礼的“天时”与“地气”

泰伯兄弟奔向句吴的目标，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至于最终落脚无锡梅里，那是偶然的决定。泰伯三让，出于孝亲爱民，因此民生问题，即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量，应该是泰伯出奔目的地选择的重要依据。

中国文化素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上古时期，先民已经有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积淀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自然生态认识体系。我国是最早从事农耕的国家之一。在长期实践中，先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天时对于农事成败的重要性。相传早在尧时就曾命羲仲等人根

①冯普仁：《莫将传说当遗迹——评〈泰伯遗迹志〉》，《吴文化专刊》第11期，2003年。

②这一观点可参阅庄小兵的《三皇五帝三代王年简表》，http://bc2172.bokee.com。

③高攀龙：《梅里志卷四·泰伯墓碑阴记》。

据天象,“敬授人时”。[①]训民耕,使有期程。以后,《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都曾记录一年之中各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农民主要是依靠节气来掌握农时、以保证农事活动顺利进行的。而《周礼》中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可以用“以人为本”来概括。《周礼》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通过“天时”与“地气”而产生作用的。天时即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大部分动植物都是依季节而生长的。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农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地气则是指构成土壤物质的“气”,《周礼》认为生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它是对人和动植物造成影响的原因。在不同的地方要根据地气饲养不同的禽畜,种植不同的作物。[②]《周礼·冬官·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而且,要使得农业丰收,国家富足,也必须考虑天时的影响。“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拗,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③]古代先民凭着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现象,来审时度节,安排农牧业生产和其他农事活动,使之做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斩伐养长不失其时”[④]。古人所观的自然生态之象,一是天象,即日月星辰(太阳、月亮、北斗、五星和二十八宿)的运行规律;二是物象,即动植物顺应节气而发生变化的现象规律,以花鸟虫鱼兽等物候作为时宜的标志,如:夏历一月玄鸟至,桃始华,仓庚鸣……;三是气象,即风雨雷电等气象变化所显示的规律,如:夏历一月,始雨水,雷乃发声,虹始见……。[⑤]

学界公认,越是在人类文明的初期,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就越大。泰伯奔吴的立足之地,必然要选择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无锡梅里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南岸和太湖流域,境内四季分明,降水丰沛,河流湖泊纵横密布,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区。据说,泰伯、仲雍一行人马,奔至梅里(也称梅李),时见梅李芬芳,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山明水秀,即命部下在水泽高墩安营扎寨。黎明即起,雉鸟啼鸣,凤凰来仪,扎营木棍也发出嫩绿新芽,泰伯面临一派祥和安乐、兴旺发达的大好景象。凤凰即凤鸟,被周人视为神鸟,凤鸟对周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据说“凤鸣岐山”,周人由此而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吉兆。土著告知,泰伯人马所在,就是梅里“荒三千”。泰伯不胜惊奇,当年太王迁徙岐山,也是驻扎“荒三千”,如此巧合,岂不天意!再反观“离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⑥]传说中泰伯来到无锡梅里的时节,恰是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双重光明附丽于正道的一派光景,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正符合周人对自然生态的理想追求。于是泰伯决定行止于此,教化天下达到文明,这就是泰伯当年决定安居梅里凤凰墩的故事。虽属传说,却也合理。泰伯奔吴,断发文身,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认同,由此而使中原文化与太湖流域古代文明相接续,开创出更为光辉灿烂的吴文化。泰伯身体力行,身先士卒,

①《尚书·尧典》。
②黄姜:《周礼与周代生态文化》,《绿叶》2004年第6期。
③《周礼·考工记·序》。
④《荀子·王制》。
⑤蒋南华:《光辉灿烂的古代天文历法》,《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⑥《周易正义·上经随传卷三》。

图一　梅村泰伯庙

图二　鸿山泰伯墓

“荆蛮义之,从而归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①]泰伯、仲雍奔吴后的头等大事首先是开河挖渠,根治水患,同时传播中原文明发展生产。据传泰伯在句吴境内,曾率众开挖九泾一渎。其中伯渎港长56里,宽20丈,为锡东地区的东西干流,堪称中国第一条人工大运河，比隋炀帝开掘的京杭大运河要早1800多年。梅村现存香泾、龙泾、梅泾、湾泾等等,相传也是当年所开。九泾一渎的疏通挖掘,对吴地解决旱涝水患、水上交通、货物运输、军事战略、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梅村皇渡浜、冶坊浜、制陶浜等地名,相传是泰伯东渡,教民制陶、冶炼之处。[②]据《吴越春秋》记载,泰伯筑城廓,“城周长三里二百步,外廓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正如东汉吴郡太守糜豹说:“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洽。东南礼乐实始基焉。”[③]

泰伯之德“光照宇宙,犹如日月”。[④]因开发荆蛮，句吴古都梅里终于成为泰伯千秋立德之处和理想人格的实现之地。以泰伯奔吴为源头的吴文化已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至今。相传，农历正月初九是泰伯的诞生日,为纪念泰伯的“三让”高风亮节和为吴地文明发展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千百年来的梅村泰伯庙会一直是吴地每年开春最早、最大的乡村节场之一。每逢这一天,村民从四乡八镇聚集泰伯庙(图一),焚香参拜。传说中泰伯病逝于农历三月初三，梅里百姓把三月初三定为泰伯的忌日,每逢这一天,家家户户置办酒肴赴泰伯墓地(图二)进行隆重祭奠,缅怀颂扬泰伯的美德和功绩。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理事、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阎智海)

①《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以上有关泰伯来到梅里后的事迹传说可参阅《梅里志》、《泰伯梅里志》等。

③糜豹:《梅里志卷四·泰伯墓碑记》。

④同上。

勾吴国青铜兵器探秘

陈振康

三千年多前,泰伯、仲雍为让王位于三弟季历,从西北周原奔荆蛮,在东南无锡梅村一带吴地,建立了勾吴国。经其后五百多年平稳的发展,国力逐渐增强。到公元前585年,其十九世吴王寿梦即位,和中原交往,引进中原文化,国家发展加速。到寿梦孙吴王阖闾时,吴国东征西伐,成为拥有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泱泱大国"。公元前512年,吴军分为三部轮番击楚。公元前509年,吴军大败楚军。公元前506年冬,吴、楚两军决战于柏举(今麻城),吴军五战五胜,攻克楚之郢都,楚昭王出逃。吴国威震中华,成"春秋五霸"之一[①]。

吴国在战争中之所以能屡屡取胜,武器装备精良是一大因素。《考工记》中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战国策·赵策》中也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吴国刀剑精良,被世人视为珍宝。那勾吴国拥有哪些精良的青铜兵器呢?它们为什么这样精良呢?

一. 吴国精良的青铜兵器

1. 吴戈

在无锡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就陈列着一件勾吴国的兵器吴戈。

大诗人屈原在其不朽诗篇《九歌·国殇》中吟道: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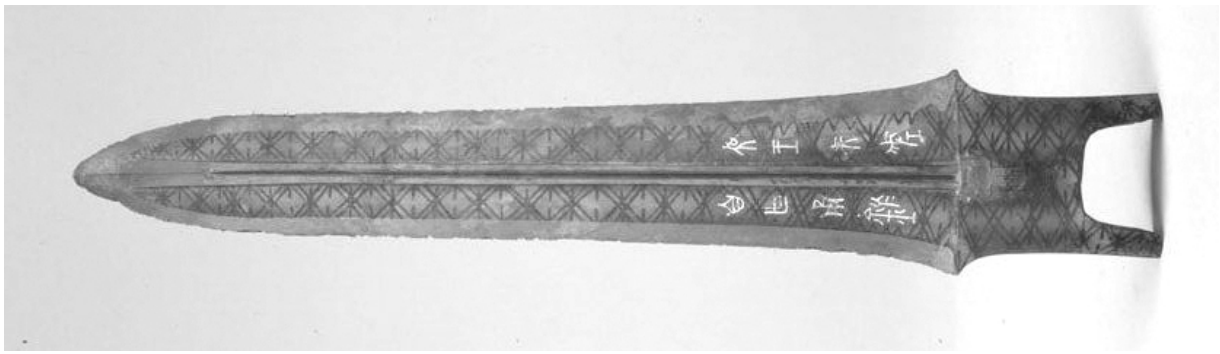
这是屈原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诗人以真挚炽烈的情感,鲜明急促的节奏,凛然悲壮的阳刚之气,歌颂了楚国将士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兵器吴戈的寒光闪烁在我们的眼前。

吴戈是春秋时勾吴国军队所用的武器,产自吴国,锋利无比,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在楚国和秦国等国的军队里也广泛使用,后来泛指古代锋利的兵器。

现在存世的制作年代最早的一把吴戈,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吴王寿梦戈。此戈可能为清宫旧藏,通高6.9厘米,宽14.9厘米,重0.24千克。戈内部呈镂空的动物造型,刻画一宽体飞龙。舌形短援,援面中间凹陷形成宽血槽,援末下垂成胡,胡后有扁圆形銎,上有一穿。援两面有八字铭文。

吴王寿梦戈上的铭文经郭沫若先生释读为"邗王是野乍为元用"。郭沫若先生进而解释这"邗王"即为吴王,是吴王灭邗之后袭用其国名。"是野"为寿梦,是泰伯所建勾吴国的第十九世君主,公元前586年到前561年在位。"乍为元用"是出土吴兵器上常用语,意为"制作自用"。吴国精良的兵器,誉满春秋各国。文献记载,吴王曾经将包括此戈在内的青铜器作为交往他国的国礼,这为当今国内多地出土的吴王兵器所证实。此戈精美异常,品相一流,锋利如初。睹物追思,

①《墨子·所染》。



吴国有铭青铜矛

吴王寿梦金戈铁马开创霸业的情景如现眼前。

吴戈分无胡直内戈和胡戈两种，细分有三十七式。

和吴戈相似的吴国兵器是矛。矛是古代用来刺杀敌人的进攻性武器。长柄，有刃，用以刺敌。始于周代，或周代以前，来历亦甚悠久。《周礼·考工记》上记载，给步兵使用的矛称作酋矛，给战车兵使用的矛称作夷矛。而勾吴国，还大量将矛用于水战。

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自用青铜矛，全长29.5厘米。矛身较短，中线起脊，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銎中空，口扁圆，口沿内凹。矛体满饰菱形几何暗纹。基部有两行8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矛"，此为吴王夫差自用，此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现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1984年5月在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吴王余昧墓出土吴王余昧矛。长21.4厘米，宽4.7厘米，矛体大而宽，锋近似三角形，截面为菱形，刃的中部呈弧形内收，刃口十分锋利，中有脊，两侧有血槽，椭圆形銎。矛上饰黑色菱形暗花纹。基部有铭文："(余昧)自乍工其元用"。墓中共出土矛八件，可见矛在吴国军中使用的普遍。

戟是和吴戈相似的、将戈和矛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吴国新型兵器，具有钩和刺击双重功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教战一百八十名宫女时，"皆令持戟"。

在安徽霍山的一座春秋吴墓中，曾出土一件戟，上刻有铭文"攻敔工差自用戟"，是吴王夫差制作而用的。由于戟的杀伤效果好，很快得到推广应用，到了战国时期，已基本取代了戈的地位。

2. 吴钩

比吴戈名气更响的吴国兵器是吴钩。唐朝诗人李贺的诗《南园十三首·其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带吴钩的男儿成为男子汉的模特。而更煽起吴钩粉丝们激情的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背景，而纵马持吴钩，迎风作长啸，成为男子汉心中最绚烂的景色。

关于吴钩更早的记载见于《吴越春秋》，书中写了这么个故事：吴王阖闾在得到了莫邪剑之后，十分高兴。他又命令国内的人造金钩，下令说："能够造出好钩的，就奖赏他百金。"吴国造钩的工匠很多，其中有一个工匠，为贪图吴王的奖赏，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在金属的表面上，打成了两只金钩，献给了阖闾，并到宫门口来求取奖赏。吴王阖闾说："造钩的人很多，而就你一个人来求赏。你造的钩和众人的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凭什么来区别呢？"这造钩的工匠说："我造钩的时候，贪图大王的奖赏而杀掉了两个儿子，把他们的血涂在金上而造成了这两只钩。"吴王就拿出所有的钩给他看：

“哪两只是你的呢？”吴王的钩很多，形状相似，看不出那两只钩在什么地方。于是这造钩工匠就对着钩呼唤两个儿子的名字：“吴鸿、扈稽，我在这里，大王不知道你们的精灵啊。”话音刚落，两只钩便都飞来了，附着在父亲的胸膛上。吴王十分惊奇，说：“啊呀！我真辜负你了。”于是奖赏了他百金，以后一直将这二把金钩佩在身上。

但是，在春秋战国期的出土墓中，一直不见吴钩的身影。于是有人认为，吴钩实际上就是吴戈；也有人认为，吴钩就是扬名于世的吴剑；还有人认为，吴剑中段有弯曲，故也名吴钩。

近年随着秦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这一千古迷题终于揭晓。1975年从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了吴钩（也称金钩），现在公认为出土于秦俑一号坑东端长廊部分。

吴钩为铜制，钩体如弯曲的镰刀，分身、柄两部分，一次铸成。钩身齐头，截面作枣核形，对开两刃。柄系实心的椭圆体，通长71.2厘米，宽2.3–3.3厘米。是一种推、钩两用的兵器，佩挂在腰间。金钩是春秋时期出现在“吴国”、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短兵器，故此称之为“吴钩”。西汉后它又成为了一种仪仗与卫士所用的仪卫性的兵器。在汉代，匈奴人将吴钩唤作径路刀，是汉代匈奴人使用的一种青铜刀。到唐朝时，模仿古代吴钩研制出的曲刀也称之“吴钩”，其实是真正的弯刀，这种弯刀流传至倭国，就是现在日本武士刀的原形。曲刀在中国南方广为使用，即使在刀剑最盛时期，中国南方许多民族仍然使用着本民族固有样式的曲刀（就是在现今的中国，傣、苗等少数民族还沿用着本民族独自式样的刀）。这种曲刀一直久盛不衰，到了宋朝就更加流行了。在宋代《武经总要》中，已经看不到直刀的图样，但是仍完整地保留着手刀这一曲刀的流派图形。虽然当时的军队也装备有直刀，但是，从《武经总要》的记述来看，曲刀的装备率仍占明显优势。由于宋朝的法律没有把这种曲刀列为民间禁用的兵器，所以，不仅军队，就是在民间也极为普遍。从明末到清朝，曲刀仍然被广泛使用着，特别是在民间和武术界，就更为盛行。

3. 吴剑

最有名的吴国兵器是吴剑。吴国是宝剑之乡，在吴国众多的“王之剑”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宝剑是干将莫邪剑。《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命铸剑大师欧冶子之弟子干将锻造神剑。干将授命后，采集了五山上铁中的精华以及天下金属中的优质材料，进行冶炼。但金属不熔化，剑三月未铸成。干将的妻子于是就剪断了自己的头发、剪光了指甲而投身于炉中。三百个童女童男鼓风装炭，那金属才熔化了，干将终于铸成了两把宝剑。他在一把剑上刻上了龟背的纹理，叫阳剑，名干将；另一把剑刻上了无规则的纹理，叫阴剑，名莫耶。干将藏起了阳剑，将阴剑献给了阖闾，阖闾视为珍宝。真是凄美的传说，铸造史上的壮举。

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一座晋墓中，出土一柄“吴王光剑”，长50厘米，剑首的端部有一轮轮的同心圆槽，在一轮轮同心圆的底部，还刻有突起的如同一股股麻绳般的绳状花纹。剑身装饰火焰状花纹，寒光闪闪，至今犹可断发。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中出土了一柄“吴王夫差剑”，残长37厘米、宽3.5厘米，配有漆木鞘，剑身铸有篆书阴文二行十字：“攻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在目前已知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是1976年河南省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该剑通长58.3厘米、格宽5.5厘米，造于春秋晚期。剑作斜宽从厚格式。剑身宽长，近锋处收狭明显。双刃呈弧形，中起线，两从斜弧。厚格作倒凹字形，饰兽面纹，铸有多圈险细的同心圆凸棱。圆茎，茎上有两道凸箍，箍上有极细的凹槽。镶嵌绿松石。剑身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敔（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这把剑在经过了两千四百余年后，剑身虽部分覆有蓝色的薄锈，却仍青光闪现，逼人眼目；弧形双刃锋锷锐利，宛如新铸，制作工艺精美细致，实不愧为一代名剑。该剑藏于台北古越阁。2014年5月

苏州博物馆宣布，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出资4250万元征集的58件台湾“古越阁”旧藏青铜兵器，将于2014年12月18日—2015年3月22日在该馆公开展示。据了解，其中31件为“古越阁”主人王振华、王淑华夫妇慷慨捐赠，另外27件吴国兵器精品则为友情出让，该柄吴王夫差剑也在其中。苏州博物馆介绍：“每一次触碰，我们都小心翼翼，它真的太过锋利，一不小心手指就会被划破。”“此前的藏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一张A4纸放在桌上，没有任何人去按住白纸的情况下，剑刃只在纸上轻轻划过，纸便立刻被割成了两半。”令人惊叹不已。

二. 精良的铸造技术

吴地的青铜铸造业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勾吴国青铜兵器的制造更是独步一时，冠绝天下。

其特色之一是它的成分。专家们对吴国青铜器进行了科学的测定，测定的结果表明，吴地在西周时代和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以含铅量较高的铜铅型和含锡量偏低的铜铅锡型为主。光谱定性、半定量和化学定量分析表明，吴地的青铜器其主要成分铜之外，其含铅量居第二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金坛鳖墩所出土的吴国青铜块，出土时盛于陶罐中，是冶炼后用于铸造青铜器的原料。经分析，其含铜量为58.83%，铅为39.16%，锡微量。此类青铜块在丹阳、句容、金坛、溧水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块已不是初步熔炼的粗铜原料，而是按照一定的合金成分比例配成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同时期的中原青铜器则含铅量很少。这种材质的普遍性就是吴地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到了春秋中晚期，则多为含锡量高、含铅量低的铜锡铅三元合金，虽然这时还有铜铅合金的铜器，但数量不多，已不占主导地位。

其特色之二是铸造技术。吴地青铜器的铸造，从器表观察，一般都是合范通体浑铸而成。还有一部分铜器使用了分铸法，即先铸好分件，然后再与主体部分合铸而成。专家对出土的吴剑结构剖析，发现一柄剑是由两次铸成的，即先用低锡青铜铸出剑脊，其剑脊两侧留有接剑从的榫头，再用高锡青铜接铸两侧剑从。这样两次铸造出来的剑，好处是剑脊有韧性，不易折断，剑两侧剑从硬度高，可以磨出锐利的刀刃，使剑真正做到刚柔并济。这种剑在铸造时，还采取了锋后束腰的造型，即在剑身接近剑尖处先收腰，使前端如同装上了倒钩，杀伤力极大。

其特色之三是精良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吴国的戈、剑等兵器的表面，都有菱形、曲折形等暗花纹，防锈而美观。这些花纹拭不去，磨不灭，令人称奇。经专家们长期的潜心研究，终于揭开了谜底。吴地的青铜兵器的铸造工匠在兵器的表面，采用“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表面合金技术，他们用这种特殊而精湛技术对兵器表面饰成菱形、曲折形暗花纹，既有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蚀功能。[①] 2000年上海博物馆等科研单位经反复考古模拟试验，确认这种纹饰是采用富锡膏剂一类的矿物质颜料，涂饰器表，作加热扩散处理等工艺形成的。复制出的样品，经鉴别其成分、形貌、组织均与原标本相似，从而破解了这一历史科学技术悬案。出土的吴王光剑，剑首的端部都有一轮轮的同心圆槽，在一轮轮同心圆的底部，还刻有突起的如同一股股麻绳般的绳状花纹。1975年10月在苏州葑门河道内发现的一件春秋青铜剑，通体满饰黑色发亮的菱形暗纹。这些花纹，拭之不去，磨之依然。这是2500年前中国科技史上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者系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副教授）

（编辑：阎智海）

①《江苏考古五十年》。

南国利器——吴钩和吴戈

王新民

中央台播放了8集电视系列片《说吴》之后，好评如潮，质疑声也不少。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拿出来探讨一下，这对吴文化今后的宣传和发展都有帮助。

《说吴》第二集篇名叫“男儿何不带吴钩”。此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南园·五》。质疑者认为：现有的出土实物中并未发现过吴钩，吴钩只出现于唐诗宋词中。所以这吴钩应是吴戈，只是诗人为了押韵和平仄的关系才改成了吴钩，后人便以讹传讹，流传到现在。

首先要说明吴钩一说并不是首见于唐诗，西晋时代的文学家张载在《登成都楼诗》便有“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句。南朝宋时文学家鲍照在《代结客少年场行》中亦有“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之句。实际上不是后人受唐诗之误导，倒是这位鲍照先生反过来对唐代李白等诗人的影响较大。以至于李白在《侠客行》中将吴钩的威力充分表现了出来：“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张、鲍二人的诗句中更有一点是表明了这吴钩是佩在腰带上的。很显然吴钩不可能是吴戈之误，诗人是不可能为了押韵或平仄的关系去将沉重长大的戈挂在腰间的。

如果说这些均是诗人的即兴所作，当不得真。那么在《吴越春秋》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在得到了莫邪剑之后，十分高兴。又下令全国工匠打造金钩进献，上等者有奖。这命令一下，工匠中有一个人因为贪图吴王的奖赏，便杀掉了自己的二个儿子，用他们的血祭祀神灵，再将他们的血涂到金钩的缝线中，制成两把金钩。这个工匠带了这二把金钩到宫内献给阖闾请赏。阖闾问他：“制钩的人很多，但只有你来求赏，你的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制钩的人说：“我因为贪图大王的赏金，所以杀了两个儿子，用他俩的血祭祀并涂于金钩之上，所以与众不同。”阖闾于是将那人所献的金钩与其他人的混在一起，然后让献钩人找出自己的两把。献钩人向着一堆金钩大声呼唤：“吴鸿、扈稽，为父的就在你们面前，吴王不知道你俩的神奇，还不快出来。”话音刚落，二把金钩便飞到制钩人面前，吴王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说：“啊！我确实辜负了你对我的一片诚心。”于是奖赏这位制钩人百金。阖闾后来一直将这二把金钩佩在身上。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一点神话色彩，但说明了在春秋时吴国确实有一种类似剑能佩带在身上叫做金钩的利器。

后来的《汉书》和明代人茅元仪的《武备志》等古籍均有对于“钩”的描述。解释得比较清楚的是宋代沈括：“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梦溪笔谈·技艺》）

沈括不仅清楚地说明了吴钩的形状，连它的小名也记下来了——葛党刀。只是南蛮的称呼似乎对吴人有些不恭。

受到质疑的另一种吴国利器是吴戈。

战国时楚诗人屈原在其《九歌·国殇》中描绘了一群为国捐躯的勇士，其开头二句即描写了一场血战的场面，“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质疑者均认为，这吴戈应为“吴科”之误。

这“吴科”为何物呢？“吴科”又名“吴魁”，是盾的别名。《广雅·释器》：“吴魁，盾也。”《广雅疏正》：“古者盾为木，或以草。吴科，与吴魁同。”

图一　吴王寿梦戈

“吴者,大也。吴魁,犹言大盾。”基本上所有质疑者的理由,均是引用了这两种古籍中的解释。这个理由不能不说十分牵强。因为这些仅仅说明了我国古代曾将盾称为“吴科”或“吴魁”,而并不能说明屈原诗中的吴戈即为“吴科”。

吴戈实物已有多处出土，从外形上看是一种用于钩杀的武器。其存世制作年代最早的一把当属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吴王寿梦戈（图一)。戈上铭文经郭沫若先生释读为“邗王是野乍为元用”。郭老进而解释这邗王即为吴王,是吴王灭邗之后袭用其国名。“是野”按译音为寿梦。“乍为元用”是出土吴兵器上常用语,意为“制作自用”。但令人奇怪的是郭老也是认为屈原诗中的“‘吴戈’其实是‘吴科’,刘熙《释名》又作‘吴魁’,乃盾之别名”。真不知是什么原因。

屈原处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当时它的领土已包囊了春秋时吴、越两国的疆域。历史上吴、楚有过多次激战。越灭吴后,楚又乘越国内乱侵吞了越。因而楚人对吴国兵器之犀利是深有体会的,大量缴获后装备军队是十分可能的。作为朝中重臣和大文学家的屈原，对于这些当更是了然于胸。因而“执吴戈兮被犀甲”正是诗人对一位上阵壮士的正常描写：他手执利器身披犀甲。如果是披了甲又执盾，一副出去挨打的熊样,那就不符合一位奋勇杀敌的勇士身份了。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中有“短兵接”一说。这说明双方是用的短兵器,而戈为长兵器,不适宜短兵相接所用。但闻前辈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诗人这二句诗描写的是车战。限于当时冶炼水平,春秋战国时剑的长度一般少有超过50厘米的。因而车战中剑一类短兵器是不适用的。而戈恰恰是吴军为了适应车战而发展出来的长兵器。

1980年7月6日，苏州吴县何山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陶器。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和车马器共33件,其中兵器有戈3件、矛3件、箭头14件。因为同出车器，这些应为车战用的近战和远射的兵器。其它有几处凡出土有车器的地方,同时出土的武器均伴有矛、戈或箭头。这说明屈原诗中的吴戈应是车战正常武器。据专家考证,古时兵车上一般有三人。那可以这样理解:一位执弓箭用于远射;一位执矛在交接时刺杀;另一位则执戈在二车错过后钩杀。

吴君自泰伯传19世至寿梦称王时，吴国国力已十分强盛,冶炼水平也在诸国中名列前茅。《周礼·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也。”寿梦儿子季札出使徐国时，他的佩剑令徐君也仰慕不已。

正是凭借犀利的兵器和强悍的民风，地处一隅的吴国才能屡屡击败相邻的强楚，甚至开挖邗沟北上击败齐国,胁诸侯会盟于黄池。

由于先秦时期现存史籍多为中原士人所著。出于对荆蛮之地的偏见,在著述中往往有歪曲和贬低之意。这次《说吴》的播出为吴地文化正了一下名。有质疑是正常的,只有不断地质疑和论证,才能使吴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知。

(作者单位：无锡市太湖文化研究会)

(编辑：何桦)

倪瓒年谱（二十一）

谈福兴

元顺帝至元二年　丙子　公元1336年　三十一岁

○ 是年十月八日，夜泊阊门，将还溪上时，因怀念友人陆友仁，特作《怀陆友仁》诗云："丙子岁十月八日，夜泊阊门，将还溪上，有怀友仁陆征君。明发辞吴会，移舟夜淹泊。空宇垂繁星，微云暝前郭。沉沉抱冲素，悄悄伤离索。归扫松径苔，迟君践幽约。"

按：此诗载明天顺四年蹇朝阳本《倪云林先生诗集》卷一，清康熙五十二年曹培廉刊本《倪高士清閟阁全集》卷一亦载。

又，《江南通志》卷二十载："吴阖闾筑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为门八：东曰娄、曰匠，西曰阊、曰胥，南曰盘、曰蛇，北曰齐、曰平。历代皆仍其旧。"

按：陆友（1290–1338），字友仁，自号研北生，吴平江（今江苏吴县）人。博雅好古，博极群书，精鉴赏，能鉴辨三代、汉、魏以下钟鼎铭刻，于晋唐法书名画，皆有精识。尝至都下，虞集、柯九思皆善其书，言于朝，未及任用而归，以疾卒。陆友于真、草、篆、隶皆有法，尤工汉隶、八分，追踪石经，欲与蔡、钟相上下。尝书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见形迹，而刚强之气，温润之质，望之俨然。陆友富藏书，所藏自经史传记、权谋数术、氾胜虞初及百家众技之书，皆鳞次栉比。又编次藏书，条分类别，撰为《陆氏藏书目录》，由黄溍作序。元人顾瑛称其："幼聪敏好学，作诗必拟古人，不苟下笔，故其诗皆有法度。北游京师，馆阁诸老无不爱重之。惜其不永年，故诗不多得云。"著有《研史》、《墨史》、《印史》、《杞菊轩稿》、《研北杂志》、《吴中旧事》（一作吴中杂记）等。藏书印有"陆友私印"、"陆友仁印"、"燕处超然"等。陆友与倪瓒素有往来，陆友有《次张贞居所赋云林》云："松花新酿碧琳腴，洗杓何妨起病夫。菌阁下帘修隐诀，云林扫榻挂仙图。旋移竹近文书案，自汲泉添刻漏壶。闻说华阳多玉食，洞中燕肉腻如酥。"倪瓒有《送友仁之京师》云："春风吹兰茝，佳人将远游。远游何当还，神京郁云浮。睠言英迈志，飞辔不可留。岂无金闺彦，与子结绸缪。河山风气雄，江水日夜流。遥瞻云中雁，庶以慰离忧。"倪瓒曾应陆友之邀为其子取名，据倪瓒记云："吾友陆友仁甫旧得古铜印一钮，以示余辨之，文曰：'陆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既没，仲安求为赋焉。吾友伯仁甫，览古闵世盲。示我古印章，始得自幽并。辨文曰定之，释义为尔名。既名字仲安，勖哉在敬诚。仁甫今则亡，缅怀涕沾缨。繄昔黄太史，结交汉米生。手持玉刻文，螭钮交纵横。上有元晖字，印刓与弗轻。殷勤字其儿，祖父冀可绳。久矣学业懋，继述晖芳英。书画比二王，价重十连城。高躅思仰止，景行尔其行。"陆友与倪瓒不仅友善，而且彼此欣赏、题咏并珍藏对方的书画作品。陆友有《倪幻霞良常草堂图并题》云："家住华阳（阙），长松映草堂。平生有高致，不似贺公狂。陆友。"另据张雨《题陆友仁书世说卷》云："此卷予旧藏，又尝杂书纸尾，把玩山泽间，后为元镇持去。至正丁亥（1347）十二月四日，与元镇同游梁鸿山，携在行笈，因得重观故友陆友仁隶书世说数则语。感慨岁月，予老矣，能几把卷，重题而归诸清閟阁。海昌张雨。"

此顷，因好友张雨在钱塘城北的西塍筑菌阁以居，不复再回茅山，倪瓒遂作《贞居君在余杭北郭结楼居之，号茅岭行窝，予久欲往观而未能也，兹贞居适有来此之约，因寄一首》云："已

向云林开别墅,更闻茅岭有行窝。提鱼就煮兴不浅,看竹频来意复多。梅坞雪晴红缀蔓,墨池水暖绿生波。悬知潘令闲居赋,不比阴山勅勒歌。”不久,又《再用韵呈张伯雨潘子素》云:“团团桂树覆岩阿,茅屋归来雪一窝。高卧故园奇气在,倦游江海故人多。楚山白雁遵寒渚,练水长鱼出素波。去去南州书问少,寂寥谁和紫芝歌。”

○ 陆友(友仁)　四十七岁　七月十日,以隶书为张雨作《世说卷》云:“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佐吏殷浩、王(阙)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少颓。右军曰:惟丘壑独存。至元二年秋七月十日,吴兴陆友仁书世说中语。”

按:陆友所书《世说卷》原为张雨所藏,至元四年(1338)正月二日,张雨携此卷访倪瓒时,曾与“京口袁矩子方、曹南史元举大用、金华吴福孙子善同观于清閟阁”,张雨后将此卷转赠倪瓒。至正丁亥(1347年)十二月四日,倪瓒携此卷与张雨同游无锡梁鸿山时,张雨再次为倪瓒在陆友的《世说卷》上作题。

○ 张雨(伯雨)　五十四岁　以上冢告归钱塘,二月,与友人陈旅(众仲)雨中泛舟游城北的西塍,宿故人朱明宇所,商议在是处筑菌阁以居,不复再去茅山。同年作《芝筠沐露图》。

○ 陈旅(众仲)　四十九岁　春二三月间,与好友张雨次杭州北廓西塍,并与张雨相约在此筑菌阁四楹以居。三月,阁成,遂作《菌阁石记》以记其事。

是年夏季,江浙一带久不下雨,自钱塘至京口水不足以负舟,吴江之渊可厉而涉。秋八月始大雨连日,会稽韩友直(伯清)见河道通畅,欲从钱塘出游京师,友人为其作诗送行,陈旅特作序为记。

按:陈旅(1288–1343),字众仲,福建莆田人。陈旅笃志于学。以荐为闽海儒学官。中丞马祖常奇之,与游京师。又为虞集所知,延至馆中。元天顺元年(1328),四十一岁的陈旅经平章事赵世延引为国子助教,考满再任后出为浙江儒学提举,又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1341)迁国子监丞,越二年卒于官,享年五十六岁。陈旅为文典雅峻洁,不徇世好。著有《安雅堂集》十三卷,刊行于世。

任浙江儒学提举期间,陈旅曾来无锡,现其《安雅堂集》中有相关记录,如闻无锡华氏在水灾之年散粟赈饥不受赏事后,陈旅即作《无锡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二首》以记其事。同时,都水监经历王诚甫出知无锡州时,陈旅特作《送无锡州知州王诚甫序》为其送行,并提醒其:“比岁东南大雨水,吴几沼焉。而无锡为澍右大州,为州牧者其责亦重矣。”并称:“他日南归将卜居于兹,未必不及诚甫之德惠也。”梁大同期间(535–546)无锡在斗山建青玄观,宋初徙置城中赐额曰“洞虚观”,元泰定元年(1324)改观为宫,文宗至顺三年(1332)秋,宫内的三元祠山殿不慎毁于火,时邑之高士华益谦既主宫事又兼治杭之宗阳西太乙宫,遂募集资金在原址重建三元祠山殿。殿于至元四年(1338)建成,陈旅遂应华益谦之邀作《洞虚宫三元洞仙殿记》以记其事。陈旅曾有《题元镇雨竹》诗云:“落日楚江深,鹧鸪啼远林。相思不可见,池上写春阴。”

○ 韩友直(伯清)　是年夏季久旱未雨,河道枯涸,至八月始大雨连日,遂欲从钱塘赴京师游,友人为之作诗送行,陈旅特为序以记其事。

按:韩友直,字伯清,号介石,浙江会稽人,以官宦居家钱塘。元顺帝至元间(1335–1340)任平江财赋副提举。韩友直与倪瓒、张翥、张德常、张德机等友善,倪瓒与其时有诗函往来,如倪瓒《寄韩伯清》云:“何处田庐业可租,金堂玉室梦全无。为谋蔬药樵渔地,好在何山碧落湖。”《寄韩介石》云:“江上雨云歇,夕阳歌吹濛。朱弦弹绿绮,令我忆韩众(一作终)。鱼戏弱藻下,鸟飞

图一　朱德润《林下鸣琴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镜中。梦乘清浦月，直过雪溪东。”倪瓒并常与韩友直谈论艺事，如他在生病期间曾致函韩友直云：“瓒以七月末得□疾，卧病兼旬，幽忧无聊，因赋诗以自解云耳。辱执事及德常县宰书教，俾写学门石记，记文特古淡可爱，郑翁杰思也。缪书不由讲学，点画不能遒媚，结体还更俗恶，又颇工于小，不工于大。县宰欲流传于久远，宜属之工于书人品异俗者，乃于文称耳，缪书那能副高意耶？瓒非饰辞，切告！相体幸甚！”“瓒启。经宿不面，旦来想体力佳也。此时早饷已久，能同德机先生缓步过蜗牛庐中一啜日注茶，观陆探微写宗茂深像否？德机处不别书也。”

○ 柯九思(敬仲)　四十七岁　正月，应顾瑛之邀，与姚文奂(子章)过玉山草堂，有诗酬唱。

按：姚文奂，字子章，自号娄东生，又号野航道人，吴门娄江人。元人顾瑛的《草堂雅集》载：姚文奂“聪敏好学，过目即成诵，博涉经史，搢绅先生咸加推重。辟浙东帅阃掾，虽公事旁午，不废吟咏，把酒论诗，意气豁如。每过予草堂必有新作，故所录尤多，家有书声斋、野航亭。”姚文奂为倪瓒友人，倪瓒与其时有往来，曾有《别姚子章都事》云：“不见高人十五年，相看两鬓各皤然。酒温莺语烦三请，椹熟蚕筐已四眠。舞袖醉傲明月下，归心飞度白鸥前。练溪倘见韩征士，好示新图竹色娟。”姚文奂亦有《题倪元镇云林图》云：“昔从云林游，灵光散霞外。回薄万古情，逍遥五噫态。临流以濯缨，息阴为解带。浩歌激清商，参差动天籁。”

○ 朱德润(泽民)　四十三岁　十月望日，作《临川曾氏郊祀礼序》。

按：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号睢阳散人，别号眉宇山人，又号空同山人，原籍睢阳(今河南商丘)，居昆山(今属江苏)。朱德润年轻时即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曾就学于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名士姚式(子敬)，后经赵孟頫推荐，官国史编修、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朱德润善诗文，工书法，擅画山水。其山水初学许道宁，后宗郭熙，多作溪山平远、林木清森之景，山石用卷云皴，树作蟹爪枝，笔墨秀健有力，苍润秀逸，颇具真实感，在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之外另辟蹊径。存世画迹有《秀野轩图》、《林下鸣琴图》(图一)和《浑沦图》等。书法学王羲之，笔力遒健，格调清丽。官场失意后，朱德润遂“杜门屏处，讨论经箱，增益学业，不求闻达，垂三十年，声誉弥著”。并著有《存复斋集》十卷。朱德润与倪瓒、徐良夫等友善，朱德润曾为徐良夫的耕渔

轩作《耕渔轩图》,倪瓒在是图上作题云:“寂寂溪山面碧湖,轻舟烟雨钓菰蒲。晓耕岩际看云起,夕偃林间到日晡。汉书自可挂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壶。江稻西风鲈鲙美,依依蓐食待樵苏。”倪瓒又有题《朱泽民小景》云:“朱君诗画今称绝,片纸断缣人宝藏。小笔松岩聊尔尔,道宁格律晚堂堂。倪瓒。”可见,倪瓒对朱德润的书画艺术是挺推重的。

○ 郑元祐(明德) 四十五岁 时新安吴希颜为和靖书院山长,郑元祐为其作《重修和靖书院记》。

○ 张渥(叔厚) 春五月作《弥陀佛像》。

按:张渥《弥陀佛像》(图二)设色纸本,纵87.5、横30.4厘米。设色画一弥陀佛于石案旁,一童子执经函相侍于后,一童子在一侧添香。上有乔木芭蕉,如意灵芝。本幅右下署款云:“至元丙子春五月,张渥敬写。”下钤“张渥”和“叔厚”二朱文印。至元丙子为元顺帝至元二年,即公元1336年。释宝金书有《佛说弥陀佛经》,署款为:“龙集至正二十五年(1365)岁次乙巳四月吉日,永寿释宝金稽首敬书。”此图原为清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幅鉴藏宝玺有:“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清宫鉴藏宝”、“珠林重定”、“秘殿新编”和“无逸斋精鉴玺”、“太上皇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等。细鉴此图,所画线条较为软弱而缺失刚劲飘逸之感,笔墨也不够简约精致,疑为后人的托名之作。

又按: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江海客,祖籍淮南(今安徽合肥),后居杭州(今浙江杭州)。张渥通文史,好音律,然屡举不中,仕途失意,遂寄情诗画。能山水,“尽自然之性”;擅长人物,法李公麟白描并得其清丽流畅之风;尤擅“铁线描”,被誉为“李龙眠后一人而已”。所作人物线条刚劲飘逸,形象生动传神,整体构图严谨简洁,画风雅逸隽秀。兼画梅竹亦潇洒有致。传世作品有《九歌图》、《竹西草堂图》、《雪夜访戴图》、《瑶池仙庆图》等。

图二 张渥《弥陀佛像》(疑伪)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渥所作《九歌图》有三卷,现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三图在人物布局上略有不同,但笔法基本一致,用笔流利潇洒,人物意态生动有致。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九歌图》作于至正六年(1346),纸

图三　倪瓒题《张渥九歌图卷》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本，纵29、横523.5厘米，画屈原及《九歌》中之神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等11段，共20人，末段识云：“至正六年岁次丙戌冬十月，淮南叔厚张渥临李龙眠九歌图，为言思齐作。吴叡孟思以隶古书其词于左”。所作白描人物笔法劲利飘逸，如行云流水，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传神。虽临自李公麟，但张渥在其中已参入己意。卷上有倪瓒跋云：“张叔厚画法，吴孟思八分，俱有古人风流，今又何可得哉！壬子六月廿九日观于思齐西斋。”(图三)倪瓒与张渥甚为友善，时有往来。至正八年(1348)春季，顾瑛邀请倪瓒、张雨、杨维桢、张渥、姚文奂、陈基、李孝光、郯韶、于立等相聚玉山草堂雅集，张渥特以白描法作《玉山雅集图》卷，杨维桢特作记以记其盛。此次雅集“时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张雨、永嘉征君李孝光、东海倪瓒、天台陈基也”。事后，倪瓒好友吕尊师访倪瓒于萧闲馆时，为言这次雅集之盛，倪瓒特作诗云：“至正九年八月十六日，计筹山吕尊师访余萧闲馆，为余言顾仲瑛征君玉山隐居之胜，辄想象赋长句以寄，他日尚同袁南宫携琴啸咏竹间也。解道玉山佳绝处，山中惟有吕尊师。已招一鹤来庭树，更养群鹅戏墨池。松风自奏无弦曲，桐叶新题寄远诗。若许王猷性狂癖，径来看竹到阶墀。时南宫同在萧闲馆中，就致意焉。”

○ 周朗（伯高）　正月廿四日，为康里巎(子山)作《杜秋图卷》，署款云：“周朗伯高”，下钤“冰壶画隐”朱文印。卷后有康里巎行书题写的杜牧《杜秋娘》诗全篇和宋琚二题。是年，奉元顺帝之命作《拂郎国献马图》，由同朝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曼硕)题赞。

○ 康里巎（子山）　四十二岁　二月十七日，以行书在周朗所画的《杜秋图卷》后书杜牧《杜秋娘》诗全篇，诗后识云：“至元二年岁丙子正月廿四日，冰壶为余画杜秋娘，遂书杜牧之之诗于其后，二月十七日子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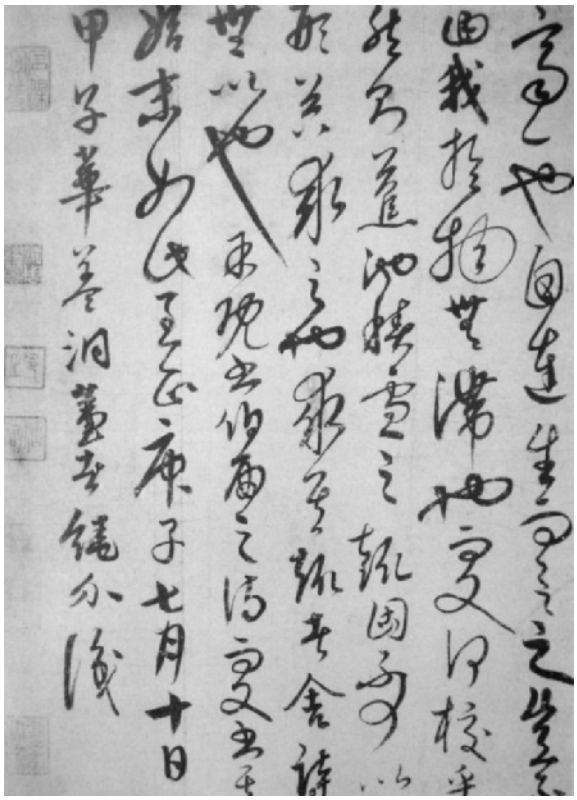
○ 陈昱　二月既望，题郑思肖(所南)《墨竹卷》云：“我身坐船中，竹自在沙渚。静观不推篷，固已识全体。喜来踏破漆桶底，小作此君聊戏耳。此君彻上彻下旨，相逢无言只弹指。春山车马东风前，荒深一脉秋花天。百年斯文谁为传，欲吊是翁吾亦颠。至元二载中春既望，吴人陈昱题。”

○ 王廷器　八月十六日，题郑思肖(所南)《墨竹卷》云：“所南翁吾乡老先生也，残笔剩墨

流落人间,为世珍美。时或苍烟半抹,斜月数竿,超出意外。姑苏徐君彦用果好事者,倾橐赎而表出之,当代贤豪浩有题跋,余忝幸桑梓之末,敢不貂续数语,涕泗感激,为徐君谢云。丙子八月十六日,三山王廷器敬书。”

按:郑思肖 (1241–1318) 原名少因,字忆翁,号所南,自称菊山后人、景定诗人、三外野人、三外老夫等,祖籍福建连江县透堡东导村(今为塘里村)。少为太学生,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元军大举南下时,上书太后、幼主,痛陈时政弊端,忤怒了当权者。宋亡,改名思肖,号所南,表示思念赵宋,流寓江苏苏州,隐居不仕。郑思肖工诗,擅画兰竹,诗画珠联璧合,著有《一百二十图诗集》,又有《心史》。存世画迹有《国香图卷》、《竹卷》等。倪瓒十分敬重郑思肖的人品与艺品,曾有《题郑所南兰》云:“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

○ 舒叔献　五月八日,为好友王起善家藏《二王墨帖》碑拓作题云:“由籀而篆,篆而隶,隶而楷,楷至二王,蔑以加矣。此东方画赞洛神赋,确乎见重于后世也。近攻隶书者自负轶出江左,追踪汉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则訾之曰此晋字也。使诚知晋字为六朝唐宋之冠,则无是语。惟其未见二王妙处,辄于似晋者而轻肆雌黄之口,而于二王其何伤于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虽是碑刻,精神韵度自是绝尘,他日有訾晋字或一见之,岂不愧汗浃背乎。至元二年丙子岁夏五八日。天台舒叔献书。”



图四　饶介《蕉池积雪诗》

○ 丁应荣　三月,为王起善家藏《二王墨帖》碑拓作题云:“谷阳龚先生子敬为仆题唐丁府君墓铭有云:祖孙一气虽远犹亲,古人所以严祭祀之义。今观起善远祖右军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斋所藏,手泽存焉,展卷起敬。济阳生丁应荣。”

按: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张旭的《自言帖》上也有丁应荣的观款,云:“济阳丁应荣览”,下钤“丁应荣印”。

○ 刘汶(师鲁)　十月既望,应吴兴蒋心源所邀,为黄庆翁的《菊山诗卷》作序,署款云:“至元后丙子十月既望,鄜川遗民刘汶师鲁甫序。”

按:刘汶,字师鲁,鄜州(今陕西富县)人。宋鄜王琦六世孙也。父月心,为鄜后,占籍钱唐。刘汶自胄学以文艺擢高科,由端本堂司经拜西台监察御史,纠劾不避,忤时贵,左迁,累官户部尚书。至正二十三年(1363),命以东南漕事,浮海而出。刘汶以诗鸣,豪迈激昂,极为松乡任士林所赏识。尝曰:“自余得杨仲弘,人方翕然从余,后得师鲁,而人益信余,将以二子自勖也。”刘汶为人豪迈激昂,以诗名于时,有《师鲁集》一卷传世,集中有《次韵张伯雨蕉池积雪诗》二首:“铜驼陌上得铜洗,曾见汉朝风露零。寒光未变劫灰黑,古色犹带宫苔青。金人堕泪漫怀古,玉女洗头真寓形。与君作池媚蕉雪,何以报之双玉瓶。”“仙掌金盘列风露,人间琛宝多飘零。忽看铜洗土花碧,侧想玉女云鬟青。千年偶在聊寓意,万物终毁无逃形。吾徒汲古宁玩物,愿子及泉资绠瓶。”事后倪瓒追和张雨、刘汶之韵题云:“昔张

外史有古铜洗,种小蕉白石上,置洗中,名之曰:蕉池积雪轩。西园老人追和张、刘二君诗书挂轩中,予亦为之次韵。雪中芭蕉见图画,蕉池积雪终凋零。风翻窗里浪花白,雨压床头云叶青。诗人超轶有远思,造物变幻难逃形。尔亦林居喜幽事,晓浥石溜携铜瓶。”十余年后,吴江周君仿张雨之举作“蕉池积雪”,并请倪瓒和张雨的好友饶介“书其实并诗以表之始”,饶介记云:“右海昌张伯雨蕉池积雪诗一篇,其称群公次韵仅存者刘师鲁二篇。伯雨之为蕉池积雪,去今十余年,吴江村叟周君为蕉池积雪,视伯雨所为无少异,周君喜其暗合也,求书其实并诗以表之始……至正庚子(1360年)七月十日,华盖洞著书者饶介识。”(图四)

又按:黄庆翁为吴兴人,“隐德不仕,贲于丘园”,“世幅巾杖,履优游田里”,因慕于陶渊明东篱采菊之情,遂自号菊山,并作有《菊山诗卷》。此卷除有刘汶作序外,尚有释大圻、释祖暎、邓汝砺、胡助、宇文公谅、程敬直、马夷中、柯九思、余震诸题。

○ 王逢(原吉) 十八岁 五月,作《感宋遗事二首有引》,诗云:“五月无花草满原,天回南极夜当门。龙香一篆魂同返,犹藉君王旧赐恩。”同年,作《上党有寡妇》。

○ 高启(季迪)生。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苏州)人。始号槎轩,后因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自号青丘子。高启“少警颖力学,天资秀敏”。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固辞不赴,被赐金放还。后因《上梁文》得罪朱元璋而被处于腰斩酷刑,年仅三十九岁。高启工诗善文,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为“吴中四杰”,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其:“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毛泽东也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其诗兼采众家之长,“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 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传世。高启虽为人孤高耿介,然与倪瓒十分友善,常有交往与酬唱,如其《寄倪隐君》云:“名落人间四十年,绿蓑细雨自江天。寒池蕉雪诗人画,午榻茶烟病叟禅。四面荒山高阁外,两株疏柳旧庄前。相思不及鸥飞去,空恨风波滞酒船。”《次倪云林韵》云:“云林已白头,犹有晋风流。爱写沧州趣,闲来玄馆游。茶烟秋淡淡,竹雨暮修修。欲向南池水,长流青翰舟。”《次云林见寄韵》云:“老来诗阵尚堂堂,过宿曾留让大床。病骥可堪迷远道,孤松只合在高冈。萧萧鬓影惊寒色,渺渺云山敛夕光。莫道欲归无好处,便寻勾漏与华阳。”“草满当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床。秋风吟怨哀兰浦,暮雨行愁苦竹冈。任侠岂能谐薄俗,养和且为驻颓光。酒钱十万今谁送,独嗅黄花对夕阳。”从年龄上看,倪瓒应比高启年长三十岁,两人的交往属忘年交,但从“过宿曾留让大床”等诗句看,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他们除有共同的好友如徐贲(幼文)、周南老(正道)、卢恒(士恒)、赵元(善长)等外,还时常会因同游一个地方而吟诗酬唱。如高启有《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云:“昔游紫藤坞,空山鹤鸣秋。相望隐人居,兴阑竟回舟。迩来获晤赏,玄谈剧风流。每欲开南轩,招我共偃休。天寒鸿雁鸣,芰荷落长洲。岂无一钓船,访子溪水头。终惭文墨牵,咫尺成阻修。听雨掩阁卧,观泉上岩游。朝览赠答篇,词藻夸两优。我本丘壑人,猿鹤肯见留。拟结岁晏期,壶觞展绸缪。况聆西涧滨,禅宫閟清幽。夜看太湖月,迟我同登楼。”《游师子林次倪云林韵》云:“吟策频入院,道人知我闲。寻幽到深处,鸟语竹班班。林下不逢客,城中俄见山。床敷有余地,钟动莫催还。”至正二十二年(1362)秋,高启、倪瓒、周南老等人同游天平山,高启遂作《游天平山记》并有《游天平山》诗云:“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十里松杉风,吹醒尘土梦。兹山凡几到,题字遍岩洞。阳厓树冬荣,阴谷泉夏冻。怪石立谁扶,灵草生岂种。白云蓊然来,诸峰欲浮动。高鹘有危栖,幽禽无俗哢。凌蘚知履滑,披岚觉裘

重。常登最上巅,远见湖影空。渔樵渡溪孤,乌鹊归来众。还寻老僧居,隔竹听清诵。慰我跻扳劳,为设茶笋供。几年历忧欢,造物若揶弄。迷途远山林,迟暮堪自讼。”倪瓒亦有《游天平山》诗云:“天平烂漫游三日,林下狂吟石上眠。浩荡春风芳草绿,梅花雪满白云泉。”在与倪瓒的交往与诗词酬唱中,高启也十分敬重倪瓒的翰墨风致,并多次在倪瓒的作品上题咏,如其有《题倪云林画赠因师》云:“含晖峰下路,树石尽垂藤。欲认莓苔迹,相寻行道僧。”《倪元镇墨竹》云:“倪君好画复耽诗,瘦骨秋来似竹枝。前夜梦回如得见,纸窗斜影月低时。”《题倪云林竹》云:“秋思与秋影,闲斋助夕清。幽人梦回处,烟乌月中鸣。”《题云林生画林亭远岫图》云:“归人渡水少,空林掩烟舍。独立望秋山,钟鸣夕阳下。”《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云:“尝啜阳羡茗,不游阳羡山。铜官结秀色,都在画图间。樊川醉游处,水榭依沙树。云入县城来,溪流太湖去。我爱云林生,高歌无俗情。石庭梅欲发,须放酒船行。”

○ 赵世延(子敬) 七十七岁 五月,去成都;十一月,卒于成都。

按:赵世延(1260–1336),字子敬,其先蒙古雍古族人,祖先原居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北边塞上,后因官居家四川成都。赵世延天资秀发,幼喜读书,弱冠即被招入枢密院御史台“肄习官政”。历官集贤大学士、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赠“世忠执法佐运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忠”。后世对其评价甚高,《元史·赵世延传》载:“世延历事凡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

是岁正月,宿松县地震,山裂。

四月,禁民间私造格例。

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服等服。

五月,黄河复于故道。自是月至六月中,南阳(今属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大霖雨,湍河、白河大溢,水为灾。

六月,禁诸王、驸马从卫服只孙衣(亦称质孙),系绦环。

礼部侍郎勿里台请恢复科举取士之制,不听。

七月,黄州蝗,督民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诏:“云南、广海、八番及甘肃、四川边远官,死而不能归葬者,有司给粮食舟车护送还乡;去乡远者,加钞二十锭,无亲属者,官为瘗之。”

诏:“强盗罪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刺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盗诸物者,照其数估价。省、院、台、五府官三年一次审决。着为令。”

九月,驰巩昌总帅府汉人军器之禁。

十一月,禁弹弓、弩箭、袖箭。

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十二月,命省、院、台、翰林、集贤、奎章阁、太常礼仪院、礼部官定议宁宗皇帝尊谥、庙号。

江州诸县饥,总管王大中贷富人粟以赈贫民。免富人杂徭以为息,约年丰还之,因是民不病饥。

是岁,江浙大旱,自春至八月一直无雨,民大饥。

诏整治驿传。

(编辑:阎智海)

康熙第二次南巡幸寄畅园时间考

秦志豪

一. 文献记载一

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一月初八日—三月十九日。

我们从《康熙起居注》、《清实录》、张英《南巡扈从纪略》等文献资料中选取了其南下过长江后，从金山继续南巡直到回銮再到江宁这一段行程的相关记载，并从《清世祖圣祖御制诗文》中摘取了康熙所留下的对应上述行程的诗作。现就上述两部分作一对照分析，列表如下：

时　　间	行　　程	御制诗程序
一月二十九日(丁酉)	上驻跸镇江府金山寺。	《金山江天寺》 《焦山》 《驻跸金山》
一月三十日(戊戌)	上过镇江府,驻跸丹阳县七里庙。	
二月初一日(己亥)	上驻跸常州府海子口。	
二月初二日(庚子)	上驻跸无锡县放生池。	《雨过锡山》
二月初三日(辛丑)	上驻跸苏州府城内。	
二月初四日(壬寅)	上巡察民生风俗,便道观虎丘山。 上驻跸苏州府。	《虎丘望山后》
二月初五日(癸卯)	上观苏州府属万峰山、太湖。 上驻跸万峰山。	《邓尉山》 《邓尉小轩望太湖》
二月初六日(甲辰)	上自万峰山启行,观灵岩山。 驻跸吴江县龙王庙。 是日,随到吴江县已深夜。(张英《纪略》)	《登灵岩》 《晚过吴江》
二月初七日(乙巳)	上驻跸浙江秀水县施茶亭。	《入平望》
二月初八日(丙午)	上驻跸仁和县塘栖镇。	《禾中道上》
二月初九日(丁未)	上驻跸杭州府城内。 上已登吴山,急往从之。(张英《纪略》)	《巡幸杭州》 《吴山》
二月初十日(戊申)	上驻跸杭州府。 驾之西溪,予未从。(张英《纪略》)	《泛舟西湖》 《西溪》 《题西溪山庄,以“玉牕”二字书赐高士奇》 《过桃花岭至玉泉寺》 《湖心亭》
二月十一日(己酉)	上驻跸杭州府。	
二月十二日(庚戌)	上驻跸杭州府。 大雪。(张英《纪略》)	

时　　间	行　　程	御制诗程序
二月十三日(辛亥)	上渡钱塘江,往禹陵,驻跸绍兴府会稽山麓。 驾入绍兴登卧龙山。(张英《纪略》)	《渡钱塘江》 《山阴》 《谒大禹庙》 《登卧龙山越望亭》
二月十四日(壬子)	上亲撰祭文诣禹陵致祭,上驻跸萧山县西兴镇。	
二月十五日(癸丑)	上驻跸杭州府城。 十五日过云栖、灵隐、暮登舟过西湖,宿西兴之次日(十五日)渡钱塘。	《云栖竹树甚茂幽兰满山》、《虎跑泉》、《灵隐寺》、《飞来峰》
二月十六日(甲寅)	上幸演武场,阅官兵骑射,上驻跸杭州府。	《谕浙省将吏军民》
二月十七日(乙卯)	上自杭州回銮,乘舟还至石门县。 石门镇驻跸。	《舟中书怀》
二月十八日(丙辰)	上驻跸吴江县南。	
二月十九日(丁巳)	上驻跸苏州府城。	
二月二十日(戊午)	乡绅士民请圣驾暂留数日,上曰:姑留一日,后日早行。上驻跸苏州府城。	
二月二十一日(己未)	上驻跸苏州府。	《将游华山以欲雨未往》
二月二十二日(庚申)	上在苏州未发时，新任浙江巡抚张鹏翮等陛辞,请旨训谕。 上自苏州府启行,驻跸无锡放生池。	《雨中幸锡山园林》 《惠泉》、《无锡小民以羔羊惠酒争献御舟笑而遣之》
二月二十三日(辛酉)	上过常州府,御舟泊丹阳县。	
二月二十四日(壬戌)	上由陆路启行,驻跸句容县城。	《句容望雨》
二月二十五日(癸亥)	上驻跸江宁府城内。	《巡幸江宁》

1. 把上述行程整理一下，从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康熙先后途径镇江(一月二十九日)、丹阳(一月三十日)、常州(二月初一日)、无锡(二月初二日)、苏州(二月初三至二月初五)、吴江(二月初六)、秀水(二月初七)、仁和(二月初八)、杭州(二月初九至二月十二)、绍兴(二月十三)、萧山(二月十四)、杭州(二月十五至二月十六)、石门(二月十七)、吴江(二月十八)、苏州(二月十九至二月二十一)、无锡(二月二十二)、丹阳(二月二十三)、句容(二月二十四)、江宁(二月二十五),历时二十七天。

2. 上述御制诗程序没有改动过也没有遗漏,行程和御制诗程序很契合,御制诗甚至可精确到“日”,至多只有一天的误差,因而上述列表所反映的内容可信度很高。

3. 很明显,康熙第二次南巡,在南下时和回銮北上时,御舟都在无锡县放生池停过,南下时到无锡时间是二月二日,据《康熙起居注》和《清实录》二月初二日所记,康熙当天接见了多批官员,外面又下着雨,当日康熙留下一首诗:《雨过锡山》:“轻云冉冉雾弯环，细雨丝丝幂远山;画舫青帘开晓坐,平波漫衍白鸥闲。”诗题中“过”字说明没有登岸；从诗文内容看，外面雾气濛濛，下着小雨，康熙在御舟上欣赏着锡山的景色,御舟驶离了惠山,所以并没有上岸。康熙回銮时到无锡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二日，并留下了三首诗。光从诗题我们可以断定康熙临幸了惠泉和寄畅园。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康熙第二次南巡是在回銮时临幸了寄畅园。

二. 文献资料二(地方文史资料)

1. 《乾隆无锡县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乘舆还自会稽,夜抵锡山,驻跸黄埠,及明放艇山中,遂步玉趾再临寄畅,循览移时,因御书'品泉'二字,命前谕德臣松龄刻扁泉上,而以墨本赐之。"

按:回銮时临幸。

2. 秦毓钧《寄畅园家集纂》:"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南巡,二月辛丑至苏州,丁未至杭州,辛亥渡钱塘江,祀禹陵,乙卯回銮幸惠山,驻跸寄畅园。"

按:回銮时临幸。

3. 严绳孙《惠山第二泉御书记》:"春二月,还自会稽,北出无锡。时民以肆赦之余又新留贤令,踊跃之情有加于常。歌吹沸天,灯火匝地。上既驻跸黄埠,厥明,遂步玉趾临于第二泉。灵雨乍零,有诏令民无长跪,于是观者咸呼万岁。"

按:"还自会稽,北出无锡"说明是回銮时临幸。

又按:据《起居注》:二月初二,康熙驻跸放生池,下谕旨:无锡县降级县令百姓称其善,着带所降之级留任。

严《记》有:"时民以肆赦之余又新留贤令,踊跃之情有加于常"。这不但说明了是回銮时临幸,还可看出二月初二日南下过无锡时没有上岸临幸。

上述三个旁证,加强了我们的康熙是回銮时临幸寄畅园的结论。

三. 张英《南巡扈从纪略》中的疑点

张英《南巡扈从纪略》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扈从康熙第二次南巡的经历和见闻,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但在康熙临幸无锡的时间上和上述文献的结论不同,引起了疑虑。现从《昭代从书》收录的《纪略》全文中,摘录有关康熙临幸无锡的部份,以供分析。

张英《南巡扈从纪略》:

初二日至无锡,驻跸黄埠墩,时已暮,墩上悬灯数百盏,下映河水,甚可观。次早,上至秦家园,观惠山泉。予同京江随至秦园,时梅花盛放,登天香楼,看殊烂漫。有大山茶一株,高二丈,亦作花,朱殷千朵,与梅相映。园中有樟树大十围,上问留仙曰:汝家老樟树无恙否?又问:此树几何年?对曰:此园在臣家二百年,在前原有此树,不知其年也。园中多林木,清池居中,纵横可八九丈,堂阁亭榭环之。叠假山为溪谷,水从溪谷入池。时折玉蝶梅大枝贮瓶中,予从主人索梅插瓶,时驾已回,主人因以此一枝为赠。

……

二十二日到无锡,过惠泉,再过秦园,又之邹园。

《纪略》记载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时,"往""返"皆幸惠山和寄畅园,这同前面的结论"康熙第二次南巡时仅在回銮时临幸了惠山和寄畅园"相矛盾,笔者试从下述四个方面来说明《纪略》的结论可能有误。

1. 张英在《纪略》中谈到康熙和秦松龄关于老樟树在秦园二百余年的问答,而张英有诗《锡山秦家园二首》第二首有:"老树霜皮态转妍,含清堂畔绿阴偏。至尊相问何年种,自入秦家二百年"。讲的是同一件事。《锡山秦家园二首》收录在张英《存诚堂诗集·卷二十三》中。此诗集是按时间排序的,我们很容易据诗题所反映的时间推算出此诗作创作的年份。《存诚堂诗集·二十三卷》的第一首(按诗题排序)是:《己巳春日毗陵道上》(常州)、第二首是《入邓尉山九绝句》(苏州)、第三首是《过双泉草堂》(苏州)、第四首是《冷泉亭》(杭州)、第五首是《云栖》(杭州)、第六首是《灵隐寺》(杭州)、第七首是《孤山》(杭州)、第八首即《锡山秦家园二首》(无锡)、第九首是《金陵绝句二首》(江宁)。"己巳"是康熙二十八年,"春日"正是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时间,而张英是随驾扈跸大臣,在第九首《金陵绝句二首》中有"扈跸经过朱雀桥"之句,说明第一首到第九首都是张英扈跸时所作,所以《锡山秦家园二首》应作于康熙二十八年。

据上述九首诗反映的地点依次是:毗陵(常

州)、苏州、杭州、无锡、金陵(江宁)。

很明显,《锡山秦家园二首》是张英随驾回銮时所作。

《锡山秦家园二首》和《纪略》讲的都是同一时间、同一件事,因而《纪略》记述的时间应是康熙回銮时的时间,不是二月二日,而是二月二十二日。这是张英自己的诗集中反映的时间否定了张英《纪略》中的时间。

2.《康熙起居注》和《清实录》所反映的情况和张英《纪略》有矛盾。

《康熙起居注》二十八年二月初二:

初二日庚子。上驻跸无锡县放生池。是日,谕旨云:"无锡县降级调用知县徐永言,百姓奏称其善。问之巡抚洪之杰,亦云居官素优,着带所降之级留任。"是日,常州府知府周元宰等,武进县知县罗国珍、守备徐名显等,原任尚书杜臻,原任侍郎严我斯等,原任布政使胡献徵,原任按察使许缵曾、浒墅钞关郎中阎承诏、松江府同知李经政、无锡县知县徐永言、千总赵钦等来朝。

《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

庚子,御舟泊无锡县放生池,福建浙江总督王骘、浙江巡抚金鋐、平阳总兵官李华等及原任工部尚书杜臻、礼部侍郎严我斯等来朝。

康熙南巡并没有停止早朝,早朝是在御舟上进行的,批奏折、拟谕旨、接见地方官员、处理朝政等等。二月初二,康熙驻跸放生池,接见多批地方官员,因而当天一早是不可能上岸临幸的,而张英的《纪略》却讲:"驻跸黄婆墩时已暮……次早,上至秦家园、观惠山泉。"这是矛盾的所在。

《康熙起居注》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戊午:

苏州乡绅士民恳留圣上多待几日,"上谕曰:……'既尔等殷殷恳请,明日迟迟起行可也。'绅民等复叩首恳留,继以泣下。上谕曰:'念尔等再三攀留,出于诚恳,勉徇所请,姑留一日,后日早行。'"

很明显,回銮时康熙为了怕耽误返程,在苏州多停了一日。(二十一日)后,二十二日一早就一定要启行了。

《康熙起居注》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庚申:

上在苏州未发。浙江巡抚张鹏翮、江苏布政使李国亮、浙江布政使卞永誉陛辞,请旨训谕。……谕毕,鹏翮等出。是日,上驻跸无锡县放生池。

康熙二十二日清晨,起得很早,先处理好政事,再往无锡,这样,到了无锡可避免政事干扰,有充裕时间临幸惠山和寄畅园。

又据严绳孙《惠山第二泉御书记》:"上既驻跸黄埠,厥明,遂步玉趾临于第二泉。"

由于按排得好,康熙御舟到无锡黄埠墩(放生池在旁),可能还未天明,稍事休息,天刚亮就步行临第二泉。因而康熙回銮时临幸无锡的时间是在清早。张英《纪略》讲的也是清早,既是清早,不可能二月初二日,只能是二月二十二日。

3. 康熙的南巡诗说明了康熙第二次南巡临幸寄畅园的时间。

本文一开始,我们就论证了《起居注》、《实录》、《纪略》和御制诗对照得出了时间和地点非常吻合。二巡在无锡留下了四首御制诗,第一首《雨过锡山》是在二月初二,还有三首都是在回銮时二月二十二日,其中有一首《惠泉》:"寒云覆树昔年经(甲子观惠泉在十月),再品山泉到此亭。春水一犁农事足,喜看膏雨遍郊坰。"

从诗中可看出,康熙第一次到惠泉是二十三年甲子。"再品山泉到此亭",说明这次是第二次。由于此诗是作于二十八年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所以康熙的《惠泉》诗证明了第二次南巡二月初二日没有临幸惠泉,而是在回銮时二月二十二日临幸的。

4. 丁传靖《张文贞公年谱》中有关内容证明了康熙是在回銮时临幸了寄畅园。

《纪略》中提到张英同京江同至秦园,京江即张玉书,笔者查到了丁传靖《张文贞公年谱》:(康熙)二十七年戊辰,47岁。转兵部尚书,五月

奉命勘视河工,八月还京。(《先正事略》)十二月奉命往浙查办事件。(《行述》:浙江巡抚金鋐奏,民杜光遇等讦控兵于害民十款,上命公偕大司空苏公赫往浙察审。比至,而光遇等姓名皆诡讬无其人,所列款又绝无左证,且奏内多诽谤语。公按律奏拟。)转礼部尚书孙迪生。(逸少出康熙癸巳举人,后官陕西榆林知府)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48岁。正月自浙还,值上阅河南,巡于苏州,复命。(《国史传》:覆奏,查无杜光遇其人,抚臣金鋐捏造虚款,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会,情罪非轻,应按律问罪。案:《行述云》:于郯城复命。《国史传》及《东华录》均云在苏州,今从之。)奏事毕,即命从行,三月至淮安。

按:(1)据《张文贞公年谱》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到康熙二十八年正月这一段经历,主要是叙述张玉书奉康熙命往浙调查浙江巡抚金鋐奏称民杜光遇控告兵丁害民十款之事。这牵涉到民众和驻浙官兵的关系,是影响国家安定的大事,康熙非常重视,而调查结果是"查无此事",明显是金鋐杜撰,问题就严重了。

(2)张玉书把调查结果曾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上了奏折,由礼部转呈康熙,这说明康熙在召见张玉书之前已了解整个案情。

(3)康熙召见张玉书是在苏州,结案后,命张玉书从行。

(4)要判断张英《纪略》中所讲二月初二张英、张玉书随同康熙幸秦园的时间有否搞错,就要从康熙处理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去找原因,并把这个过程和张玉书回京复命、立即追赶南巡队伍、等侯召见的整个过程相印证,就能得出《纪略》中的时间有否搞错了。

我们据《实录》、《起居注》、《纪略》所反映的有关内容按时间顺序列出如下: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张玉书奉旨赴浙察申杜光遇案,并把结果上奏折由礼部转康熙。(《年谱》)

二十八年正月,张玉书自浙还,值上阅河南巡,张玉书回赶南巡队伍,向康熙汇报。(《年谱》)

一月二十四日,《纪略》中第一次出现张玉书身影,张英、张玉书,追随御舟,至行在,康熙已休息。(《纪略》)(注:"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

按:张玉书未被召见。

二月初二日,上接见多批地方官员,有金鋐在。(《实录》,《起居注》讲接见在二月初三)

按:金鋐还未罢官。

一早,张英、张玉书随康熙幸秦园。(《纪略》)

按:不可能。

二月五日、二月六日、二月九日、二月十三日,《纪略》中都有张玉书身影。张玉书、张英,都紧随御驾。

按:张玉书未被召见。

二月十五日,康熙幸西湖,后早回行在,传呼汉人无一人到,令侍卫传旨:朕于湖上未设宴,一饭亦未曾进,惟饮虎跑泉水一勺耳。汝等勿令后人口实,众皆惶恐失次。(《纪略》)

杭州将军郭丕叩请圣驾多留几日,康熙允曰:更留一日。(即十六日)(《实录》)

二月十六日,上幸教场,亲执酒赐将军郭丕,又命侍卫执酒赐军兵。上又阅官兵骑射。(《起居注》)

按:康熙安抚地方驻军,消除"金鋐案"影响。

二月十七日,上自杭州回銮,诫谕扈从部院大臣,民风需和谐,不能好为争讼,争讼起,小民受害。并传谕将军总督等令家喻户晓,兵民需日益协和,词讼日益减少,教洽化行,朕心实嘉焉。(《起居注》)

又谕:"巡抚金鋐、布政使李之粹俱着解任,俟原案完结,其员缺,朕另简授。"(《起居注》)

按:进一步消除"金鋐案"影响,金鋐罢官,但案尚未结。

二月十八日,驾至苏州,予(张英)与京江辈治具虎邱。(《纪略》)

按:张玉书未被召见。

二月二十日,部院诸公以昨游未畅,雇舟觅梨园,予与京江践念斋之约,至念斋家,念斋曰:有笔帖式相寻,上传甚急。我们坐肩舆至行在,满诸公皆未至,少顷陆续而至,他们云,我辈在船上演《会真记》,法聪、红娘方出,闻急召,从船窗上跳出,顾舆在,强舟子抬舆,不能疾行,遂步行,又念步行安能致远,又登舆,转觉迟缓,顿足怒骂,亦无法,相视大笑,少倾传召见。(《纪略》)

按:这一段生动的描述把康熙的急召和张玉书、张英的狼狈相跃然纸上。至此张玉书方受康熙召见。

《实录》先是介绍了"金鋐案"的原委,并介绍了处置结果:

上命兵部尚书张玉书等察审,至是张玉书等奏称,遍查杜光遇并无其人,明系金鋐捏造无影之款。李之粹附合金鋐,情罪可恶,并拟绞立决。得旨:金鋐流徙奉天地方,李之粹充发黑龙江。(《实录》)

上谕曰:浙江巡抚已革职,今用张鹏翮……汝辈以为如何?众皆对曰:甚然。后散。(《纪略》)

值上阅河南,巡于苏州,奏事毕,即命从行。(《张文贞公年谱》)

按:二月二十日,康熙急召扈驾大王,宣布对金鋐等处分和提拔新的浙江巡抚并征求意见。

二月二十日,召见结束,命张玉书从行。至此,张玉书正式为扈驾官员。(《实录》)

二月二十一日,谕扈从部院诸大臣,宣布张鹏翮等人升迁决定,若明日即行赴任。(《实录》)

按:金鋐一案正式结案。

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日到无锡过惠泉,再过秦园,又之邹园。(《纪略》)

把上述资料和分析总结一下,就找出了张英《南巡扈从纪略》中二月初二日记载的康熙幸秦园的内容错误之处。

时间不对。二月初二(或初三)康熙接见浙江巡抚金鋐;二月初二,张英、张玉书随同康熙幸秦园。这两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内。

《实录》和《起居注》在二月初二或初三都有接见金鋐的记载。

关于"金鋐案",张玉书已在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把察审结果,由礼部转呈康熙奏报,时隔一个月左右,康熙应已见过张的奏摺,二月初接见金鋐,因此案的处理程序尚未启动,所以康熙仍接见了金鋐。

康熙南巡十一日到杭州,十三日渡钱塘江,十四日祭禹陵,十六日、十七日安抚驻浙将士,告诫地方官员,理顺军民关系,接着金鋐罢官,回銮至苏州,二十日急召张玉书等部院大臣,宣布"金鋐案"处理意见,命张玉书"从行"。张玉书正式扈驾。扈驾大臣不总是陪同康熙参加有关活动的,康熙在某处临幸,他们可以就在附近自由活动,一听召见,立即赶往。像张英、张玉书陪同康熙幸秦园之事,不是经常发生的,张玉书"金鋐案"立了大功,这是一种宠遇。二月初二日"金鋐案",还无端倪,且张玉书尚未受康熙召见,怎又可能随同康熙幸秦园呢?

据上述分析,张英《纪略》把二月二十二日发生的事,记在二月初二日了。结论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临幸寄畅园的时间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回銮时。

(编辑:阎智海)

遗产

“宜兴窑系”——中国陶瓷史上杰出的文化类型

周小东

“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妆,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这是郭沫若先生对陶的赞颂。“陶器”是土、水、火在人工作用下完美结合的化身，是一万多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第一件新物质。“陶器”和“磨制石器”一起作为标志，代表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石器时期。

距今一万到四千多年(绵延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先后孕育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等文化类型,其中“陶文化”是其主要特征和架构。自阶级社会(以夏朝为标志)形成后,中原文化加速了其发展进程,特别是到了宋代,中华文化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平。其中陶瓷文化则以“汝、定、官、哥、钧”五大名瓷为主,形成蔚为壮观的“南青北白”局面,并逐步确立了“越窑系”、“定窑系”、“钧窑系” 等区域性陶瓷类别的历史地位。“窑系”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类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形式和载体。

一. “窑系”在陶瓷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陶瓷生产离不开“窑”。“窑”在概念上有三种意思:一是指“窑炉”,也就是陶瓷制品的烧成设备,“窑”指工作空间,“炉”指燃烧系统;“窑”,按其形制,可分为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龙窑、隧道窑和辊道窑等,按其燃料和燃烧方式,可分为柴窑、煤窑、煤气窑、油窑、电窑等;按其火焰流向可分为升焰窑、平焰窑、倒焰窑等;按其炉内氧气和二氧化碳含量可分为“氧化气氛”即“氧化焰”和“还原气氛”即“还原焰”。二是指陶瓷生产的窑场,即历代陶瓷产区,有时还包括就近的原料产地(所以旧称“十里窑场”),如定窑、钧窑、龙泉窑等。三是指窑器,即陶瓷器件,如官窑(器)、哥窑(器)等。

“窑系”和“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窑系”是建立在“窑”基础上的一个特定文化体系。中国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到了宋朝,陶瓷产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窑场林立;名品新品,层出不穷。近代陶瓷学者根据当时各地窑场产品的工艺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将其划分为多个瓷窑体系,即所谓的“窑系”。“窑系”的划分与确立可以说是陶瓷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对一个地区陶瓷文化类型的历史总结和高度肯定。每一个“窑系”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 中国陶瓷史上几个重要“窑系”及其影响

目前,在国内陶瓷界普遍认同的“窑系”有七个:北方地区有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有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这些“窑系”大多成熟于唐宋、辉煌于宋元、绵延于今朝。

南方“越窑系”是上述窑系中年代最早的一个“窑系”。瓷器成熟于东汉时期,到唐代,在浙江的长兴、德清、上虞、余姚、宁波等地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瓷器生产系统。当时,宜兴也生产类似的青瓷产品,但陶瓷界将其归入越窑系统。现代考古证明,当时“越窑”系统的中心在德清、余姚一带,历史上有名的“秘色瓷”就产于这里。曾经也有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先生在《瓷国游历记》中说:“有些专家认为浙江的德清直至绍兴

是著名越窑变迁的路线，我则认为很可能越窑的起点应该是德清以北不远的宜兴。”中国是瓷的故乡,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南方,包括起源于西周的宜兴青瓷。南宋以后,江浙一带瓷业向南转移,这不仅成就了“官窑”、“哥窑”,同时也成就了南方一个新的窑场的崛起，该窑场甚至影响到江西吉安和福建泉州等地，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梅子青”、“粉青”为代表的新的青瓷窑系——“龙泉窑系”。2009年,龙泉人凭借“龙泉窑系”的优势,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白瓷”是以宋代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并由此构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当时,江西吉安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均属于青白瓷窑系。该“窑系”最终成就了江西景德镇成为“中国瓷都”的历史地位。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影响很大,山西的平定窑、介休窑以及四川的彭县窑都归入其“定窑系”。关于“钧窑系”等其它窑系,同样具有各自特点和悠久历史。

通过认识这些“窑系”,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共有的五大特征:有历史、有规模、有特色、有影响、有传承。可以说每一个“窑系”都是中华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三. 当前确立“宜兴窑系”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陶器的历史虽然要比瓷器早几千年，但现实情况是七大“窑系”均是以瓷器为代表的瓷窑体系,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当时的生产工艺、历代皇家的追捧和当代专家的认识有关。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到了宋代以后，瓷器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而陶器成为粗质、低档的普通用具。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人们审美取向的多样化，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审视陶器的历史地位,对古人和今人有个交代。

中国是一个陶瓷古国、陶瓷大国。我们认为不能只有“瓷窑系”而没有“陶窑系”。宜兴是有七千年制陶史、二千年建城史、近千年“均陶”、“紫砂”发展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被誉为“中国陶都”,因此确立“宜兴窑系”存在诸多因素和条件：

1. 有丰厚的历史底蕴

七千年的制陶史、二千年建县史构成宜兴陶瓷文化发展的轨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成就了它今天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从未湮灭的七千年窑火成熟了这块土地,历代窑工艺人、先贤名人赋予了它特有的秉性。从新石器中期的夹砂红陶、晚期的黑衣陶、商周的原始青瓷、春秋的印纹陶、秦汉的釉陶、晋唐的青瓷、宋元至明清的均陶和紫砂陶到当代的“五朵金花”等陶器,宜兴的制陶历史从未断绝。目前,在宜兴范围内,地下文物星罗棋布、民间收藏遍及城乡、馆藏器物丰富多彩,构成一幅历史悠久、传承有序、代有新品、匠师辈出的陶瓷发展史画。这种地区性的文化形态和陶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地区是不多见的。

2. 有众多的窑址遗迹

宜兴山多林密、水网纵横,具备丰富的制陶资源。从古到今境内窑场分布广泛,历史上留下众多窑址遗迹。目前，被国家列为文保单位的有:新石器时期的西溪遗址、骆驼墩遗址,晋代的小窑墩龙窑遗址、唐朝的涧 汶龙窑遗址,宋代的真武殿古窑群、筱王村古窑群,明清的前墅古龙窑、蜀山古龙窑群以及民国早期的前进龙窑遗址等。其中明代前墅龙窑依然还在烧制产品,称得上是中国龙窑史上的活化石。这些窑址遗迹是宜兴人民的宝贵财富。

3. 有可观的文献资料

中国陶瓷史上文献资料丰富，有“博物要览”、“遵生八笺”、“南窑笔记”、“陶说”、“匋雅”、“饮流斋说瓷”以及一些地方志等。但大多数是讲瓷器为主,较少涉及陶器,连建国后有关学术单位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也是如此。宜兴历来崇文厚德,重视文化教育。明清以来留下了一些相关陶文化的古籍书本，有明代的《阳羡茗壶

系》,清代的《阳羡名陶录》、《茗壶图录》,民国的《阳羡砂壶图考》、《宜兴陶器概要》等书籍,建国后随着考古工作开展,增加了许多考古资料。近年来,由于紫砂文化的巨大影响,各类紫砂书籍更是大量出版,其中极具影响力的出版物有中国大陆出版的《紫砂陶器造型》、《宜兴紫砂器造型图录》、《紫砂乾坤》、《宜兴陶艺》、《宜兴陶器图谱》、《中国陶瓷·宜兴紫砂》、《紫砂春秋》、《宜兴紫砂珍赏》等以及香港罗桂祥的《宜兴紫砂器》、台湾唐人工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一系列"紫砂丛书"、美籍华人谢瑞华的《宜兴陶器》一书,还有法国学者万福来先生的《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等,其中许多出自专家教授之手。这些众多的书籍,形成一个贯通古今中外、反映宜兴陶文化发展的文献资料库。

4. 有独特的陶艺品类

在七千年的制陶史上,宜兴历朝历代不乏名品新作。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晚期,这个江南小镇正孕育着一场陶瓷产业的革命。由于当地没有优质的瓷土原料,宜兴陶人弃瓷而兴陶,历经几代艺人的毕智穷工,相继产生了两个"原料独特、工艺独绝"的新陶种:那就是起始于宋代,成熟于明清的"宜兴均陶"和"宜兴紫砂陶"。经过近数百年的发展传承,这两种陶器越发显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历史上它们为宜兴乃至中国争得过无数荣誉:1910年获大清褒奖、1915年获巴拿马国际赛会金奖、1932年获芝加哥国际赛会优秀奖,建国后又先后在全国陶瓷行评、伦敦国际赛会等大型赛会中屡获奖项。"宜兴均陶"、"宜兴紫砂"在中国陶瓷史上可以说是"名陶无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陶器工艺中的两颗明珠。

5. 有健全的科教机构

宜兴陶瓷产业发展到当今,不光有量的壮大,同时也有质的提升,这主要靠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的理论支撑。上世纪五十年代,宜兴就有了第一所陶瓷专业学校——陶都大学,后来改为江苏省轻工业陶瓷学校,前几年升格为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宜兴还有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丁蜀中等专业学校、宜兴市陶瓷实训基地、成人职业教育学校。另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大专院校,也都有紫砂专业课程。2014年,文化部还在北京恭王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紫砂艺术研究中心",宜兴也成立了陶瓷(紫砂)文化研究会,同时在宜兴陶瓷博物馆成立了宜兴陶瓷(紫砂)文化研究院。通过这些专业院所从不同层面对宜兴陶瓷、特别是宜兴紫砂的材质、造型、工艺、装饰等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努力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宜兴陶瓷工艺、陶瓷文化的理论基础,并为建立"中国紫砂学"打下良好基础。

6. 有深远的影响力

宜兴秦时称"阳羡",到晋时因周氏家族的崛起影响而改称"义兴",此时,宜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陶业也达到历史新高。当时宜兴青瓷工艺成熟,产品广受北方贵族亲睐。从后来周墓墩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就有许多精美陶瓷制品,其中有三件国家一级文物。到宋代,为避皇帝名号,"义兴"改称"宜兴"。当朝大文豪苏东坡多次来宜兴并留下不少遗迹,同时写下"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等诗句。到明代中晚期,宜兴均陶和紫砂壶成为非官窑作品而入宫的民窑作品。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都喜欢宜兴均陶和宜兴紫砂器,特别是乾隆帝更是痴迷,多次颁旨命造办处到宜兴定制紫砂器,同时在京城内加彩装饰。此时,荷兰人将宜兴陶器带入西方,欧洲人开始喜欢紫砂器,并称之为"东方红色瓷器"。目前看,现今所谓欧洲的紫砂器有三种来源:一是宜兴本土生产;二是广东沿海仿制出口;三是欧洲人在当地仿造。清光绪年间,紫砂匠师金士恒、吴阿根受日本人之邀,到常滑县传授紫砂技艺,改变了常滑县一直以

制造大型粗糙陶器的状况，这是宜兴壶艺传入日本的开始。1986年，常滑县还举办了“金士恒展”，举办者对金士恒的突出贡献作出了很高评价。清末民初，宜兴紫砂匠人王东石、何心舟受浙江文人聘请到宁波建“玉成窑”。期间与梅调鼎、胡公寿等文豪共同制作一批极具文人气息的紫砂作品，业内将其称为继陈曼生、瞿子冶之后的又一次文人壶高峰。民国期间，吴云根等多位紫砂艺人还受聘山西平定县，帮助当地开展紫砂陶业生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宜兴还先后派技艺人员赴山西临汾、陕西延安以及浙江长兴等地，指导帮助当地紫砂陶器的生产。这里特别要提到福建漳州，由于饮茶及当地民俗的习惯，漳州地区人们很爱宜兴紫砂壶，尤其对红色朱泥壶情有独钟。他们不仅买宜兴壶，另外还利用当地红土仿制宜兴朱泥壶。也许是地域关系，也许是思乡之情，台湾人历来喜欢紫砂壶，上世纪八十年代用小电炉烧紫砂器就是台湾人引进的。现在我们到台湾去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随处都能感受到这种紫砂情结。当代国际文化交流频繁，陶艺交流也是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宜兴派员赴阿曼苏丹国援建巴哈拉陶瓷厂生产日用陶器，受到当地的广泛赞誉。葛军这位当年从外地到宜兴学艺的莘莘学子，目前已经是一位资深陶艺家和一位活跃的国际陶艺学者。每年他都要组织一批国外陶艺家来宜创作交流，并创办了“国际陶艺博物馆”。连续四届举办“国际壶艺双年展”，这对加强宜兴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宜兴窑对外都有广泛影响，可以说是：根在宜兴、茎蔓各处、花开四季、果结全球。这也是尽快确立“宜兴窑系”重要性、必要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 确立“宜兴窑系”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陶都，陶醉中国，宜兴陶瓷门类众多，品种齐全，除了以紫砂为代表的艺术陶瓷外，还拥有工业特种陶、园林建筑陶、特色耐火器材和日用陶瓷等，展示了陶都宜兴的鲜活亮色和时代风流。

宜兴陶业经过前人的不断努力，现今正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目前有二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二个金字招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二个重要平台（中国紫砂博物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另外具有一支庞大的从业者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直接参与设计制作人员超过十多万人、有各类技术职称人员达一万多人、国家级大师二十多人)。目前有陶企400多家，年销售150余亿元。长期来，宜兴市政府将宜兴陶艺看作一项文化事业和富民产业，在许多方面给予扶持和引导，这使得宜兴陶业特别是紫砂艺术得以快速、健康发展。

宜兴经济发达、科教领先、文化繁荣。近年来各类大型学术论坛在这里举行，其中包括国际性的陶瓷研讨会。已先后举办“中国陶都——陶瓷产业发展论坛”、“宜兴骆驼墩文化论坛”、“宜兴青瓷文化研讨会”、“宜兴紫砂文化研讨会”、“宜兴窑古陶瓷研讨会”等。在2005年的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上，国际陶艺学会主席托尼·弗莱克斯在会上郑重宣布：宜兴是世界制壶中心。这些论坛的成功举办，已经让业界、学术界专家对宜兴窑有了一定的认识、认知。今后，我们还要举办更高层次、更加广泛、针对性更强的学术论坛，让更多的学者、专家来关注“宜兴窑”、研究“宜兴窑”、认同“宜兴窑”，从而为确立“宜兴窑系”创造良好的氛围条件。

确立“宜兴窑系”不仅仅是学术成果的问题，它对于宜兴乃至于江苏地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确立“宜兴窑系”，将会进一步加强宜兴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确立“宜兴窑系”，将会进一步促进宜兴陶瓷产业的发展；加强与外地区相关文化产业的协调与发展。

确立“宜兴窑系”，将会进一步挖掘宜兴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从而更好地助推宜兴紫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之，确立“宜兴窑系”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人的重要工作，也是彰显宜兴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举措。

做好该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值得我们为之而努力。

（作者系宜兴陶瓷博物馆、中国紫砂博物馆馆长）

（编辑：阎智海）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博物馆条例》

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9号国务院令，公布《博物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6章47条，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展示人类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博物馆设立、变更和终止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藏品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博物馆的教育、研究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非国有博物馆在设立条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税收优惠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还存在不一致等。

《条例》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规定，为促进我国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在博物馆的设立条件、提供社会服务、规范管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财税扶持政策等方面，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条例》为进一步规范博物馆的设立、变更、终止，明确了设立博物馆应当具备的条件，并对相关设立、变更、终止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条例》要求加强藏品尤其是文物藏品的保护和管理，针对藏品的取得、安全保护、使用管理等分别作出规定；对于属于文物或者古生物化石的藏品，还与有关文物保护、古生物化石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作了衔接。

《条例》为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水平，在保证开放时间、鼓励免费开放、规范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等方面作出要求；同时，为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教育、研究作用，规定博物馆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接受能力组织讲解，寒暑假期间增设适合学生特点的陈列展览项目，开展相关专业领域理论及应用研究，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

《条例》鼓励博物馆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

（消息来源：新华网）

博物馆文物普查工作之我见

朱轩林

2014年7月，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宜兴市博物馆就职，负责库房工作，正好迎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这项重大工作任务。能够参加此次普查活动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是个增加知识、提高业务能力水平的好机会。目前，宜兴市博物馆文物普查工作的完成情况为：共完成1132件文物信息的基本录入，其中有800件文物的详细信息已全部完善。现将工作中收获的一些关于博物馆文物普查工作的粗浅经验和遇到的一些问题分享、交流如下。

首先，我谈一下自己归纳的做好文普工作的几个要点：

一. 周全的前期准备

做好每项工作，前期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工作思路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文普工作尤其如此。

第一，要认真学习文普标准。例如藏品的编号要求、文件夹的命名规范、不同器物尺寸测量的不同要求等等。这些在文普培训课件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工作前勤学习，工作中勤对照，才能保证我们采集的信息是规范有效的，保证一步到位。

第二，要充分利用原始资料。我们很多文物收藏单位都有着相当数量的藏品，如果文普工作从零开始，要自己去库房把藏品一件件找出来，自己给它编号，定名再测量，工作量会非常巨大而杂乱，没有必要。因此要善于利用原始资料，比如我们博物馆，之前有做好的入馆凭证，里面有器物的名字、大致尺寸、捐赠人等基本信息，就可以以此为模板，查漏补缺，提高效率。

第三，要合理摆放库房文物。库房文物的合理摆放可以大大提高信息采集的效率，我们博物馆在文普工作开始之前对库房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把藏品按年代，分类摆放在不同的展柜上，这样在工作时，只需要对着这件器物的原始名称，比如“清青花佛手纹折沿碗”，结合年代——清代、器类——青花、纹饰——佛手纹、造型——折沿碗这些要素，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这件器物。

第四，要适当购买文普器材。既然要把文普工作一次性做好，那文普器材的购买是非常必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的，要补”，比如信息采集中有一项是器物重量的测量，这个凭估计是不可能准确的，因此测重仪的购买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不够专业的，要换”，这一点呢，会着重体现在文物摄影上，虽然大多单位都有照相机，但与之配套的相对专业的摄影设备是相对缺乏的，我们馆针对文普工作购买的照相设备有下面几项：静物台、柔光箱、三基色摄影灯、三角架和渐变色的背景布。几件东西我在淘宝上买得，都非常便宜，但不单可以提高文物照片的立体感和清晰度，还加快了摄影速度，因为有了静物台和三脚架后，高度和稳度就固定了，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宜兴市博物馆馆长邢娟对我文普工作的信任和支持，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器材购买物质方面，都十分感谢。

二. 妥善的采集流程

信息采集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而且繁杂的过程，它的工作特性，决定了它在较短的时间内，不是一个人仅靠蛮干就能干成的，必须依靠精细的分工和合理的流程，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第一,分工方面,建议是三个人:第一个人负责文物工作,主要是找到文物、文物搬运、文物摄影、文物归还四个方面;第二个人负责测量工作,主要是标签制作、重量测量、尺寸测量三个方面;第三个人负责记录工作,主要是注意好测量顺序并把信息登录表格两个方面。

第二,流程方面,我的主要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按照展柜顺序,依次提取文物;第二步,在表格雏形上找到对应的文物,并将此行标记为蓝色,表示它正在被测量记录,便于查找;第三步,对应表格中新设的总登记号制作标签并贴上器物;第四步,在笔记本上记录好这件器物的编号和日期,这样可以为后期照片整理提供顺序依据;第五步,对该件器物依次进行拍照、测重和量尺寸,并登记到表格上。第六步,把当初标记为蓝色的那行改为粉色,以示完成。

就此方面,我要感谢同事们的积极协助,他们工作细心,为我们馆的文普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精细的后期整理

后期工作,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三点:第一,信息、照片的整理,这些在采集过程中已经做好,因此注意点是——不能乱;第二,文件、文件夹的定名,我们知道这两者的定名直接关系着后期的上传,因此注意点是——不能错;第三,资料的备份,文普信息相当重要,量又很大,因此注意点是——不能少。

以上是我的具体工作情况,除此之外,我在文普工作中还有一些思考和问题。

第一,文物的修复工作,例如铜器的锈蚀,书画的虫蛀、受潮等情况,不仅会影响单件器物的保存,更会传染给其他器物,因此修复工作相当重要而且往往迫在眉睫。目前我们馆文物的修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第二,文物的存放问题,很多县级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除了一小批规格较高的器物有囊匣包裹外,其他很多裸露在空气里,这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保存问题,器物会受潮霉变;一个是安全问题,库架略显紧凑,我十分担心万一哪天搬运过程中碰到蹭到,导致文物的摔毁;最后一个是印象问题,如果立志做一线博物馆,库房文物是业内门面,囊匣的包装保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文物的丰富问题,以宜兴市博物馆为例,我馆十月份开馆,作为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规模的博物馆,就现在库房藏品的数量来看,还是略显不足的,特别是通史馆。何为通?就是要贯穿,要系统,有脉络,有传承,比如一件器物,通史馆的目的就在于展示它的起源到兴盛到慢慢衰落的整个发展过程,但现在我们库藏文物里,缺少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非常具有针对性,因此大海捞针式的民间捐赠,可能具有长远效益,但就目前开馆在即的现实情况来看,无法起到及时雨的效果。

提出以上三个问题,我十分惶恐,但真心希望可以得到领导们和业内同仁们的体谅与重视。

最后,我觉得文普工作不应止于文普工作,应该把它当做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接触文物的契机,端正态度并勤加思考,最后形成相关的学术论文与大家分享交流,实现文物普查的价值。

以上就是我对于文物普查工作的一些思考,希望对奋斗在文普工作一线的朋友有些许帮助。

(作者单位:宜兴市博物馆)

(编辑:何桦)

浅谈新形势下博物馆的宣传推广工作

——以南通城市博物馆为例

汤　建

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最有效的宣传推广,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增强博物馆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极其重要。笔者以南通城市博物馆为例(以下简称城博馆),就博物馆的宣传推广工作谈一些个人的管窥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博物馆宣传推广的必要性

1. 大众多元文化消费的需要。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现代社会,大众总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休闲方式。网络电视、时尚影院、游乐场所、主题公园、音乐歌城、购物中心……是大众主要选择的一些娱乐休闲方式，在全国很多中小城市，大众对博物馆的知晓率远远低于上述地方。在多元文化消费的形势下,博物馆必须通过加强宣传推广,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寻求社会的大力支持，博物馆也应当成为大众参观学习、文化娱乐的重要休闲场所。

2. 文博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达到3589个，平均每40万人就拥有一个博物馆,并且还在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全国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4亿人次，在博物馆发展数量与日俱增、参观人数不断刷新历史的新形势下,如何以宣传推广为重要立足点，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博物馆宣传推广工作的主要方式

1. 展览与设计宣传。就展览宣传而言,自开馆以来，城博馆先后举行了南通城市规划精品选、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南通市瓦当文化艺术展等主题展览活动。各类丰富多彩展览的成功举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就设计宣传而言,城博馆设计印制宣传品,向社会广泛散发。先后印制中英文简介册、中英文宣传折页、手提拎袋、无纺布袋、画册、一次性纸杯、便签纸及信封、新年台历等各式精美的宣传品，向来馆的观众及社会各界免费散发。此外,城博馆在南大街环城南路沿线,设置了八个户外灯箱广告，通过流动字幕与固定画面的设计整合,即时发布城博馆相关展览信息,构成了濠河风景区周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 网络与媒体宣传。城博馆官方网站(http://www.ntcm.gov.cn)于2006年正式建成,并设置专管员进行网站信息的录入与更新，实现动态信息即时发布，通过网络让南通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走进千家万户。网站建成至今,点击率达34万余人次。城博馆与南通主流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除充分利用《南通日报》、《江海晚报》等平台,即时发布城博馆的最新资讯和相关经验成果外，还邀请南通电视台制作城博馆五分钟、十分钟两个版本的宣传片,并与南通电视台二套合作，在弘扬江海地方文化的省十大名牌《江风海韵》栏目中播放同名专题片。在城市宣传片《多美的南通,多好的家》的拍摄上也溶入了城博馆元素,古朴时尚的建筑、紫竹婆娑的生态绿地、下沉式滨水景观广场,秀美的景色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3. 品牌与流动宣传。城博馆创新打造了“江海宏图——南通规划讲堂”这一宣传品牌,每季度在水天讲堂向社会开放。规划讲堂及时宣传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及百姓关注的最新规划成果,着力关注生态文明,关注重大项目及重点工程、历史文化保护、城市交通畅通等方面内容。讲堂的成功开设,在城市规划者与普通公

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让规划更加公开、透明，让规划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更强。大多数博物馆重“参观”，而轻“推广”，馆外的宣传推广活动开展得往往不够。其实博物馆对观众的服务，不仅仅在于博物馆的基本展览和内容讲解，还应走出去，走进人们的生活。开馆以来，由市规划局主办、城博馆承办的“规划进社区”特色活动每年如期举行。城博馆利用精美的图片、详尽的图版说明，以流动博物馆的形式让更多的市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体验生动的“文化之旅”，使他们得以更真切地了解南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内涵，增强自豪感和建设家园的热情，极大地丰富了南通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4. 讲解与服务宣传。讲解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博物馆宣传推广工作效果的优劣。讲解员每天都与观众直接接触，既向观众讲述、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又在为观众提供全方的导览服务，起着连接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博物馆应建立一支形象好、能力强的讲解队伍，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优质讲解服务，让大多数的观众有所收获。2012年11月，在南通市文广新局主办、南通市文博协会承办的第二届“张謇杯·文博南通”讲解职业技能大赛上，城博馆的两名参赛选手分获专业组三等奖和优秀奖，同时城博馆也获得了大赛的优秀组织奖。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被文化部和财政部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示范项目。2012年8月，“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馆群论坛在城博馆隆重举行，主题为“博物馆教育与公众文化服务”，城博馆的三篇论文分别在论坛上交流并获得奖项。干部员工们积极宣传企业文化，主动参与博物馆的宣传工作，成为城博馆宣传工作的又一大亮点。

三. 对博物馆宣传推广工作的几点设想

1. 建立联合网站。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的良好平台，市内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等联合创建“环濠河博物馆群”公共网站，主要介绍每个馆的基本情况、参观服务、藏品一览、新闻快讯、活动播报等内容，以消除各馆之间无形的“围墙”，将各馆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实现一站式参观体验，最终实现扩大宣传的目的。

2. 聘请形象大使。聘请形象大使实质上是一种名人广告效应，它通过名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达到宣传、促销产品的目的。近期，湖南省博物馆聘请著名主持人汪涵先生担任该馆的形象大使。作为博物馆业界的有益尝试，此举必将拓展博物馆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为博物馆的宣传推广提供全新的视觉与思路。

3. 设置“机场博物馆”。近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专门打造了一个名为“博物馆空间”的展示场所，向所有旅客免费开放，揭幕展展出了由罗丹博物馆带来的50件大师原作。先前，我国首都国际机场联合文化部、故宫等单位在航站楼也举办了“文化国门”大型展览活动。如今，世界上已有不少的国家在机场设置展览空间，展出博物馆的藏品、艺术品等。繁忙的机场，已经逐渐成为博物馆文化艺术的分享体验之地，甚至是一个国家教育国民、对外传播先进文化的最佳场所。

总之，新形势下，全面遵循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强化宣传推广意识，引入宣传推广方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既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支持和参与，又能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职能和价值，真正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作者单位：南通城市博物馆）

（编辑：阎智海、何桦）

停云馆帖考（十六）

周道振

元名人书卷第八(寸大古隶)

元赵文敏公书(古隶)

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汩汩」俗尘中(中略)**所乏冀为道谢」**(行草书十八行)

每蒙尊者帖,淡黄纸本,行草书共十九行。前有文衡山钤缝二印，下押白文“文彭之印”。《墨缘汇观录》卷二《与中峰十一帖附管夫人与中峰一帖册》

按:赵文敏书第一石《每蒙尊者帖》及后《自山上来帖》前五行至“止存”止,《明拓本》全。《冯本》已重摹,《孙本》此石亦全。

弟子赵孟頫和南拜覆」中峰和上老师侍者近数有人自山」上来(中略)**珍重珍重不备弟子赵孟頫和南和南」**(行草书十四行)

自山上来帖,白纸本,行书十八行。前有文衡山二印。纸边下角有“文寿承氏”朱文半印。末角有“文寿承氏”朱文半印。《墨缘汇观》卷二

弟子赵孟頫和南上记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得」旨南还何(中略)**弟子赵孟頫和南上记」**(行书十六行)(有“黄琳美之”方印)

得旨南还帖,白纸本,行草书二十行。前有文衡山二印,末角有文彭白文半印。《墨缘汇观》

按:第二石刻《自山上来帖》第六行“三门”起。又《得旨南还帖》及《如在醉梦帖》第五行“平生”止,《明拓本》石全,后归冯氏。《冯本》十《目山上来帖》第十行“聒方”行中裂为两石。此行仅存三四半字。石归孙氏,于《孙本》仅见《自山上来帖》第六“三门”起四行,后缺。又《得旨南还帖》及《如在醉梦帖》前五行止。日本印本于《自山上来帖》第七行“信”字及《如在醉梦帖》第一行“子”字已泐,此在《冯本》尚完好。

弟子赵孟頫和南拜覆」中峰和上师父侍者孟頫自老妻之亡」(中略) **六月廿八日弟子赵孟頫和南拜覆」**(行书十八行)

如在醉梦贴,白纸本,行草书二十二行。前有文衡山二印,纸边下角半钤“文彭之印”白文印,末有“三桥”白文半印。《墨缘汇观》卷二

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大和上老师侍者昨以中还」山(中略)**余唯尽珍重不理不宣孟頫再拜」**(行书十二行)

以中还山帖,白纸本,行草书,二十行。前有文衡山二印,纸边下角钤白文“居士”半印,末有“文寿承氏”朱文印。《墨缘汇观》

按:第三石刻《如在醉梦帖》第六行“得老妻”起至《以中还山帖》,《明拓本》全。石归冯氏。《冯本》于《如在醉梦帖》末下斜上向《以中还山帖》第二行“中峰”二字间断裂为两石。《孙本》此石缺。

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以中来得」两书(中略)**併乞」清照弟子赵孟頫和**

南再拜」(行书二十行)(有“休伯”方印)

如对顶相帖,白纸本,行草书二十六行。前有文衡山二印,末下押白文“文彭之印”。《墨缘汇观》卷二

孟頫和南上覆」 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纷纷尘事」中(中略)**四月廿六日弟子赵孟頫和南和南」**(行书十四行)

纷纷尘事帖,淡黄纸本,行草书十七行。前有文衡山二印。纸边下角有半钤白文 “文彭之印”,末有“文寿承氏”半钤朱文印。《墨缘汇观》卷二

按:第四石刻《如对顶相帖》及《纷纷尘事帖》第十行“德岂”止。(第十一行“有已哉”起共四行刻在末《致逸民帖》后。)《明拓本》石全。《冯本》另重摹。归孙氏,《孙本》帖全。今嘉兴博物馆存《如对顶相帖》末四行、《纷纷尘事帖》十行残石一块。

孟頫和南拜覆」 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千江入城」得诲帖(中略)**弟子赵孟頫和南拜覆」**(行书二十行)

千江入城帖,白纸本,行草书二十二行。前有“衡山”朱文印、白文“文彭之印”。纸边半钤“承氏”朱文印,末下押白文“文徵明印”末角有白文“文彭之印”。《墨缘汇观》

承旨先兄与天目中峰和上手帖并魏国夫人书,计十二纸。其弟子装池袭藏,宝护以传久远,观者无不赞叹。天历三年二月廿四日, 赵孟吁题。《大观录》卷八《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

翰林承旨松雪赵公,文章诗法妙天下,然世独称其善书,何也?(下略)甲午秋八月二十二日,松泉比丘幻孙永宁拜题。《又》

右赵承旨手牍十一纸魏国夫人一纸, 皆与天目幻住公者。(中略)摩挲移日,不独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吴门祝允明跋。《又》

赵魏公书散满天下,亦时时获觏。(中略)弘治癸亥十月,在锦衣君清淮堂书。前进士吴郡杨循吉。《又》

文氏《停云馆帖》,从此卷真迹摹出,乃文敏最得意书。自右军、大令后,直接宗派,非唐人所及也。董其昌观因题。庚午夏五月望前二日。《又》

余家所刻《停云馆帖》中松雪手札一十三纸与中峰者,言言皆有道味。《珊瑚网书录》卷八文嘉跋《赵文敏书勉学赋》)

元笺,本色纸不一。每幅高一尺,阔一尺八九寸,无一纸糜损。长篇大札,指顶大行押,俱润泽得褚河南神韵, 使人览而目爽。末附魏国手牍,尤是难得。鉴赏诸跋及衡山、寿承、墨林、美之等印,前后精奕,可观也。《大观录》卷八《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

按:第五石刻《千江入城帖》及《致吉甫帖》六行“提点欲”止。《明拓本》于石首下缺一角,第二行“江”“城”两字右半略泐。石后归冯氏。《孙本》此石缺。

孟頫再拜」吉甫教授提举年兄(中略)**孟頫再拜」六月廿五日传语令司马」**(行书十一行)

服食而在人间(中略)右王(以上两字原右半泐) **逸少书子昂力疾临」**(草书十三行。款行书)(有“赵氏子昂”“松雪斋图书印”二印)

临洛神赋十三行(释文略。小楷共十三行)

按:第六石刻《致吉甫帖》第七行“求吾兄”起及《临服食帖》、《临十三行》两帖。《明拓本》石完整。石归冯氏。《冯本》于《临服食帖》第十一二行间断裂为两石。《孙本》同。今散失。

千字文(释文略)(上有“赵”字印,下角有

“大雅”印)

大德九年八月廿九日书子昂（以上共小楷三十八行)(有“赵氏子昂”印)

赵孟頫书宗二王,而于大令尤近。小楷《千文》,《停云馆》刻。《书诀》

常清静经」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中略)**常清静经大德八年正月廿二日吴兴赵孟頫书**（小楷共廿二行)(有“赵氏子昂”方印)

按:第七石刻小楷《千字文》及《常清静经》,《明拓本》末于《常清静经》六行已重刻。石归冯氏。至《孙本》仅存《千字文》。今皆散失。

孟頫顿首」晋之足下（下略)(行草书十三行)

按:第八石刻《致晋之帖》及《致叔和帖》至第十九行“来意”止。《明拓本》石全。石归冯氏。《冯本》、《致叔和》第三至第五行间斜断为二石。《孙本》同。今散失。

孟頫顿首再拜」叔和老兄执事(中略)**四月晦日赵孟頫顿首再拜」辄有丝紬一匹附便拜」纳聊表微意冀笑纳孟頫」**(行草书二十八行)

天台杨氏之先,仕杭,宋甚显。至叔和犹宋之民也。赵文敏公在当时以诸王孙避兵其地,馆而庇之,其义士也已。自宋亡,而杨氏亦晦。既百年再显于国初者数人,而不幸概以法免。盖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进士为良法吏,而杨氏复振。天之报叔和者,其终不爽如此。此则文敏公与叔和手帖,而商霖检诸故书而得之者。予读之,窃叹宋之屡迫于虏,宗室四散,仓皇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孙之云。犹幸有叔和者，而隆准之属,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于泣路岐而窜荆棘也乎。此叔和之义,所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犹欲荣以一官,可谓知报德者,他固不暇论也。《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二《跋赵文敏公手帖》

孟頫顿首再拜」逸民山长尊亲家坐前（中略)**孟頫顿首再拜」**(以上行草书共十一行)

按:第九石刻《致叔和帖》第廿行“写纳”起及《致逸民帖》,末附《纷纷尘事帖》末四行。《明拓本》全。《冯本》和《孙本》均全。今散失。

赵彦徵书(古隶)

昨承枉顾重辱」佳章(诗五古,略)

按: 第十石刻赵彦徵书,《明拓本》、《冯本》、《孙本》石均全。今散失。

第八卷为吴兴赵文敏书。行草尺牍若干首,遒媚清丽,妙有晋人风度。小楷书《清静经》、《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极,妙逼《黄庭》、《洛神》,唯凡骨未尽换耳。昔人谓之仪凤冲霄，祥云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敌。真知言哉。《弇州山人四部稿·停云馆帖十跋》

第八卷俱赵文敏书。文敏素工尺牍,此与中峰和尚诸札,圆熟多媚姿。然骨力恨少,未为上乘。小楷亦只是文敏本色,去《黄庭》、《洛神》尚远。司寇遽引仪凤、祥云,五百年、一万里语赞之,似过。《书画跋跋·文氏停云馆帖十卷》

第八卷俱为赵文敏书。此公圆熟之极,然细阅不脱俗气,面目眉宇,觉脂韦而不峻嶒。且此卷与中峰和尚书,十居八九往往称:弟子孟頫和南再拜。内所称说,亦多说法,通人之感如此。后有楷书《洛神赋》、《千字文》、《常清静经》,俱圆熟流利。又有临右军帖亦佳,然不脱本来面目。又赵彦徵一纸。此公名麟,不甚著。字颇似子昂。诗多长语,无可取。《岱宗藏稿》卷五《停云馆帖跋》

《停云馆》中赵松雪与中峰和尚、吉甫、晋之、叔和、逸民等书,皆晚年笔。结构紧敛,筋脉蟠际,是彼自矜脱化之修。然多习气,且不无油处,学者不可不知所慎重也。临右军帖十数行,笔意弱滞,不逮原本。《承晋斋积闻录·古今法帖论》

元名人书卷第九(寸大古隶)

元邓文肃公书(古隶)

文原顿首再拜」伯长学士尊眷兄足下(下略)(行书十三行)

文原顿首再拜」简斋先生相公閤下(下略)(行书九行)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故称巴西。宋末徙居钱唐,试浙西,魁四州。仕元至正间,辟为杭州儒学正。历官翰林侍读学士,谥文肃。故以书名。文氏停云馆尝摹勒其两帖入石。一与简斋学士,一与伯长学士,即此帖也。其为名流所宝重如此。独帖末"三月十四日"五小字,又"小儿附谢起居,舜元会次致意"行书十二字,《停云帖》未及摹勒耳。《西园题跋·元人七贤墨妙卷》

《停云馆》邓文原书,酷学松雪。文原、松雪同时人,而宗之乃如此。《承晋斋积闻录·古今法帖论》

按: 第一石邓文肃两贴与后鲜于太常书前六行至"支持"止合一石。《明拓本》石完整。第五行"于令"、第十一行"俱"字、第十二行"作"字皆略泐。石归冯氏,《冯本》于第五行"雅"、"嗣矣"又泐。《孙本》邓书石全。今散失。

元鲜于太常书(古隶)

枢顿首奉记」澄虚真人函丈」新妇不时发热(下略)(草书八行)(有"鲜于"、"困学斋"两印)

按:鲜于太常书前六行刻在邓帖后,后二行"十首"起在第二石鲜于必仁书前。《明拓本》石全。第三行"新"字原泐。《冯本》于首行下有裂痕。石归孙氏时,此帖全缺。

元鲜于必仁书(古隶)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中略)**李白所作鲜于必仁」书于金华之寓」时丙午秋中八日也」**(行草书十三行)

按: 第二石鲜于必仁书前有鲜于太常书二行,后有胡石塘书四行至"策上"止。《明拓本》石完整。石后归无锡。《沈本》补刻鲜于太常书前六行及隶书标题。必仁此书仅存六行,余缺。第六行首"取乐不求"四字已残缺。冯氏补刻一石,《孙本》缺。

元胡石塘书(古隶)

长孺顿首昨者薄暮」见过(下略)(行书十二行)

按: 第三石胡石塘书前四行在鲜于必仁书后。第五行"九关"起在第三石,后刻虞文靖书。《明拓本》帖石全。石归冯氏。《冯本》于第九行"义贵勇"三字起向左斜裂,破为三石。第十、十一两行字残。《孙本》此帖缺。

元虞文靖公书(古隶)

集顿首」昭文相公阁下集之西游(下略)(行书十三行)

按:虞文靖书在胡石塘书后。《明拓本》石完整。后归冯氏。缺右下角。《孙本》同。今散失。

元揭文安公书(古隶)

凡为进士有谒于余者(中略)**元统二年六月廿五」日揭傒斯叙」**(小楷三十二行)(有"揭印傒斯"方印)

按:第四石揭文安书与揭伯防书合刻一石。《明拓本》石全。石后归无锡窦氏。《沈本》于十七行“不仁之威”起断裂成二石。十六行字大半残损。十七、十八两行下半字亦损泐。今石存。冯氏重刻一石。《冯本》于前十六行又再刻。《孙本》同。今散失。

元揭伯防书(古隶)

印章之来尚矣(中略)**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豫章」揭汯书」**(小楷十一行)(有“揭氏伯防”方印)

按:揭伯防书与揭文安书合刻一石。《明拓本》石全。石归无锡窦氏,今存马山。《冯本》重刻,后归孙氏。今散失。

元康里承旨书(古隶)

康里巎再拜」彦中判州贤友执事」近得书(中略)(行草书廿一行)

前日恭谒值」车从往拱卫司写碑」不果见而环么菇」五味各一觔辄令」致上视入为佳一」二日间当走前也」不宣巎顿首再拜」承旨相公閤下六日」(行草书八行)

《停云》康里巎书,偏侧取势,原本于柳。文衡山书体格类此。疑衡山家有里巎真迹,而酷学之也。《承晋斋积闻录·古今法帖论》

按:第五石刻康里承旨致彦中帖及致承旨两帖。第二帖第三行“不果”起刻后石。第五石后归冯氏,继归孙氏。《明拓本》、《冯本》、《孙本》均完整。第六石第三行起与周景远、袁清容书合刻一石,后归无锡赵氏,补刻前三行。冯氏重刻,今散失。

元周景远书(古隶)

驰顿首再拜」治中相公老兄阁下夏间别」后转眄黄花秋晚岂胜怀」仰之情即辰伏想郡斋闲」暇侍太夫人荣养纳福何」乐如之兹因端悫去辄附承」动静比及会晤惟」若时厚自爱不宣驰再拜」(行书八行)

按:第六石周景远书,前有康里承旨第二帖六行,后有袁清容书。《明拓本》石完整。石后归无锡窦氏,今存马山。《沈本》此帖全。冯氏重刻。《孙本》此帖缺。

元袁清容书(古隶)

桷顿首再拜」昭文相公钧坐桷久缺承」诲虽屡候」门墙侦伺弗谨终慊然也」伏蒙钧翰重有」名茶之颁深感」记存尚当亲诣」马首以叙别怀草草伏干」钧亮桷顿首再拜」(行书九行)

伯长学士,即袁文清公,名桷 ,自号为清容居士,伯长其字。以文章名世,朝廷制册,勋旧碑铭皆出其手。余往往见其手书,亦精心八法者。停云馆亦镌其与昭文相公书。《西园题跋·题元人七贤墨妙卷》

按:袁清容书《明拓本》全。全石归无锡赵氏。后此帖残失。冯氏重刻。《孙本》缺。

(编辑:盛诗澜、徐驰)

香珠雅趣

高振威

香集天地灵气,既可祭祀先祖、供奉圣人,又可怡情养性、启迪才思,还是驱邪避秽、安神宁心的良药。自古,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无论文人墨客,还是僧道之人,都以香为伴,且推崇有加。

从宋代开始,桂花、玫瑰、蔷薇等天然花卉制成的香珠、佩坠等饰品一直倍受欢迎。花朵化身成珠子、吊坠乃至工艺品,依然散发着各自的芬芳,成为朴素却美妙的香源,芳香了生活。

将花朵做成念珠,仿佛仙幻小说里缥缈奇幻的情节,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念珠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还曾经是极平常的物品。

宋人陈敬所撰的《陈氏香谱》中记载"木犀香珠"的制法,宋人称桂花为"木犀",所以"木犀香珠"就是以桂花制成的芳香圆珠。先选一棵桂蕊初吐、尚未全然绽放的桂树,趁着清晨花上露水未干之时,在树下铺好干净的布幔,让人登上梯子,用长竿等工具把带着露水的半开桂花打落。之后是最繁复的一道工序,将无数桂花去蒂,并对花朵加以精选,利用石磨将这些桂花碾成花浆,再将花浆裹在纱布中去尽水分。随后在研钵中将花泥进一步捣碾,使其匀细。最后,将这些精细加工的花泥制成一颗颗均匀的小球,并刺出细孔,再经过3道细致的晾晒与风干程序,才能得到成品。据说,以这种方式制成的桂花香珠,可以数年香气不灭,在今人看来,单纯以桂花制成的念珠颇有几分奇幻色彩,然而在南宋时,它不过是市井中司空见惯的寻常用物。《梦粱录》中就有明确记载:每年夏秋,在临安的夜市上,"木犀数珠"总是流动小贩随时提供的热卖物品之一。

而元人所著的《墨娥小录》更有"合木犀香珠、器物"一条,可见桂花不仅可以做成念珠,还可以制成其他物品,与宋代制法略有不同。书中所介绍的工艺是将桂花碾碎,晾干,依照一定的比例与大黄、黄檀香以及白墡土一同捣碾成细粉并拌匀,再以水调和成泥。所谓白墡土就是天然的细质白土,加入这种成分大概是为了增强花泥的可塑性以及晾干后的硬度,以便制出造型更复杂的"器物"。可以推测,其中一些形态复杂的作品就像制作月饼一般利用木模与陶模等模具塑形,再以手工雕刻精细加工。因此,桂花泥制成的"器物"除了佩坠、扇坠等小饰品外,可能还包括小巧的摆设品,甚至还会做成碗、碟、托盘、案头袖珍屏风等。

桂花制成的念珠饰件一直备受人们喜爱,直到清代著名文人厉鹗还曾以"赋木犀香数珠"为题,咏成一首《木兰花慢》。《在园杂志》中也有记载:康熙年间,糅合桂花与香料制成的扇坠非常流行,这种扇坠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轻巧实用。

此外,《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以玫瑰花制造香念珠的方法:将大约1千克的鲜玫瑰花榨尽花汁,捣烂成泥,兑入大约60克研磨成细粉的沉

香、2.5克金颜香、2.5克龙脑，每75克湿花泥可以制成20颗香珠。清人顾瑶光的《虎丘竹枝词》则写道：暮春时节，姑苏农家会把芳香浓郁的野蔷薇花捣打成泥，然后塑成佩坠，并在佩坠上雕刻出鸳鸯等造型，供人们垂挂在衣内，香透衣襟。可见，在古代各种芬芳的鲜花都曾化身为香珠、饰品、小器物，玲珑讨喜，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几分趣致。

沉水香，香木所结树脂放入水中则下沉，故而成为沉水，又名水沉。放入水中半浮半沉的是栈香，不沉的则是黄熟香。《南越志》上说交州（越南北部、中部和中国广西部分地区）的人称之为蜜香。说的是它的香气，如同蜜蜂所营造的蜂房一样，梵书又称之为阿迦卢香。

这种香分为三等，分别是沉香、栈香和黄熟香。沉香放到水中就会下沉，可分为四个品类：叫熟结的是树木死后由留下的树脂慢慢凝结而成的香；叫生结的是刀斧斫砍后伤口渗出的树脂所结的香，叫脱落的是枯干朽落之后又结出的香，叫虫漏的是由于树虫、细菌等对树木的蛀蚀而形成的香。生结是香中的上品，熟脱略欠一等。质地坚硬且呈黑色的香为上品，黄色的香略欠一等。角沉是黑色的，质地湿润；黄沉是黑色的，质地温润；蜡沉比较柔韧；革沉纹理纵横。

沉香既不是直接取自一种木材，也不是直接取自一种树脂，而是某些香树在特殊环境下经过千百年“结”出来的，混合了树脂、树胶、挥发油、木质等多种成分。瑞香料沉香属的几种树木，如马来沉香树、莞香树、印度沉香树等都可形成沉香。通常，天然香树要有十年或数十年树龄才会有较发达的树脂腺，形成“香结”。之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形成沉香木。

多数沉香在常态下几乎闻不到香味，而熏烧时却香气浓郁，留香时间也甚长。因沉香树品种、产地、气候、水质及土壤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香味。产于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新洲香，质量上乘，燃之香味清幽，并能持久，产于越南的会安香，质量稍次，略带甜味，但不能持久；同为越南所产的奇楠为沉香中的上品，即使在常态下也会散发出清凉香甜的气息。

沉香成品应在阴凉干燥处密封储藏，忌高温潮湿。沉香不惧水，但不能用碱性洗涤用品清洗，否则沉香表面的沉香油会因化学反应而被清洗掉。佩戴在身上的沉香饰品，有些因形成包浆而使香味变淡。因此，晚上睡觉时可将置于枕下或用塑料袋密封一段时间，即可恢复原有香味。

沉香作为宗教用香熏香料之用，多为人们熟识。除此之外其药用价值和实物原料之功用也不可小觑。中药沉香的历史悠久，自古就是治疗畏寒、腹胀、气喘、肾虚的良药，此外还是古代中药的镇静剂。现今人们对沉香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根据其香味特点和药用价值制作出各种保健品、日用品，如空气清新剂、佛珠、家具等。

念珠本是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饰品，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念珠被逐步开发出世俗的审美功能，衍生出一个全新的类型——香珠。佩戴香珠制成的手串或念珠固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象征，表示自己时刻虔诚，不忘佛祖。同时，这种散发着隐约芬芳的珠串犹如香囊与香水，使佩戴者生成一种无形却时刻相随的芳韵气场。其中，用桂花与玫瑰等花朵制成的香珠甚是精妙，低调、平淡、不尚奢华，却将大自然的美好气息，悄然摇曳在腕上襟边……

（作者单位：江阴博物馆）

（编辑：阎智海）

无锡博物院藏四神博局镜铭文初探

任宝龙

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汉镜类型众多,工艺精湛,铭文深邃。至新莽以降,四神博局镜广为盛行,其铭文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习尚观念等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无锡博物院所藏一面东汉四神博局镜(图一)为圆形、圆钮、蝙蝠形柿蒂纹钮座,双线方格内为十二乳丁,间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方格四边中点各出一"T"形纹饰,两边各一乳,与"T"相对的外圈有"L"形纹饰,与方格四角相对的外圈还有"V"形纹饰。镜面整体布局为四方八极,分别配置:玄武与鹿、相背双青龙、朱雀配羽人、白虎配独角羊。边缘纹饰为三角锯齿纹与钩连云藻纹。

外区圈带共计三十八字铭文。汉代铜镜铭文减字和文字简化、减笔的现象较为严重,此镜铭文属此类情况,故个别铭文不易辨别。现释读为:"宜昭是,明镜知人请,左龙右虎得天□(菁),(朱雀)玄武法列星,八子十二(孙)居安宁,常宜子孙,□长富昌,乐未央"三十八字。现将铭文注释如下:

"宜昭是,明镜知人请"为夸赞铜镜的吉祥语,较为少见。意为适宜照照此面镜子,明亮的铜镜会感应人的情感。"昭"通"照",为镜铭中常见字,多见于昭明镜。"是"为代词,指这。"请"通"情",当为情感之意,马王堆帛书四《经法》记"不匿其请",[①]可见通"情"。

图一 东汉四神博局镜

"左龙右虎得天□(菁),(朱雀)玄武法列星"较为罕见,释为左青龙右白虎获取天地万物之精华,南朱雀北玄武效法天象星宿之序列。此铭文不同于其他博局镜中常见"左龙右虎辟不羊"、"左龙右虎主四彭"、"朱雀玄武顺阴阳"等,相似铭文现仅见于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收录照貌镜镜铭"左龙右虎□天菁,朱雀玄武法列星"[②]。"菁",本意为韭菜花,又形容花叶繁盛,《尔雅·释草》以菁、华互训。菁和华,本来都指花,菁华,现多作精华。"法",效法、模仿之意,《周易·系辞上》载:"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③]。汉镜铭文中经常出现"法象"一词,如"法象天地",《墨子·辞过第六》亦载:"为宫室若此,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②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四》,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630页。
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图二　四神博局镜十二地支铭文

故左右皆法象之”[①],“法”在此应为“法象”之简略。“列星”，即恒星,《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记:“恒星者何,列星也”[②],此代指上天之宇宙星宿。在谶纬思想盛行的两汉时期,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早已与汉代人的天象宇宙观相联系，分别是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四大星区的物化形态,并同十二地支结合,形成较为完善的天文体系。彼时已经“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③],《礼记·曲礼上》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汉郑玄注:“以此四兽为军阵,象天也”[④]。汉代人相信“在日常用品和衣服上描画祥瑞的图像可以引出真的祥瑞”[⑤],所以他们的“得天菁”、“法列星”之举,是顺应当时“上垂天象”、迎合天意,期冀长生不老、天降祥瑞的思想反映。

“八子十二(孙)居安宁,长宜子孙”,指此镜利于后代多子多孙，安居乐业。汉代以子孙满堂、多子多孙为福,铭文反映了时人祈求后世多子多福、繁昌平安、福泽荫及子孙的家庭观念。与此相类似的镜铭有 “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八子十二孙治中央”,“子孙备具居中央”、“八子九孙治中央、“八子九孙居高堂”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八子十二(孙)”正好与内外区八枚大乳丁、十二枚小乳丁数量相符,故有学者提出将“乳丁纹”改称为“子孙纹”的观点,并称此类博局镜为“八子博局镜”[⑥],这是值得肯定的。

“□长富昌,乐未央”,犹言永远富足昌盛,欢乐不尽,反映了汉代人追求大富大贵、欢快永世的美好愿望。此为汉镜常见吉语,又如“日富昌,乐未央”、“长乐未央,极乐富昌”、“长保二亲乐富昌”、“大富昌,乐未央”等镜铭。

该博局镜镜铭(图二)字体精美、内容罕见,不仅反映汉代人日常意识中的宇宙天象观与不死幻想，还反映了两汉时期一般家庭观念和伦理道德，同时亦展现出时人崇富尚贵的价值取向，为全面研究汉代社会思想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文字材料。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编辑：何桦)

①李小龙译注:《墨子》,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6 页。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 页。

③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556 页。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 页。

⑤(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51 页。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铜镜》,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0 页。

旧方书屋墨犹香

——秦古柳先生和他的书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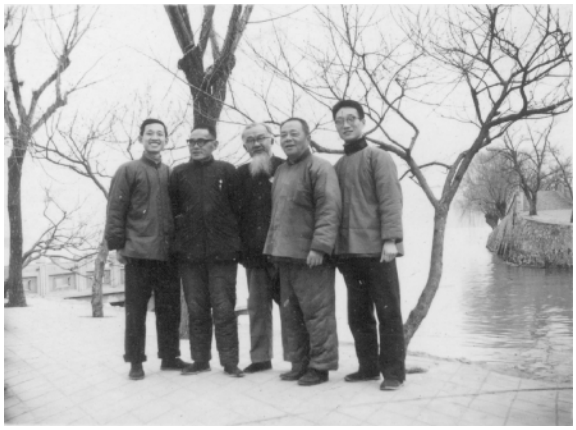
陈荣杓

突破前人的窠臼和樊篱，不满足于常规的陈旧的表现手段，这是千百年来书家和画家们的共同追求。而在这无休止的追求中，漫漫的历史长河，孕育了灿烂的东方文化。时至今日，仍有无数的书画家们以各自的才智、功力为中国书画的创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秦古柳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大家。

儿时，沿着无锡城中六箭河上学途中，每每经过和“少宰第”一墙之隔的一处灰泥剥落、历经岁月风霜的明代老屋。走过短短的一条过道，庭园内数枝古藤掩映，新篁临风，桐荫摇曳。屋内两壁挂满古朴乌黑的碑刻拓片，中间二条长桌前常有十数位学生聚精会神地研习书画。这便是我对于旧方书屋的第一印象。

秦古柳先生(1909–1976)原名秦廉(图一、图二)，号问白居士，以字行，斋名旧方书屋、皕汉碑斋、绿云仙舍，是著名的书画家和碑版鉴定家。他世居无锡，出身名门世家，是秦氏望族中的佼佼者。(近在惠山区玉祁镇辟有“秦古柳故居”，其实先生从未在玉祁生活过，何来“故居”？于此笔者暂存一疑)十二岁即随人称“江南老画师”的著名画家吴观岱学画，从冯君辉先生学诗文，广见历代名家墨迹，潜心临摹传统技法，为以后的书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四岁即作山水长卷，天机横生，深得乃师赞许。中年后致力于石涛、石溪、八大山人、新罗山人、徐渭等，见地深厚，不拘旧法；笔墨酣畅，别开蹊径；形成清脱俊逸、古拙浑厚的艺术风格，其泼辣放纵、倔强之气至老不衰。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一时名噪大江南北，造成一定的社会声望。与此同时，他结识并接待了诸多藏家和书画家，如壮陶阁主裴伯谦、小万柳堂主廉南湖及徐悲鸿、贺天健、江寒汀等。古柳先生除绘画外，在书法、碑版鉴定、书画

图一　秦古柳先生(1968 年于鼋头渚)



图二　陈荣杓、秦古柳、倪小迂、高石农、高惜安(由右至左)(1968 年于鼋头渚)

理论、词曲韵律、皮黄声腔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他的书法擅长汉隶、行草,清丽古雅,超然脱俗。

古柳先生一生研治书艺,他的行草书从褚遂良、虞世南着手,并对《书谱》下过一番苦功。三十岁以后酷爱倪云林和米芾之书法,并以汉隶入楷,由此研习汉简、章草一路,所书瘦劲通神、清丽飘逸,不拘泥于规矩且毫无雕琢做作之气,其个性洒脱豪爽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随着他对历代碑版产生极大兴趣后,便一头扎进了北碑的浩瀚大海中去游弋,并将其笔法揉进作品中去,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几十年来,古柳先生节衣缩食,收集了不计其数的碑帖版本及墓志铭。无锡著名收藏家俞复(字仲还)去世后,后人将其所藏碑帖出售,古柳先生宁可断炊断粮,将俞氏所藏悉数纳入旧方书屋的精藏中去。就其中的《瘗鹤铭》而言,水拓、覆刻、钩本便有二十余种,通过详细审阅鉴定、校考,去芜存菁,肯定了所藏宋水拓本《瘗鹤铭》是为国内仅存之孤本。他所藏的这两种拓本及题跋墨迹,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自清以降,碑学大播,如日中天,碑派书家相继而出,书风为之一变,而给予古柳先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伊秉绶(墨卿)了。古柳先生的隶书吸收汉碑之长,取资特别广泛,他以《石门颂》、《开通褒斜刻石》、《孔宙碑》、《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法为基础,加以汉简的意趣,从中蜕变而出,所书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章法结体极富变化,布白错落有致,时篆时隶、间或篆隶相杂,笔势故意夸张而无顾忌,拙中藏趣,意境高古,奄有众妙。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时,他的书法在无锡及江苏地区广为传布,很多胜迹匾额及市招都出自他的手笔,如“三阳”、“文物商店”、“工运桥”、“吟春书坊”、“华彦钧(瞎子阿炳)墓碑”等。

在书学的途径上,古柳先生并不以个人的好恶而一味推崇北碑,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学碑的同时始终未曾偏废帖学,他主张南帖北碑同时并重,兼收并蓄,然要取法乎上,择善而行。他的行草植根于诸遂良、虞世南,并受米芾及傅山(青主)极大的影响。对于傅山的艺术、学识及人品,他都极为服膺,尤其对傅山“四宁四毋”(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真率毋轻滑、宁支离毋安排)的艺术主张很是推崇,并常作为告诫学生的警句。在我问学于秦师时,他还特意在我的窗课上写上了这几句话。古柳先生的行草书集分隶之变,笔处处转又处处留,时方时圆,变幻莫测,在空灵飘逸中又显得迟涩古朴,使两种不同的感受得到和谐的统一。

古柳先生的山水得石涛之纵逸、新罗之洒脱而自然浑成,元气充溢。因其善书,又长于金石考据之学,故画中书卷之气盎然,非庸手能望其项背。上世纪60年代初,由江苏省国画院组织发起十数位国画名家赴浙、皖写生,古柳先生偕唐原道、诸健秋、朱宗之、刘达江等皆往之。此时古柳先生创作了《仙都五老峰》、《黄山温泉》、《西海晨曦》等一批精品画作,克尽各家之妙,云烟华滋,得山川之自然,泼墨则融汇“二石”之笔致。而其所绘花鸟则直宗宋元,五十年代初所作《八哥》即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其三十岁所绘之《松鹰图》,为前辈名家胡汀鹭所见,直呼“天机神授,自愧弗如”。

古柳先生性简傲耿介,待人真诚,讲话直率,不论是长者或是后学之辈,在与他交谈中都能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及一些极富哲理的言谈。自五十年代开始,他向社会公开招收了数十位学生,且不以贫富取人,爱才重德,有些家境贫寒者不仅免交学费,连书画用品也由他供给。古柳先生以自己数十年的书画心得,制订了一套科学的施教方法,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个性与学养高低,采取不同的范本和不同的施教方法。在他众多的学子中,现今已桃李成荫,佼佼者不乏其人,如钱绍武、刘达江、董欣宾、杨齐南、袁清霓等。

古柳先生性喜淡泊,不求闻达,除几次外出写生外,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无锡。20世纪50年代,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和江苏省国画院都曾有

意商调先生赴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所以古柳先生的艺术活动区域范围相对来说较为狭窄，他宁愿在旧方书屋这一小块圣殿之中潜心于他的艺术研究和创作,甘于清贫,与世无争。可是接着而来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打破了他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于是,他终于病倒而不起,带着他的惆怅与憾恨离开了人间。

秦古柳先生于1957年起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无锡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以后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市政协常委。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无锡市书法研究组组长。近年来,《秦古柳画集》、《秦古柳鉴藏瘗鹤铭宋水拓本》、大型画册《秦古柳画集》相继出版,秦古柳艺术研究会也于1995年在无锡成立。随着他的艺术和生平更多地与世人见面，他的艺术和社会影响必将与日俱增,发扬光大。

(作者系篆刻家、无锡西神印社社长)

(编辑：阎智海、何桦)

无锡全面部署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推动无锡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2015年3月5日下午，无锡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无锡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市发改委、监察局、财政局、文广新局、体育局、质监局、文管中心、各市(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市标准化研究中心，以及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介绍了我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明确了下一步试点工作任务,并对该项目实施计划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了标准化试点各专题工作组组成和责任分工。会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是今年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试点将以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重点,通过制定实施保障标准、技术标准和评价标准,对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政府的责任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设施建设、人才队伍、产品供给等各方面,提出一系列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形成科学、规范、适用、易行的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科学、规范地开展公共文化建设,切实提高服务效能,更好地保障广大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同时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无锡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将于今年上半年完成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于7月份完成论证和报批备案,8月起在全市范围组织宣贯实施,2015年10月汇总实施情况形成试点报告。

(消息来源:无锡市文广新局网站)

丹青余事画名传　春风化雨遍桃李

——记一代宗师胡振先生

章志坚

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言:“吾邑近来言画者,首推观老,次亦称汀鹭,观老以苍秀胜,汀鹭以浑脱胜,一穷人巧,一尽天趣。”江南名宦廉泉则言:“汀鹭山水与观老齐名。”有诗云:“抗手延陵叟,千秋两巨然。”近代名家林纾(琴南)题《汀鹭画册》谓:“大作得力于一峰老人,以坚苍之笔,点染山水,不惟魄力雄伟,而韵致亦非时流所及。至于拙画,无一足言,较之尊作,大有上下床之别,吴君观岱亦吾老友,信哉锡山之多贤也!”可见汀鹭先生与观老一样在近代无锡绘画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汀鹭,讳振,字瘖蝉,号瘖公,大浊道人,斋名“闹红精舍”,无锡城中迎溪桥人,生于1884年,殁于1943年,享年六十岁。有《汀鹭题画集》、《胡汀鹭画集》行世。

汀鹭先生早年学画花鸟,师从邑中名家朱英(逊甫),朱则承秀水张熊,又从吴中名家顾麟士游,艺益精进,名满大江南北。继而取法任伯年,上溯八大、青藤、白阳、恽南田、新罗山人,并参以西法写生,能不落古人窠臼。所作浑厚秀逸,尤善作指画,并配以指画长题,意趣无穷,耐人观赏。先生指画以食指为主,助以大姆指,凭指肉与指甲运行,表现出刚柔兼并的线条,而不依赖海棉吸取水墨,属高其佩法,并参以己意,自成一格,故与潘天寿大师的指画有异曲同工之妙,门人钱松嵒先生的指画,实受汀鹭师影响也。先生又工山水,初学沈周、唐寅以及夏圭,笔墨浑厚雄健,后又得著名收藏家裴伯谦和瞿旭初之助,对历代名家真迹有观摩机会,先生从中汲取历代名家传统技法中之精髓,又从艺术实践中开创自己的技法,自成一家。先生谓:“中国画的精神,在于笔墨,学古人要为我所用,无论山水人物花鸟必须具备两种传统气派,一是金石气,二是书卷气。”又云:“中国山水画有所谓‘鸟瞰式’,其实不仅要鸟瞰,还必须在山石树木中间充分流通空气,能使人看到画的背面境界,作画贵在留出空白。”所以无锡画家从吴观岱、胡汀鹭到贺天健、秦古柳、诸健秋等都是站着绘画的,也可谓是中国画技法之一大创新也!

汀鹭先生工书法,擅诗词,书初学苏东坡,继得翁方纲之体,厚道遒劲,晚年学吴渔山。先生的诗词,无所依傍,题书之句自成一家,门人许瘦峰将其诗词遗稿汇集成《闹红精舍遗稿》行世,这些诗词反映了先生的心情与抱负,也表现出先生的民族气节和满腔愤世嫉邪的爱国心情,正如他诗中所写:“众人愿醒我愿醉,如此乾坤不醉何?满眼狂流无限感,恼人常觉醒时多!”

汀鹭先生一生从事美术事业,对中国绘画造诣颇深,并且也是一位热心培养美术人才的教育家。先生历任南京高师艺术专科、南京美专、省立第三师范、上海昌明艺专等校的美术教师,并与诸健秋、贺天健等创办无锡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教务主任,主持校务,造就美术人才甚众,正可谓“春风化雨,桃李遍及大江南北”,学生中以钱松嵒、钱悦诗、李公威、顾懋功、许瘦峰、汪海若、吴荣康等诸家蜚声画坛。

先生喜郊游,善待人。在邑中与王云轩、程颂嘉、汪静山先生常叙饮于云轩先生之“鹤巢”。谈诗论画,更究画道,时称“鹤巢四友”。1935年在城中公园多寿楼与邑人组织“云林书画社”,汀老任社长。时常与金石名家萧蜕庵高足邹泝生先生、“无锡三柳”之一的徐育柳先生题诗填词,相互倡和。在南京执教时与李毅士、吕凤子、汪采白、谢公展等名家相友善。在上海则与海上

名家黄宾虹、陶冷月、樊少云、王个簃等相交往，或继承传统，革新国画，共事“昌明艺专”，或切磋绘艺，相互观摩。抗战时，曾在沪上大新四楼举办个人画展，评价甚高，在沪上画坛亦颇负名望。

据先生门人吴荣康(原无锡书画院院长，著名花鸟虫鱼画家)提起，我国近代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十分推崇汀老。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每次吴先生从中央大学回锡和开学回校，悲鸿先生总要他代向胡先生问好并询问汀老近况，在教授吴先生绘画过程中多次指出：“你有汀鹭的技法基础，以后不必学我的国画，我教你素描和西洋画就行了。”徐先生得知汀老晚景凄凉，生活艰难，就写信给吴荣康，希望汀老能够到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遗憾的是汀老没有看到抗日胜利就与世长辞了。

汀鹭先生一生生活清寒，境况艰难，中年丧子，发妻多病，又逢国事日非，心情沉重。但先生乐天达观，安于清贫，以诗词书画寄托哀思和悲忿。无锡沦陷时，先生蓄须明志，署名大浊道人，以示不屈之意。据荣康先生回忆，汀老少年聪智，好读诗书，二十岁家道中落，乃思自立门户，“自谓二十四岁方始学画，并从此发奋绘事，每晚读书至深夜云”。三十岁后已渐露头角，四十岁已执教南京高师，五十岁后名闻京沪，但天不永年，未老先逝。幸有妙画和诗词流传，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正如江南名儒钱振锽先生挽其联云：“少别遽千年，心情相孚，下走实深知己感；天才高一代，丹青余事，先生竟以画人传。”

(编辑：何桦)

《宫中月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官窑瓷盘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

2015年2月12日，由无锡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从远古走来”系列之《宫中月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官窑瓷盘展》在无锡博物院西区二层展厅隆重展出，展期至4月12日。

中国素有“瓷器之国”的美誉，时至明清，随着陶瓷文化和技艺的深厚积淀，制瓷水平在千年窑火的熏陶下，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明清官窑瓷器，因其为皇家御用，更是精美绝伦，成为世界陶瓷艺术的典范。官窑瓷器的选材、用料上乘，并且由君主钦旨明定陶瓷式样、选用精明干练的督陶官监督生产。明清官窑瓷器釉色齐全，晶莹润彻；胎质细腻，洁白透明；图案精美，烧制精工；陶法严谨，工艺高超，为后世所难以企及。

此次《宫中月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官窑瓷盘展》，遴选出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明清官窑瓷盘50件。瓷盘既是实用器皿，同时也因其平面适合作画上彩而富有观赏性，另外圆形的瓷盘状如明月，喻示着吉祥和团圆，因而深受人们喜爱。这些瓷盘中除了常见的青花，还有五彩、粉彩、斗彩，以及各种颜色釉，品种繁多，精彩纷呈。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官窑瓷器的主要流行趋势以及各时段工艺、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的异同。同时，也为无锡的广大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了一个解读、欣赏、研究明清官窑瓷器的难得机会。

《无锡文博》2014年总目录

关　注

文化传承和经济效益双赢——第九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解读无锡模式（周洲）2014/02/P.3

专　题

苏轼《功甫帖》辨析(单国霖)2014/01/P.3

“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钟银兰、凌利中）2014/01/P.8

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2014/01/P.20

论《功甫帖》墨迹本与刻本的逻辑关系——与钟银兰、凌利中先生商榷（陈萧羽）2014/01/P.29

《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林霄)(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功甫帖》检测报告)2014/01/P.38

试解钱穆与钱锺书交往的一桩悬案（刘桂秋)2014/02/P.5

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求学期间的几份文献及几个疑问(钱之俊)2014/02/P.10

清代无锡钱氏家族的教育及其转型——以堠山派城中支、湖头派七房桥支为例(蒋明宏)2014/02/P.22

试论钱锺书读书启蒙的几个阶段(梁溪清)2014/02/P.32

此“钟”非彼“锺”——小考钱锺书的“锺”字(华兆瑛)2014/02/P.35

清宫档案与宫廷紫砂(赵聪月)2014/03/P.3

时大彬与明代紫砂(叶倩)2014/03/P.16

认知中国“宜均”(周小东、瞿华娣)2014/03/P.26

宜兴紫砂陶“泥片围筑法”浅识(吉维明等)2014/03/P.35

渐开风气堪为师——略论吴观岱的绘画思想、绘画特色及其影响(杨思胜[美国]、赵启斌)2014/04/P.26

布衣能为风气先——吴观岱书画艺术的风格及其时代意义(蔡卫东)2014/04/P.24

吴观岱研究三题(陈东、潘凯)2014/04/P.33

吴观岱与晚清临《书谱》之风(薛龙春)2014/04/P.43

历史评判的盲点——从吴观岱先生画展想到的(辛尘)2014/04/P.47

吴观岱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2014/04/P.51

历　史

百年村前书声琅(符志刚)2014/02/P.38

解放前夕无锡地下党策反信底稿解析（肖根荣)2014/02/P.42

《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碑》的评释(陈学文)2014/03/P.39

三公祠碑记考述(徐志钧)2014/03/P.43

倪瓒年谱(二十)(谈福兴)2014/03/P.50

迎接新春天的“第一燕”——无锡地区早年进步刊物《协进》月刊综述(谈菁)2014/03/P.57

“凤谷行窝”名称考(石雨)2014/03/P.60

邹家麟《辛亥无锡光复之实写》若干史实考(阎智海)2014/04/P.65

热血异域洒　伟业日月明——抗美援朝的珍贵回忆(宋福贵口述、童缘整理)2014/04/P.72

考　古

华士清墓发掘简报(高振威、周利宁)2014/02/P.46

遗　产

无锡庆丰早期运行模式研究——对庆丰纺织公司1922–1936年账略的初步分析(下)(顾纪瑞)2014/01/P.45

无锡庆丰早期的地位和运行特征——兼析无锡丽新的“殊途同归”(上篇)(顾纪瑞、顾征)2014/02/P.60

无锡庆丰早期的地位和运行特征——兼析无锡丽新的“殊途同归”(下篇)(顾纪瑞、顾征)2014/04/P.77

对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中两个问题的再认识(蔡剑鸣)2014/04/P.86

无锡工业遗产的特点和价值（薛锦)2014/04/P.89

博物馆

古碑刻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谈福兴)2014/01/P.54

浅析举办联合展览对博物馆的重要意义——以1980年五市联展为例（徐驰）2014/01/P.64

文物保护宣传工作探研——以宜兴市为例(蔡述亮)2014/01/P.68

关于江阴民间收藏的调查和思考（陈蓉）2014/02/P.50

博物馆藏品搭建沟通的桥梁——宜兴市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侧记(郝殿峰)2014/02/P.58

深化“红色文化”品牌教育活动的思考——浅议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红色记忆之旅”品牌(焦懿芳)2014/03/P.70

无锡博物院科技馆“馆校合作”模式探析(阴黎丽)2014/04/P.94

品　鉴

停云馆帖考(十四)(周道振)2014/02/P.61

翩若惊鸿——顾恺之《洛神赋图》赏析(赵启斌)2014/02/P.69

停云馆帖考(十五)(周道振)2014/03/P.76

浅谈中国古代珠玉孔道形成特点(王瑞娟)2014/04/P.98

艺　术

明代文徵明家族古书画鉴藏研究（下)(王照宇)2014/02/P.72

随　笔

东林精神与无锡近现代名人（徐榴)2014/03/P.83

资　讯

2013年(十二届)无锡市文博界优秀论文评奖结果公布2014/01/P.28

无锡博物院举办走进大师系列《山水知音——张大千、溥心畬精品展》2014/01/P.44

无锡博物院举办《篚头春意来——迎新春院藏成扇展》2014/01/P.71

2013年度无锡文博大事记2014/01/P.72

《无锡文博》2013年总目录2014/01/P.78

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2014/01/P.82

《粤艺缤纷——明清时期广东传统工艺精品展》亮相无锡博物院2014/01/P.83

《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精品展》在锡博开展2014/01/P.83

发现玲珑球之美·鸿山遗址征文大赛2014/01/P.84

岭南画派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2014/02/P.09

荡口古镇正式开街2014/02/P.57

2014中国(无锡)吴文化节开幕(王琴)2014/02/P.80

宜兴窑古代陶瓷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开(蔡述亮)2014/02/P.81

无锡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公示2014/02/P.82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2014年文化遗产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在无锡举行2014/02/P.83

无锡博物院举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枕展2014/02/P.84

《衣冠明道——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在江阴展出2014/03/P.25

宜兴市陶瓷博物馆获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2014/03/P.38

无锡博物院举办《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云水襟怀——陆俨少作品回顾展》2014/03/P.75

乐趣——宜兴举办“中秋赏月猜谜游园晚会”2014/03/P.82

无锡博物院理事会顺利换届2014/03/P.84

缅怀烈士功绩　弘扬烈士精神——首个烈士纪念日无锡举行公祭烈士活动2014/04/P.59

无锡博物院举办《生趣宗秋岳——丁宝书绘画精品展》2014/04/P.64

无锡荡口古镇、阳山镇获评“中国最美村镇” 2014/04/P.76

《山舞海歌——方召麟捐赠作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2014/04/P.97

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同盟年会召开2014/04/P.99

全国民办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在无锡开班2014/04/P.100

《“澄怀味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第三届院展巡回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幕2014/04/P.100

图　片

苏轼《功甫帖》2014/01/封面

《功甫帖》单字“甫、奉、议”2014/01/彩页

箑头春意来——迎新春院藏成扇展（唐云悠然见南山图、行书成扇，吴湖帆山水图、小楷成扇，虚谷竹石图、萧退闇行草成扇，清代成亲王草书成扇）2014/01/彩页

南宋　龙泉窑粉青釉鬲式炉（无锡博物院藏）2014/01/封底

高奇峰《松猿图》（广东省博物馆藏）2014/02/封面

折中与融合——岭南画派精品展（高剑父《柳塘秋雨图》、高奇峰《松猿图》、陈树人《淡黄杨柳舞春风》、赵少昂《江村归鸦图》）2014/02彩页

头等之物——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枕展（宋代磁州窑白釉褐彩诗文腰圆枕、金代磁州窑褐黑彩开光花卉纹卧女枕、金代河南新安城关窑三彩划水波纹卧婴枕、金代磁州窑白地黑彩诗文八边形枕）2014/02彩页

无锡文博系统文化惠民活动异彩纷呈（包括无锡博物院5·18义务鉴定、工商馆流动展下基层、科技馆讲座进社区、江阴博物馆文化助残）2014/02/彩页

元代　钧窑瓷碗（无锡博物院藏）2014/02/封底

战国菱形勾连云纹敦（湖北随州博物馆藏）2014/03/封面

清宫旧藏紫砂器（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彩绘方壶、宜兴窑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宜兴窑紫砂描金彩绘香插、宜兴窑紫砂御题诗松树图壶、宜兴窑紫砂胎红陶衣茶叶罐）2014/03/彩页

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西周早期铜觥、西周早期曾侯谏方鼎、西周早期兽面扉棱尊、西周早期噩侯方彝及铭文）2014/03/彩页

清雍正　釉里红三鱼纹瓷盘（无锡博物院藏）2014/03/封底

吴观岱　流虹桥遗事图（无锡博物院藏）2014/04/封面

吴观岱作品欣赏（松壑鸣泉图、秋日行旅图、仿四家人物图四屏条之一、之二）2014/04彩页

生趣宗秋岳——丁宝书绘画精品展（红梅鹦鸪图、乔木天香图、耄耋富贵图）2014/04彩页

清宣统　醴陵窑釉下五彩龙凤纹长颈瓶（无锡博物院藏）2014/04/封底

（整理：何桦）

2014年度无锡文博大事记

一月

20日，新沟河水利工程无锡段江阴东江头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结束，确认为一处明清建筑基址。

26日，“东林国学讲堂”首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复旦大学国学社名誉社长、哲学院副院长郑召利主讲《国学与人生》。

28日–2月20日，无锡博物院举办《箑头春意来——迎新春院藏成扇展》，共展出54件院藏成扇精品。

本月，吴冠中之子吴有宏、吴乙丁将83件吴冠中遗物无偿捐赠给了建设中的宜兴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本月，江阴市重要文物遗存航拍工作全部完成，共计对34处重要文保点、3个古镇、2个古村落进行了无人机航拍。

二月

23日–25日，全省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登录规范骨干培训班在淮安市开班，全省各级文物管理部门普查工作人员和相关文博系统专业收藏单位普查员，共170余名参加了培训班。

24日，无锡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遗址博物馆分两大区，主楼为展览区，附楼为吴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是一个集文物展示、考古研究、科普教育及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博物馆。

26日–3月17日，《中国古代名画仿真艺术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展出。

26日–5月3日，《奢华之色——江阴博物馆藏宋元明金银器特展》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江阴博物馆藏宋、元、明时期的金银器110件。

三月

1日–4月9日，《粤艺缤纷——明清时期广东传统工艺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展览汇集了广东省博物馆精选的101件(套)文物，涵盖了陶瓷、端砚、广雕、广珐琅器、玻璃器、刺绣、家具等多项广东传统工艺项目。

18日，“东林国学讲堂”第二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唐朝系列节目主讲人孟宪实主讲《以史为鉴——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9日–20日，由江南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无锡市社科联、无锡市文管中心主办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南大学举行，这是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首次在亚洲为其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于20日到钱锺书故居进行了实地考察。

20日–4月20日，《笠泽林泉——吴江博物馆馆藏历代吴江籍画家山水画展》在江阴博物馆陶白书画馆开展，共展出清代至现代吴江籍30余位画家的86件山水精品画作和扇面。

22日–4月22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精品近40幅。这是敦煌艺术首次走进无锡，也是张大千敦煌艺术成就的集中呈现。

27日，李应昇与东林风骨研讨座谈会在江阴顾山镇召开。

28日，无锡市博物馆协会第一次理事会在无锡博物院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常务理事单位增补、理事单位调整和副会长增补等相关事

宜。

同日，2014年度《无锡文博》编委会年会在无锡博物院召开。会议听取了编辑部的工作汇报，评选出了2013年度无锡市文博界优秀论文14篇。

本月，无锡博物院讲解志愿者服务队获评2013年度无锡市志愿服务活动先进集体。

四月

3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荡口古镇正式开街运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莉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中，副市长朱爱勋等参加了启动仪式。

10日，第九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在无锡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举行，本届论坛以“文物事业与法制建设”为主题。

同日，2014中国（无锡）吴文化节在无锡新区鸿山开幕。

12日，英国广播公司摄制组成员专程赴秦邦宪故居摄录收集秦邦宪烈士相关影像资料，秦邦宪烈士的女儿秦新华、秦吉玛女士及孙女秦红等后裔陪同参观。

22日，《宜兴窑古代陶瓷标本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开展，共展出符合宜兴窑产品特征的器物近300件。

25日–4月28日，“宜兴窑古代陶瓷学术研讨会”在宜兴举行。

30日– 6月30日，《折中与融合——广东省博物馆藏岭南画派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岭南画派绘画精品50余件，这是岭南画派作品首次在无锡公开展出。

本月，无锡东林书院获评“江苏省十佳全民阅读推广基地”。

五月

15日，《头等之物——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枕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精品瓷枕80余件，这是锡博首次引进以“枕”为主题的展览。

17日–31日，《艺术·无界——美中画家巡回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中美艺术家作品近150幅。

18日–6月20日，《好玩之物——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玩展》在江阴博物馆陶瓷馆开展，共展出100件文物。

18日，“国际博物馆日”无锡博物院举办惠民义务鉴定活动。

同日，江阴博物馆举行“志愿者之家”成立仪式。

19日，第九届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暨江阴市第三届导游大赛在华西村开幕。

19日–21日，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博物馆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2014年会员代表大会暨藏品管理培训班在常州博物馆举办，来自全省41家公私文博单位100余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及培训。

24日，“东林国学讲堂”第三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无锡市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方锡强主讲《道德经》中的“处世之道”。

26日，无锡博物院举办“岭南画派”的专题讲座，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万章主讲《岭南画派的演进与发展》。

六月

5日–6日，“江苏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登录平台骨干培训班”在常熟市举行，来自全省的160多名文博专业人士、各普查办及重点文物收藏单位普查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

10日，无锡市第四批市级非遗推荐项目名单正式公示，无锡灯谜等13项新项目上榜。

14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2014年文化遗产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在无锡惠山古镇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莉新为“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指挥部”揭牌，“展示惠山祠堂魅力，走

向世界文化遗产”大型申遗图片展同时开幕。

同日,江阴博物馆“泗洲大圣宝塔出土舍利专题馆”改造完成并对外开放。

26日,江苏省文物局会同省水利工程建设局在无锡组织召开新沟河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动员会。

28日,“东林国学讲堂”第四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醒狮国学院院长、醒狮国学杂志社主编张雪峰主讲《国学解悟人生智慧》。

本月,无锡博物院获评2013年度无锡市“安康杯”竞赛优胜集体。

本月–10月底,新沟河水利工程无锡段惠山区洛社东张“三婆婆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确认该土墩为宋代遗迹,土墩上及周边有大量的宋代到明代的墓葬,已清理出墓葬17座。

七月

9日–11日,宜兴市博物馆征集到10位宜兴籍名人的158件手迹、用具等珍贵资料和大量电子材料。

19日,无锡博物院惠民义务鉴定活动走进五爱社区。

22日,宜兴市普查办在宜兴市文化馆召开了宜兴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并举办了普查员培训班。

25日–10月10日,《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枕展》在江阴博物馆陶瓷馆开展。

29日,宜兴市文管办将骆驼墩遗址、西溪遗址、蜀山窑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紫砂模具等208件(套)文物移交给宜兴市博物馆。

31日,宜兴陶瓷“口述历史”工程启动仪式在宜兴陶瓷博物馆陶瓷(紫砂)文化研究院顺利举行。

本月–8月,蓝天燃机热电厂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明代中晚期砖石墓葬10座,随葬品主要为铜钱、瓷碗、韩瓶等。

八月

8日,宜兴市博物馆组织专家对第一批97件通史馆展陈修复文物进行验收。

9日–13日,《“玉之韵”精品玉器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扬州、上海、苏州等地玉雕行业名家的玉雕作品近300件。

16日,无锡博物院惠民义务鉴定活动走进汤巷、后西溪社区。

20日–10月20日,《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以西周时期为代表的王侯生活用品60余件。

25日,“教育部第五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论坛”暨“谈伟光先生古典紫砂珍品收藏展”在中国紫砂博物馆、宜兴陶瓷博物馆陶瓷(紫砂)文化研究院举行。

同日,《江苏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宣传资料展》图片展板在无锡市南禅寺广场展出,这是全面宣传、介绍普查工作的有益实践。

27日–9月26日,江阴收藏家收藏艺术系列展《文人绘瓷——澄怀堂藏浅绛彩瓷器展》在江阴博物馆金银玉石馆开展,共展出40余件瓷器藏品。

本月,无锡博物院获评2014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二十六届科普宣传周先进集体;《革命风范——无锡党史人物廉政教育图片展》获评2014年度江苏省社科普及专项活动经费资助项目。

九月

1日–10月7日,《衣冠明道——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在江阴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泰州地区历年出土各类服饰文物共60余件,本次展览系2014年江苏省馆藏文物巡回展十大项目之一。

18日–10月12日,《云水襟怀——陆俨少作品回顾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陆俨少书画精品近50件。开幕式上,无锡市领导与陆俨少亲属代表陆亨分别致辞,陆亨受聘为无锡博物

院特约研究员。

19日,无锡博物院理事会召开换届会议。会议听取了《无锡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无锡博物院理事会章程(修改草案)》以及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20日–22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江阴、太仓集邮联展》在江阴博物馆开展,共展出两市邮政历史、邮政用品、专题、航天、极限和一框类集邮37部,计100框。

27日,“东林国学讲堂”第五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醒狮国学院院长、醒狮国学杂志社主编张雪峰主讲《孝立根基,家业长青》。

同日,由宜兴市博物馆、宜兴市文管办主办的“宜博讲坛”正式开讲。

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红色收藏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展出。

十月

3日,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举办了《杨氏兄弟——无锡民族工业的拓荒者》专题讲座,来自本市多个社区的80多名农民工子女参加了此次活动。

14日–21日,全国民办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在无锡开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刘谨胜、无锡市副市长史立军等出席了开班仪式。

本月,无锡博物院荣获“无锡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同月,获评2014年无锡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先进集体。

十一月

2日,《桑梓情怀——徐达章、徐悲鸿、廖静文、徐庆平书画精品展》在程及美术馆开幕。

5日–27日,《镜华流光——扬州博物馆藏汉唐铜镜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扬州博物馆藏汉唐时期的珍贵铜镜60余面。本次展览系2014年江苏省馆藏文物巡回展十大项目之一。

6日–7日,江苏省可移动文物普查综合培训班在昆山开班,来自全省各市、县(区)普查办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230余名参加了培训。

7日–8日,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同盟年会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同盟活动基地成立大会在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古运河会议中心召开,本次年会通过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无锡宣言》。

8日–15日,无锡博物院举办《山舞海歌——方召麟捐赠作品展》,以纪念方召麟先生百岁诞辰。

15日,“牵手·2014中国最美村镇”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无锡市荡口古镇、阳山镇榜上有名,荡口古镇获评“人文环境奖”。

27日,“东林书院复兴4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东林书院举行。

十二月

3日,《生趣宗秋岳——丁宝书绘画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共展出丁宝书绘画作品40余件,展期至2015年1月20日。

5日,《“澄怀味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第三届院展巡回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华建敏以及省市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8日,由江阴博物馆和贵州民族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饰美人生——苗族银饰展》在江阴博物馆明清服饰馆开展,共展出100余件苗族银饰,展期至2015年2月26日。

22日,江阴市举行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鼻祖缪荃孙诞辰170周年暨《缪荃孙全集》首发座谈会。

23日,“东林国学讲堂”第六期讲座在东林书院举行,由醒狮国学院院长、醒狮国学杂志社主编张雪峰主讲《孝立根基,家业长青——孝经智慧》。

28日,“钱松嵒、钱紫筠书画作品捐赠仪式”在宜兴日报书画院举行,钱紫筠女儿钱春涛向宜兴市政府捐赠钱松嵒书画作品四幅、钱紫筠

书画作品40幅。

30日,《宜兴首届当代古琴精品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开幕。

本月，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与轨道办签署地铁三号线考古发掘协议，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本年，宜兴市陶瓷博物馆获准设立海峡两岸紫砂文化交流基地，这是江苏省继南京中山陵之后，按规范要求获准设立的又一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本年,无锡博物院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延伸一公里”活动,向全市学校、社区、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和公共文化辐射较弱的农村等输送流动展览、公益讲座和科普主题活动等126场次,参与人次10余万。名人故居也开展了“流动故事会”和《无锡名人故居展》下基层活动。

本年，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惠山区钱桥街道赤墩遗址朱巷村北部的遗址一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米,已发现墓葬15座,灰坑26个,出土玉器7件,石器46件,陶器53件。

本年,《无锡市七房桥钱樟夫妇墓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方案》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该方案由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与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编制完成。市考古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签署无锡市七房桥钱樟夫妇墓出土丝织品保护协议。

（整理：阎智海）

梅兰竹菊“四君子”书画作品暨历代文玩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展出

2015年1月29日,宜兴市文广新局、宜兴市徐悲鸿艺术研究会、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在宜兴宜城街道太平天国王府联合举办了《梅兰竹菊‘四君子’作品暨历代文玩展》。该展览将持续到三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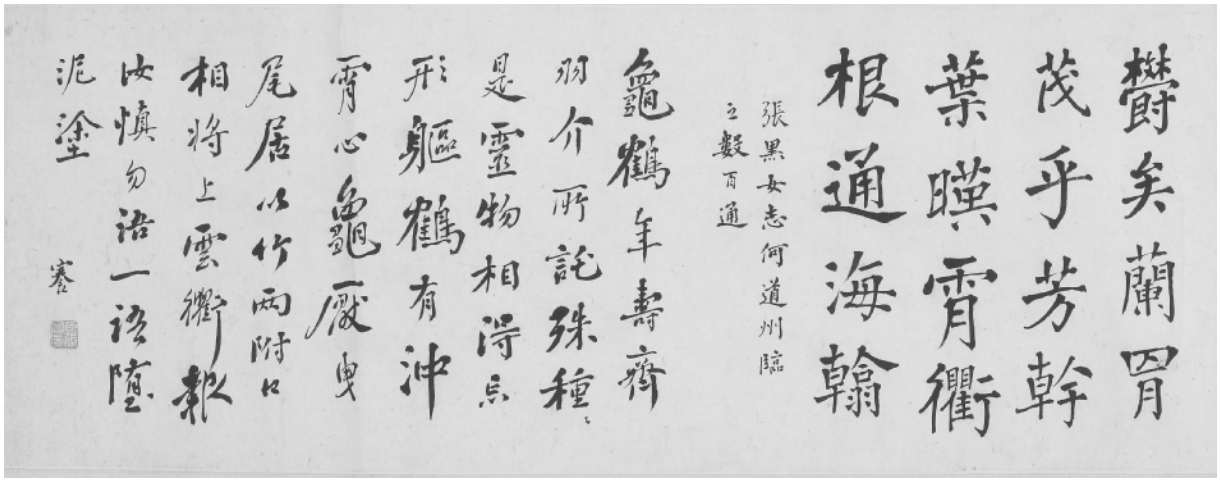
除书画作品外，主办单位还在王府展出了历代文玩。文玩,指的是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玩。这些文具造型各异，雕琢精细,可用可赏,使之成为书房里、书案上陈设的工艺美术品,所以又被人们称作文玩。文房四宝尽管创始很早,但一直发展到唐宋时代,即传统书画艺术趋向成熟完善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形成以后，它们才真正找到并且实现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文人学士乃至帝王官宦书斋案头不可或缺的器用。在我国传统的文房用具里,笔、墨、纸、砚是最基本的文房用具,明清以来文房用具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与“笔、墨、纸、砚”相配套的各种文具,主要有笔架、笔洗、墨床、砚滴、水呈、臂搁、镇纸、印盒、印章等。文玩的一大特点是小巧。作为书桌案几之玩用,一般大不盈尺,小不足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可远观,亦可近取。特别是有些赏玩摆件,往往是大块的浓缩,大件的缩小,小中见大,芥纳须弥,古玩界又有“小器大样”之说。现代意义上的文玩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带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赏玩件或手把件。

此次展览共展出梁文尧、朱锡康、许亦华、启明、强芳等画家的书画作品数十幅，以及砚台、笔筒、笔洗、笔架、水滴、镇纸、印盒、印章等一百余件,不仅增强了广大市民对梅、兰、竹、菊和文玩的认识,也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

（消息来源:宜兴市文广新局网站）

无锡博物院获杨氏家族捐赠书画 151 件

单　红



张謇书法卷(局部)

无锡博物院再添重量级藏品！长近八尺的“清初四王”之一王翚山水精品、戴奎水墨山水精品，对研究无锡近代乡邦史极具价值的吴观岱作重修贯华阁图,张大千作品及名作三件,此外还有刘海粟、谢稚柳、周怀民等大家的作品……这些珍贵的捐赠，再次提升了博物院藏品的厚度。

近日，无锡杨氏家族——杨通谊长孙杨传德代表家族将杨通谊收藏书画及工艺品151件套捐赠给无锡博物院。这批书画多为杨味云和杨通谊上款，但也不乏家族收藏的艺术珍品和当代名家的作品。

杨氏家族的无偿捐赠，只是近年来博物院无偿征集民间藏品的一纸剪影。自无锡博物院2008年建成以来，短短几年间获无偿捐赠书画艺术品600余件,价值数以亿计。

来自民间的珍贵藏品，有效提升了博物院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有些文物还填补了馆藏空白。在收藏热日趋升温,特别是书画艺术品步入“亿元时代”的当下,这些无偿捐赠,缘于有识之士对家乡无锡的无私关爱，也得益于无锡博物院克服经费短缺之困、多渠道无偿征集为博物院“聚宝”。

配合展览,名家捐赠添分量

2009年4月,无锡徐悲鸿艺术展馆开幕当天,成功策划了《盛世丹青》“百米长卷”书画笔会,50余名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并将所有作品无偿捐献给博物院。此后多次举办“徐悲鸿弟子暨中国书画名家展”,获捐参展书画30件。

2011年,徐悲鸿先生的高足———黄养辉诞辰100周年,博物院精心策划,隆重举办了“黄养辉先生百年诞辰书画展”，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汇聚无锡学术座谈,活动结束后黄养辉先生的后人和学生向无锡博物院捐赠黄养辉作品10件,进一步丰富了院藏黄养辉作品内容。2012年底,博物院为纪念萧平先生七十诞辰举办萧平师生书画印展,获得5件无偿捐赠作品。

几年间,通过类似举措,博物院已经无偿征

集到冯远、范扬、朱培尔、言恭达、钱绍武、李知宝、吴为山等众多当代书画、雕塑名家的作品,以及孙晓云、胡抗美、李刚田、刘恒、刘洪彪、韩可元、李啸等一大批书画名家作品。

立足当地,书画乡贤接地气

无锡有悠久而深厚的书画传统, 到了近现代,更是大师辈出、群星闪耀,先后涌现出众多画坛的领军人物。立足当地,鼓励书画乡贤捐赠,博物院通过这种征集方式,不断完善藏品体系。

2011年5月, 博物院与著名无锡籍女画家钱紫筠 (当代著名山水画大师钱松嵓先生的长女)的后人取得联系,请他们来院亲身体验无锡博物院的现代化设施和陈展环境, 并诚意邀约办展。画家子女如约来院办展并无偿捐赠画家代表作品100件。由于博物院本来就收藏有其父钱松嵓的书画精品一百余件,因而钱紫筠作品的成功征集,既是对原有藏品体系的一次有益补充,也能更好地体现出地方绘画传统的延续性。几年间,累计获得民国以来乡贤捐赠书画作品160余件。

以诚劝募,望族捐赠填空白

无锡历来有很多著姓望族,留下了大量足以对本埠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化遗产,无锡华氏就是代表性的一支。

自2008年初次与以无锡华氏家族后裔、泰籍华人华仲厚先生为代表的华氏兄弟三人接洽后,博物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劝募工作,终于成功说服兄弟三人将其父华绎之先生的旧藏,包括堪称国宝级文物的北宋《惠崇华溪会禽图》(曾由清初王时敏收藏作跋), 元代《崔彦辅虎丘图卷》(此卷流传有绪,卷后附明代吴门陆治、陆师道、文嘉等人题跋),元末明初华贞固的《黄杨集》册页 (为无锡荡口华氏始迁祖华贞固的亲笔手迹,集后并有祝允明、唐寅、文徵明、杨循吉、都穆、朱选、邵弥等明清名人的题跋),明代大家文徵明小楷册页、草书手卷,明代无锡籍著名书画家王问的草书、绘画作品多卷,华太师华察的亲笔行书册页等一批珍贵古代书画、碑帖拓片、古籍善本等无偿捐赠给博物院,共计210件,价值过三亿,堪称一次重量级捐赠。这些珍贵的文物及文献资料本来均已流失境外,此次征集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院的藏品数量,大幅提升了书画藏品的质量,填补了一些地方史研究中的空白。

此次杨氏家族捐赠,是继华氏家族之后,又一次重量级的藏品征集。

海外寻宝,西画捐赠多品类

无锡博物院书画藏品以国画为主,西画收藏较为薄弱。为此,博物院继接收水彩画大师程及、华之宁等海外华人的作品之后, 又通过努力,邀请荣德生先生孙女、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侄女、著名美籍华裔油画家荣智安来院办展,出版画册,召开艺术研讨会,建成与之作品浑然一体的具有浓郁西方现代艺术特点的荣智安绘画艺术馆,承诺长期展出其绘画作品。此举得到画家本人及其家人的充分认可, 她多次表示博物院的做法激起了她对家乡更深的感恩之情,并于2011年4月向博物院无偿捐赠油画作品45件。

2010年初,博物院邀请素有“台湾梅王”美誉的无锡籍画家陶寿伯先生后人来锡, 以热情接待让他感受家乡的快速发展和日渐浓郁的人文环境,最终促成其携父画作来院办展,并无偿捐赠60件书画篆刻作品。无锡籍当代著名书画家方召麟女士此前曾向家乡捐赠过一批书画作品。2009年,通过多方努力,香港方家后人又再次向无锡博物院捐赠方召麟书画作品45件,增添了很多方氏晚年的精品佳作,使院藏方氏作品的体系更加完整。

此次, 杨氏家族无偿捐赠的151件藏品,将于今年举办捐赠仪式和捐赠作品展, 同时选取部分作品和以前捐赠的杨令茀作品一起作为固定陈列永久性对外开放。

(编辑:何桦)